

埃伦·威特 著

Socialists: Old and New

Tony Wright

新旧 社会主义

新华出版社



新旧社会主义

[英] 托尼·赖特 著

褚松燕 林 震 译
毛 鷲 颜君烈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旧社会主义 / (英) 赖特著; 褚松燕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5

ISBN 7-5011-4888-0

I. 新… II. ①赖…②褚… III. 社会主义-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7610 号

Socialisms: Old and New

Copyright © Tony Wright, 1996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1999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rights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新旧社会主义

[英] 托尼·赖特 著

褚松燕 林震 译

毛嵩 颜君烈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61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888-0/D·779 定价: 15.00 元

献给有着一颗永恒的心的人

约瑟夫·菲力蒲·莫里斯·赖特

1982年12月13日——1985年8月22日

致 谢

所有的著作都会欠帐，即使可能不会偿付，也至少应该认帐。我在此要特别提出三点，从最一般的开始，以最特殊的结尾。

首先，本书受惠于所有那些为本书结构和论点的构建提供材料的作者们的学问。在此无法根据明显的欠债个别地致谢这一事实使我有必要向他们集体致谢。第二份债归于在伯明翰和米德兰研究所参加我晚班课程的成员们。他们用整个冬天踊跃与我谈论此书并在此过程中为此书贡献了大量智慧。成人教育班不止一次地帮我完成一本书的写作，对于一个校外教师来说，这总是最乐于记下的一笔债务。

最后，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本书献给的那个高贵的人，尽管他的一生短暂，但他改变了他接触过的每件事、每个人，这本书其实是他的书。

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 议员阁下序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若干年里，左翼一直处于明智的守势。在整个西方世界，右翼都在思想较量中占据优势，占领经济辩论的制高点之后，它又开始把带着狭义个人主义和生硬市场力量的有缺陷的信念用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事，即中央计划经济和一党统治在经济变迁和民众反抗的压力下瓦解的事实激励着右翼勇往直前。

随着 1989 年共产主义的崩溃，一段历史终结了。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它以被一代人所忽视的左翼和中间偏左派一定程度的能量和活动为标志。它包含了一定范围的利益和思想，它的来源是对老左翼和新右翼所提出的济世药方的扬弃。并且它讲述了一种在英国很清楚、很强烈，在别处也很明显的普遍热望，即走出 80 年代政治中一些无谓的争论，另为新世纪制订一份新的基本的日程表。

对左翼来说，这个日程表的首要问题将是把旧价值运用到新的变化剧烈的环境中去这一挑战。必须把集体动员起来去拓展个人的自由，把私营部门的力量用于帮助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市场和国家要互相合作而不再纠缠于冲突。

托尼·赖特这本书为这一政治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路线图，说出了简洁但有力的一点，即用国有制和中央计划来定义社会主义是不能且永远不会令人满意的。10 年或 20 年前，这还不是一个

许多人愿意听到的论点，但今天，它体现了新的常识。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力量和耐久性阐释为一个政治信条，而正是对那些核心价值的重申成为过去 10 年工党重建的实质。社会正义、社群、责任和民主是本书永恒不变的主题，现在已坚定地放进工党新党章的核心要点。新党章第四条的修正条款之所以明显重要，就因为它涉及到在 20 世纪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本书所揭示的真理就是：“新工党”的创立已使该党回归了它的道德基础。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把这些价值与对当前英国整体状况的清醒分析联系起来，同时与一个令人信服的变革良方联系起来。争论已经转向这些方面：如何建立一个股东经济，如何使不列颠重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把权力交到人民手中，如何使不列颠成为新欧洲的一个领袖。

没有思想的政治是不结果实的，而没有价值的思想是软弱无力的。20 世纪末远非意识形态的终结点，而是标志着意识形态的新生。本书对一场思想和价值领域的决定性战斗而言，是一个重大贡献，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决定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

第二版序言

直到有人向我指明，我才意识到这本书谈论的主题是什么。我曾说过，很显然，我已努力在 80 年代关于左翼的激烈争论中寻求某种稳固的理论基础和政党基础并以我的方式思考、著述。本书以一本学术论文面目出现，实际上，它是一种当代的论点。它被友好接受说明别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探索。

推出一个新版本的机会使我能够把这本书完善得切合目前的情况。尽管本书仅写于 10 年前，但它所讨论的世界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世界的重大标点符号除了 1789 年和 1917 年外，又包括了 1989 年。仅仅几年前的一些关于左翼的激烈辩论现在已经带有古董的性质了。在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已在经历一个引人注目的复兴过程。

修订本反映了这一新背景，在适当的地方做了增减。尽管我审慎地不去扰乱第一版的要点并（基本上）抵制住了重写历史的诱惑，但是，我还是增加了新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既回顾了英国的最新发展，又把本书的一般论点拓展到现在。

新版本若没有鲁特勒治出版公司（Routledge）的卡罗琳·温特斯吉尔的热情鼓励，恐怕难以面世，对此，我再次深表谢意。露茜·白丽没有去改变世界但同意变换原文，对此我致以歉意的感谢。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比绝大多数人做得更多从而使我撰写新的一章成为可能的人为本书所做的序。

第一版序言（1986年）

这本小书的名字既非拼写错误，亦非独创性措辞。为了撰写一篇既能为学者接受又能为普通读者理解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性论文，我只能选择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纯粹用来适应社会主义的多种内涵。社会主义的这种多样化既是有组织的、理论性的，又是历史的、现实的。不管是作为朋友、批评者，还是作为旁观者，几乎每一个与社会主义关系密切的人，都以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认识到这一多样性。但是，对这一认识的反应却是各不相同的。

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宣称他们自己特定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而其它观点都是非法的时候，恰恰是认识到了这个词的多样化内涵。一些反社会主义者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需要一个更敏锐有效的途径这一点上岔开而坚持对一种噩梦似的社会主义（用罗斯·白利勋爵的话说，就是“一切的末日”）做一种本质主义描述，这也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一词的多种内涵。同样，那些玩弄定义篡改定义界线的学者们在谈论社会主义时之所以力图把一些秩序强加到无序的物质世界，就在于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另一些人则干脆放弃面对所有这些，正如在一次工党集会上我新听到的一个声音宣称的那样：“我们不要实用政策，我们要社会主义政策！”在他们不同的立场中，所有这些态度都殊途同归，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看成一个难题。相比之下，本书的态度

是把这些多样性当作社会主义是什么和曾是什么的一个必要部分，当作理解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线索。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传统”的界线划宽些以使所有特定传统尽管有明显差异但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同一个流派，但它是怎样一个流派呢？你看，约瑟夫·斯大林和乔治·奥威尔都是其成员。奥威尔自己的观点在他那些流露感情的讽刺作品中无疑通常被简单地误读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而他的观点事实上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种类，其中一种（民主的）应当被接受，而另一种（专制的）则应受到抨击。

因此，本书在此并非要执拗地偏好于论及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而多着墨于多元的“社会主义”。本书的目的不是去鉴别不同传统并分别贴上标签，也不是接受现成的标签，而是探索一些为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提供材料的领域。随后的几章就集中讨论这一领域的不同方面。首先，概述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传统并同时梳理各种社会主义论点；然后，确定四个关键问题并予以讨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争论的地位（道德价值还是经验主义教条？），社会主义目标借以实现的手段（改革还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结构形式（中央集权制的还是联邦制的？）以及社会主义领导者（阶级还是政党？）。

这些问题隐藏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中，但它们显然一直都是相互关联的。最后，在这一背景下，我检讨了当代各种社会主义，并冒昧地提出了对它们的未来的一些想法。

社会主义是一个似伞般包罗万象的词，它的朋友寻求躲在伞下（每一方都试图抓住伞把，用伞尖互相刺戳），而其敌人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挥舞它以打中尽可能多的对手的头。从这种情况出发，寻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衡量和判断特定的思想与运动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呀，从来不认为御前侍卫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马克思对他的一些法国追随者

的著名评价，而 R·H·托尼则评论了社会主义一词“光芒四射的歧义”。这些争论和紧张在本书中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歧义传统的根源。这些应当坦白承认，并且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统一体的细枝末节。

由此，本书进一步得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日渐清晰的是，此处讨论的争论领域并不总是简单划一地转化为社会主义诸传统间的常见分界线（如改革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相反，联合与分离的其它界线却出现了。例如，既有改革主义的独裁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忆起韦布夫妇爱上了苏联这件事），也有革命激进自由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第二，承认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包含那种避开区分和评判之需的烂糟糟的多元主义。相较而言，本书摈弃了历史上和理论上“正确”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需要在各种社会主义之间作出区别，这可能或多或少是可取的、适当的，也似乎是合理的。

第三，这一方法将注意力指向这一范围，即一种社会主义传统（即“马克思主义”）敌视这种社会主义的多元性，企图保证自己的组织和理论垄断地位。本书的论点是：这一计划是非法的，它的基础是有缺陷的，它的结果是破坏性的，而它的崩溃因此也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和受欢迎的。推而言之，这意味着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包含着忘却程序，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其中一些东西只能在被埋没的、被忽略的和少数派社会主义传统中找到了。

最后要考虑的一件事也是相关的。这就是需要一种方法不仅能容纳明显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的历史多样性，而且要能容纳 20 世纪末社会主义的现实地位。这是一个 3 岁孩童生活于其中的把自己描述成社会主义政权的世界，一种具有雄辩证据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成功，甚至可能就是现代意识形态。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个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社

会主义组织获取政权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不再是左翼，而是东方的了。“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的古老呼声已成为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的新现实了，已经没有社会主义者同意使用社会主义标签的“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而不仅仅只有那些想重申社会主义解放的社会主义者去正视它们。第一个事实是，正如一代人之前的 G·D·H·科尔指出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不再仅朝一个方向发展了。”

目 录

| | |
|---------------------|-------|
| 托尼·布莱尔议员阁下序..... | (1) |
| 第二版序言 | (3) |
| 第一版序言 (1986) | (4) |
| 第一章 传统 | (1) |
| 第二章 争论 | (22) |
| 第三章 学说 | (43) |
| 第四章 方法 | (63) |
| 第五章 结构 | (86) |
| 第六章 行为人..... | (109) |
| 第七章 未来..... | (134) |
| 第八章 一种新的社会主义? | (158) |
| 参考文献..... | (194) |
| 译后记..... | (205) |

第一章 传 统

在许多自称社会主义的团体和趋势间产生的争论，是长期的、复杂的和痛苦的。

(雷蒙德·威廉姆斯)

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其中各种社会主义之间不是兄弟般融洽的关系，而是相互斗争和对抗的关系。战线虽然经常变动（马克思主义者对抗无政府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对抗工联主义者，改良派对抗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对抗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派对抗所有其他的人，新社会主义对抗旧社会主义），但永远不会消失。许多社会主义者将最锋利的箭对准别的社会主义者，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发现有必要至少同时两线作战。战场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变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参战者和不同的传统之间交火。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政体的戏剧性崩溃是这部远未结束的发展史上离我们最近、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词语与传统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对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特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抨击时,日后战争的布景就设定了。这些乌托邦作家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科学的超自然的神力的狂热的几近迷信的信仰”被判定不仅与推动阶级斗争无关,而且客观上还是对阶级斗争的反动。在同一时期,马克思斥责了“法兰西脾性”(即蒲鲁东)的“外行做法”并开始向所有这种打着科学阶级理论旗号的“唯心主义”进行征讨。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被马克思恳请为通信者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这样回复道:

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社会的法律规则
和这些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方式以及我们可能成功地发现它们的过程;但是,看在上帝份上,我们在破坏所有先验的教条后,他就不允许我们以我们梦想的方式来指导民众了;就不允许我们陷入你的同胞马丁·路德的矛盾中了,马丁·路德推翻天主教神学后,却又立即以逐出教会和革除教籍令为惩罚措施,构建了新教的基础。在过去3个世纪中,德国主要就是在清除路德那些低劣的著作;不让我们将人性放入类似的肮脏混乱中作为我们努力的结果被清除掉。我全心赞同你把所有观点都予以澄清的想法;就让我们继续这个友好忠诚的争论吧;让我们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博学的富有远见的宽容典范吧,但让我们不要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站在一场运动的前列就把自己当作一场新的不宽容运动的领导者,让我们不要把自己装成一个新宗教的使徒,即使它是一个有逻辑理性的宗教。

这个建议并未被马克思采纳,也没有被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采纳(鉴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占据核心地位这一

相当重要的事实)。社会主义没有被看作一个有着许多房屋的大厦，而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之屋，其中，不同意见的各种传统统统被“逐出教会和革除教籍令”这个精神扔到门外了，而这正是蒲鲁东曾警告过的。

马克思断然地、准确地把对其它可见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攻击和征服看作他的创新计划（和一种持续的先人为主的偏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以致于他甚至一开始就仅因其所主要蕴涵的乌托邦精神而反对“社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欧文派语境下 19 世纪 20 年代的英国，19 世纪 20 年代法国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它的起源指示了它所产生的共鸣。它过去是指欧文、圣西门和其他一些人所说的当时英国和法国推行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指称这些计划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者”）。为了去反对这种唯心主义，马克思需要一个政治词汇表来把自己的位置和距离与这些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因此，在 1848 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一时刻，“共产主义者”一词才与一种革命的、平均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日益磨损的传统结合起来，这已被巴伯夫和法国革命的左派所验证。

马克思正是想利用革命阶级运动这一传统来反对当时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而距此 40 年后，恩格斯仍写到“我们不能把它叫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宣言，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而共产主义是一种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至少在欧洲大陆是可敬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甚至在此后几年，语词的用法已经改变并趋于模糊，马克思似乎还一直对“社会主义”从语词和概念上保持着某种厌恶（反映在《资本论》中“社会主义”一词的贬义用法，通常指蒲鲁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随着 19 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作为常用词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却日渐确立了对社会主义一词的所有权。

进入这个语言雷区后，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谨慎探索。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反映在社会主义一词各种各样的用法以及其用法随着岁月的变化上。甚至当“社会主义”一词在语言上的绝对优势得以确立，被马克思主义者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手里抢走以后，“共产主义”一词也仍然保留着大量不同的新旧用法。比如说，威廉·莫里斯对“共产主义”一词大加青睐，就是因为它承载着一种通过革命阶级斗争来保护公共财产的传统含义。在英国，这个词主要用来与 19 世纪 80、90 年代的费边“社会主义”相区别。这个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阶级社会的初级或原始共产主义，但它衍生出了一种更深刻更为人熟知的含义来指称将成为阶级社会的直接继承者的超越社会主义的一种未来的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1918 年布尔什维克用“共产主义”一词来与所谓的变质的欧洲社会主义决裂并声称开始一个真正的历史谱系时，这个词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租用生命”。从这一刻起，共产主义成了大写的共产主义，而此后，这个词的其它用法就很难恢复了。

正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卫星党并未放弃“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而是代之以宣称他们是唯一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者，这一事实并未使事情得到丝毫澄清。他们将马克思教义与政党组织结合起来，试图扭曲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循着欧洲社会主义传统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何党派。在 1914 年前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意指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而 1917 年后，它的意思变成了改良主义。共产主义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不仅否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凭证，而且把它当作本质上反动的、反革命的教义加以攻击（一段时期曾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一些社会主义者回应这种发展，创造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一种非共产主义的和对布尔什维克所实践的非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同时，它也不仅仅

指改良主义或改善的态度，而仍继续作为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之上的社会再组织。这种主张很难站得住脚，但它之所以出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支离破碎已经开始。从一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者正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意旨，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英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为此做了更进一步的语言学上的注解。为了表示他们与一个更广的传统相联系，这种转变也被阐释为试图把社会民主主义从一种欧洲社会主义内部的传统转向一种欧洲外部的与之相反的立场，这样做的结果糟糕透顶。

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语言的简短浏览已经提出了许多需要以后进一步思索的问题，尽管到此为止，详细记录下反映在各种社会主义的用法中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已经足够了。同时，这也可以作为有助于社会主义演进的那些发展的提醒物。例如，马克思早期对“社会主义”一词的厌恶是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社会主义的一个提醒物（正如与马克思主义相伴的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存在）。现在，还有了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此，我并不是要玩落俗套的游戏，从托马斯·莫尔追溯到柏拉图及其前人来细细搜索历史寻找社会主义的先驱，而是要注明这一事实，即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通常是透过马克思理论的至尊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控制棱镜来看的。

这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传统上被马克思主义传统开除在外，因为他们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是低劣的。当然，这种开除的方式是如此激烈，以致于似乎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职责注定要被马克思主义所替代。但是，这些 19 世纪早期的作者们的著作仍然有意义和价值，并且也确实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有不可否认的贡献。这种真实表现在欧文的通过合作达到社会和谐的观点中，表现在傅立叶能够滋养而非压迫个性的共同体生产计划，表现在圣西门重

组社会经济秩序的计划中，表现在蒲鲁东代表着一种分权化民主的互助论中。当所有的传统批评出笼时（即圣西门没有提起资本主义，傅立叶头脑发昏，蒲鲁东的逻辑充满矛盾，等等），当这些作者相对于马克思的明显的理论劣势被确认时（马克思自己就这么说），有一个事实是不能被抹杀的，即他们的确代表着对工业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个人主义的首次智力挑战，并且的确为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搭建了桥梁。

因此蒲鲁东培育了一种反集体主义传统，欧文培育了一种合作传统，傅立叶培育了一种极端自由主义传统，圣西门培育了一种技术专家治国传统。这说明如果简单地把他们都贴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因此就用一种概念取代可想见的19世纪早期这些富于想象的社会主义是多么容易令人误入歧途。但对马克思来说，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不能说出谁将带来社会变化，也不是因为他们要承担起变革社会的重任，而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误解了社会过程的性质。缺乏代表者就是其表现之一。他们沉溺于道德诉求和做公社生活的实验的癖好也同样说明问题。与之相反，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道德与需要相结合的对社会过程的解释。他将历史发展通过物质力量产生的各种形态的阶级社会来解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一种通过榨取领取工资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运作的剥削体系。但是，在造就一个无产阶级的同时，资本主义也由此造就了一个将超越它自身的阶级。这个被剥削阶级——一个特殊阶级，同时也是一个“普遍”阶级，因为它担负着全人类的解放——的革命胜利，将标志着阶级社会的终结和人之为人的人性本质的再发现（此前人性都被异化了）。由这样一份计划书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规划都确实显得相当贫乏。

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有了各种社会主义传统（或这些

传统的基础)，那么，在 19 世纪已有了与马克思主义并存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从与欧洲社会主义结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再一次回顾一下这个世纪的后四分之一岁月的这种趋势。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进程通常是以马克思对拉塞尔的智力胜利或对巴枯宁的政治胜利为标志开始的。但这模糊了一个事实，即在公民权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如在法国与路易斯·勃朗结盟，在德国与拉塞尔结盟），一种国家行为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在 19 世纪中期逐渐形成，而不是在后来的“修正主义”中突然诞生的。类似的，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争论常常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引为偏离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长征的恼人的精神错乱，而非与蒲鲁东（按巴枯宁的话说是“我们所有人的导师”）思想相伴以及被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和工联主义者连续不断地诉求于一种非集体主义传统的证据。同时，还有一种与布朗基这个名字相联系的造反传统，它们不把革命看作一个阶级的运动，而是看作一撮怀有阴谋的职业革命家的杰作。列宁提醒我们这一传统的存在。

我们应当看到，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中占据了优势。这种优势地位自 19 世纪 70 年代社会主义成为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工人组织的理论和运动后，得到了巩固。正因为其理论上的扫荡力和其赋予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非常恰当地为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这也恰恰是它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到 1914 年的第二国际时期扮演的角色。用著名的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乔治·利希海姆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年里，是“作为一种整合性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明显的整合作为各种社会主义传统最终被简化为单一形式的证据的话，就是误解。这种整合的意图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履行这种功能，但这种企图失败了。

对于 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社会主义的任何关注者来说，社会主义需要有一种整合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三种主要的传统就是见证。其中，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的组织为“社会民主党”。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分支——无政府工联主义的鼓吹者。还有一种是改良主义者，主要是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在法国，以保罗·布拉兹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奉行的民主集体主义也是其显著代表。因此，第二国际是 1889 年由两个相互竞争的大会同时在巴黎召集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是机会主义者（后者甚至据称在火车站击败了地方代表，把他们拉到了机会主义者自己的大会）。在这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却集中了相当多的精力来为这两个大会制造麻烦。第二国际的发动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是德国社会主义者 1875 年在戈萨（Gotha）的联合会议上成立的，该党随后在 1891 年艾尔芙特（Erfurt）会议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政党，从此开始按它自己的想象塑造第二国际。

在此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社会主义的重心，最初是在法国和英国，而此时已决定性地东移到德国了。德国人已经直面《反社会主义法》，创造了一个团结的党，构筑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组织，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到 1890 年，这个党已经在德国大选中赢得了五分之一选票。它的威望由于其领导人与马克思（直至其 1883 年去世）和恩格斯（寿至 1895 年）的传统联合而大增。因此，别处的社会主义者极力效仿德国人，也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说德国人是第二国际的驱动力，也是毫不奇怪的。他们领导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此时指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有纪律的党中所有的怀疑者的总括性范畴），1896 年，无政府主义思想终于被清除出第二国际。德国人还竭力通过第二国际把一致性强加到当时仍然有着丰富社会

主义传统的法国社会主义身上。1879年由盖德领导并组建的法国工人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他们受到工联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还有其他一些左翼的独立派别）这两支社会主义阵线的反对。法国社会主义内部的这些差异不断地溢出到第二国际中，成为社会主义不团结的令人尴尬的纪念品。

德国社会主义者速办了无政府主义者后，就开始设法让反复无常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遵守纪律。1904年第二国际的大会在各方面都达到历史顶峰。当时，试图适应不同环境来调整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和政治的分析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伯恩斯坦）受到了严厉谴责，传统理论重新得到了确认。然后，这种立场被强加到第二国际的各个成员党身上。法国社会主义者被号召在这个基础上团结起来，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社会主义的杰出领袖饶勒斯直到他1914年被暗杀，都一直同意把他的党员带进新党，新党的名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就说明了其缘起。于是，法国社会主义被从外部正式统一起来，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社会主义中统治地位及其把一个组织模式和教条强加到国际运动中的能力的表现。反过来，这也使第二国际能够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战争面前肯定并展现给人们以深刻印象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欧洲社会主义似乎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殷勤下，从歧义的传统中锻造出一种统一性，并且，这种统一性似乎扎根于一种稳固的理论阵地中。

这种稳固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这里的引号是必要的，指这种理论主体在第二国际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还应当记得，“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最早是被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辱骂马克思的党的一种闹宗派的形式，是马克思自己发明和使用的一种用来回敬宗派诽谤的术语（和“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一样）。但渐渐地，这个词失去了否定性的宗派斗争的涵义，而呈现出一种更为积极的倾向。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

的出版，扩大了马克思在欧洲社会主义中的权威，正如他为国际工人联盟（第一国际）起草基本文件时所起的作用一样。尽管短暂但引人注目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事件同样也起了在社会主义者圈子外提高马克思声誉的作用。因此，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的这一段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被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自然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们的著作此时就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内部和它们之间的社会主义辩论提供了依据，正如它同样重塑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性词汇一样。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扩大的影响反过来为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马克思主义分子通过作为一种整合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动员起来提供了基础。马克思的思想应当被欧洲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逐渐吸收这一点还不够，作为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还应当用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单一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就被整理为权威教义，成为人们所坚持的理论至尊，这种做法被（历史学家乔吉斯·豪普特）称为“霸权化过程”。这就需要对它的科学地位和完整性予以强调。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的领导人是卡尔·考茨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鼓吹“马克思主义权威”，来反对他所说的盛行的“折衷社会主义”（由马克思、拉塞尔、巴枯宁、蒲鲁东、罗德巴特斯等人的只言片语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胜利将根除这种折衷主义，也将保证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胜利。这个过程得到了恩格斯的鼓励，在他反对唯物论哲学家杜林的辩论文章（《反杜林论》）中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作为一个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升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作

为一个体系，它是一种自足的无产阶级科学这样就为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与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决裂的政治立场提供了智力支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支柱发挥着作用。它被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深思熟虑地运用：开始先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然后再推向国际范围，它被用来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单一的传统，安全地停泊在由其毫无争议的奠基前辈遗留下来的科学教义主体中。其他的传统及其追随者们将都能被它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别的远族传统都能架起通向它的桥梁，比如普列汉诺夫从俄国平民主义精心建构的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就整体来看，它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也同样是假货。这些持异议的传统在现实中既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吞没，也没有被政治权威征服。

这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扰乱了社会民主党行列的工联主义的复活中有明显表现。甚至在英国，贝亚特丽丝·韦布在她 1912 年的日记中也写到：

工联主义已经取代了老式的马克思主义。脸色难看、皱着眉头、骨瘦如柴的愤怒的年轻人如今都是工联主义者；油腔滑调的年轻工人们现在满嘴都是法国工联主义的措辞，而不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用语了。

类似地，无论第二国际如何斥责“修正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改良主义倾向实际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从未被镇压下去。修正主义者在理论层面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独一无二的、无可争辩的信仰的地位，而这个正统学说的政治实践也正在革命理论和社会民主政治的实际事务之间划下广阔的鸿沟。第二国际时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马克思曾简单地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批判的唯物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一

时期，这个理论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并被作为一元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提出来。事实上，当时还仍然有其它的理论 and 多元发展的社会主义；它们看似马克思思想之延伸的一个体系，实际上已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 1914 年及其以后，清晰得让人心痛。

传统及其分支

但是，即使在 1914 年之前，第二国际并没有包含所有可得的社会主义，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人们也无可厚非，这些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当时在整个欧洲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未阻止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别的传统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在英国，自 19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传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社会主义观点颇为不同。19 世纪初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复兴，经过宪章运动崩溃后的长期间隔，最初确实试图（由欣德曼领导）模仿德国模式建立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民主社会党。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其大型的日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长期定居都被认为应当是这一尝试的好兆头，但这个尝试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其它国内传统力量的发展。因此，威廉·莫里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对商业资本主义“文明化”进行美学抗议的罗斯金美学传统结合起来，其他的反资本主义的（尽管是非社会主义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被用来发展一种伦理社会主义。这包括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和为了社会的再伦理化而提出的作为一项事业的社会主义。这类伦理社会主义中的一种，开始与 1893 年成立的独立工党特殊地结合起来，并被工党领袖，如基尔·哈迪和罗伯特·布拉彻夫特明确表述出来，成为英国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要素。这也说明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必然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方面，这个党愿意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该党坚持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的（而这的确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拒绝）。

伦理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是基于手段而不是目的的。但是，英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派别是费边主义，这出现在一小群思想家和作家（其中有杰出的悉尼·韦布和萧伯纳）的作品中，这群思想家和作家在 1884 年成立了费边社，以渐进主义的集体主义为宗旨，这一宗旨在 1889 年出版的著名的《费边文集》中首次在公共场合亮相。费边主义由各种智力要素——特别是 19 世纪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教义以及进步的激进主义政论——搭配而成。它挑战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基础并声称发展出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更完美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更进一步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策略完全不适合英国环境，它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策略。费边主义提供了一个为了集体主义目标将占领整个国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坚决的立宪主义”（肖伯纳的话）策略，这个策略由一项证明这一过程已经在进行中，个人主义的力量正在增强的历史分析所支持。因此，1914 年之前，一种改良主义的传统在此与欧洲社会主义的主流分庭抗礼，尽管它似乎对流放于伦敦期间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罗莎·卢森堡看来，伯恩斯坦（其《社会主义进化论》成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经典读本）“的理论建构于他在英国建立的暧昧关系，他是通过英国眼镜来看世界的。”

英国例外论终结于 1914 年，但别的许多理论当时也归于消灭了。第二国际的崩溃是一个或更准确地说，是几个幻想的破灭。当德国、法国、奥地利社会主义者 1914 年响应爱国主义号召，投出战争信任票时，不仅扼杀了第二国际，而且使全世界无

产阶级大团结的幻觉烟消云散。它粉碎了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外的一支独立力量的幻想；它从国际和理论两方面揭穿了一个团结的一元社会主义的幻象；它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民主党实践之间的鸿沟。最重要的预兆是，它不仅结束了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时代，而且宣布了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主义传统都将深刻变换的新时代的到来。用研究第二国际的历史学家詹姆斯·乔的话说，“1914年以后，社会主义世界再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了。”科拉科夫斯基引申了这个观点：“1914年夏天见证了一个其影响仍伴随着我们，并且其最终的结果至今仍不能预测的过程的开始。”

用社会主义者的话说，战争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之崩溃为始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为终结。“第二国际被机会主义倾覆了，打倒机会主义！第三国际万岁！”列宁对1914年事件的反应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正式决裂的开始，这个决裂控制了此后20世纪剩余的大部分时间，直到1989年整副共产主义纸牌全部倒塌。这个决裂是列宁故意发动的，因为他坚持他所揭露的是1914年以前整个社会民主传统的堕落。这种传统鼓吹了马克思主义，但实践的却是改良主义；这种传统宣称与资产阶级社会划清界线，但在考验时刻却放弃了立场。当然，列宁在这所有方面都是正确的，但这与他从这一控诉中得出的结论相比却并不那么重要。一个可能已显现出来的合情合理的结论是需要与实践方面修正理论，但在组织布尔什维克为俄国革命做准备时，列宁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相反，他所谋求的是使布尔什维主义成为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的、真正的、革命的传统，为所有那些拒绝改良主义并致力于国际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分子提供一个重振力量的支点。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把这从一个教条说教转变成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这个计划把所有地方的社会主义者的序列打乱，

把所有社会主义传统压缩为两个敌对阵营。主流社会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被定为一个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止是一代人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这个地位，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活的源泉。在第二国际期间，马克思主义起码是作为一个开放的正统学说发挥作用的，对特别的异端邪说的人没有强制力，而且它也还得在给人深刻印象的理论层面的辩论中证明自己。而此时，它被命定为一个封闭的正统信仰发挥作用，它有官方解说者，这些解说者通过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传达命令，从而维持他们的解释。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企图保持一种独立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这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仍是一个少数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几乎没有人打算就这个连字符进行争论。

其它一些专门术语的变更确认了 1914 年之后的 10 年里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决裂。获取政权后，列宁的党在 1918 年通过采用“共产党”的名称，发出了抛弃“社会民主党”名称的信号。在这一年，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布尔什维克）重新定名为苏联共产党（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血统，标志着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1920 年正式通过的新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著名的 21 条中的一条政党管理规定使这一点更为清楚。成员党必须采用“共产党”标签，要言之，这一点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文件中是这么说的：

共产国际向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所有胆小的社会民主党坚决宣战。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必须清楚共产党和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旧的官方“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党”之间的区别。

要想夸大 1914 年到 1924 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几

乎是不可能的。在 1914 年之前，社会主义世界，虽然有一些异议和不同声音，但至少确实在表面上达到了组织和理论上的一致。但 1914 年后的 10 年里，社会主义世界却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它们之间展开组织和教条之战。由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核发执照的共产党对全世界一切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宣战。1923 年社会主义国际的重建就是对已发生的分裂的永恒本质的承认。社会主义分化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极，每一极都声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说 1914 年之前创造一个一元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尝试失败了，那么，此后，社会主义传统压缩为官方的共产主义和官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有组织的阵营也可能决非不恰当。这就没有给一个其传统既反感极权的共产主义又反感部分地回应共产主义挑战的社会民主主义孕育出的独立左派留下任何空间来向纯粹改良主义进一步发展。1920 年一群不结盟社会主义者在（所谓“两个半国际”的）议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组建一个社会主义“中心”的短暂尝试失败了。事实上，并不仅仅存在两种能够组织成敌对阵营的社会主义传统，但有很长时间，情况似乎就是这样。而这一时期偶然地但决非毫无联系地也是法西斯主义能够开始心怀不轨地进展的时期。

瓦解还是多样化？

这一简要描述显然并未就此削弱所描述的发展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地缘的根本转移，这个转移带有影响深远的暗示。社会主义的重心在 19 世纪就向东转移，从英国移向法国，从法国移向德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这个重心又在 20 世纪初进一步东移。但是，这种地理位置上的移动也标志着与 1914 年之前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假

定的显著分裂。这些传统的假定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含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成熟、阶级结构发达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将接替资本主义（接替的事实当然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假定），并且，社会主义将继承并拓展这些社会的民主机器和文化资本。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对这些假定提出了挑战，共产主义者花费大量理论智巧来用马克思主义教义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把它与将包围工业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世界革命的一般性计划结合起来。这份计划的崩溃说明在试图跟上国内国际政策不断变换的需求的日益回旋错综的努力中，需在教义上做进一步的智巧创造。

但是，社会主义在地理位置上的变化并不说明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传统而产生的难题。非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处于一个在其中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理论和组织事业而是一个现实政权（以及后来一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政权）的自我描述的世界。更进一步地，这个政权除了用公共财产制取代私有财产制外，似乎不仅缺乏事实上通常所允诺的并被假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部分的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而且还断然将之列为非法。因此，从 1917 年到 1989 年，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事实上存在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别的东西的环境中追求他们信奉的社会主义，这对欧洲和欧洲之外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破坏作用，并且为社会主义的对手在选举中争取支持的宣传战场上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弹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伊赛克·多伊奇曾说过的，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社会主义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地理变迁。如果说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中心拉到了东方，那么，向相反方向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此时就把自己定位到了西欧和北欧，特别是大不列颠和斯堪的那维亚。因此，在 1914 年之前的第二国际时期，处于欧洲社

会主义主流之外的英国，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成为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其间，无政府主义传统在南欧，特别是西班牙得以幸存。在这种地理上的破碎格局后面潜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毋宁说是一堆相关问题。可能一元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仅存在历史和理论缺陷，而且在文化上也存在着不足。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似乎并不存在，相反，经验似乎暗示着正像有不同类别的社会一样，也会有不同种类的社会主义。

俄国似乎说明，就策略与统治方式来说，在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规模巨大的工人阶级和发达的政治制度的社会里，也能实现社会主义。相同地，西欧那些稳定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似乎说明，另一种社会主义同样要求一个特定的文化基础。当然，对这种思维的一个反映是否定某些种类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因此，有些社会主义者说苏联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另一些社会主义者（有时候是同一批人）则说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难题的另一种反应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所有把自己描述成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和政权，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讲，抛去它们的明显差异，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必然是站在同一边的。这些反应尽管差异非常大，但都共享一样东西，这就是都坚持一元社会主义观。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构成问题上或持宗派主义观点或持包容一切的观点，但他们都承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单一性的东西。对此提出质疑，并不是要重新堕落到把所有决定性判断都搁置起来的无力的相对主义中去，而是依据证据，坚持这一观点：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种类，而且与不同种类的社会广泛地相匹配。这在 1914 年之前的理论层面很明显；在 1917 年之后的实践中也获得了丰富的证据。而在 1989 年之后的世界似乎一样真实。

从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环境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来思考，这

一点早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提出来了。当然，社会主义的民族范围是比在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中把利益传到社会主义者手里广泛得多的，但鲍尔的论点“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都牢牢地印在它的社会主义中”是普遍适用的。这个论点的一个含义，如同鲍尔自己想要指出的，正是不同的民族传统应当被允许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从事它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鲍尔试图在 1914 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内部辩论中对“民族问题”做出贡献的这个论点开始对后来的实践有着更为迫切的重要性。崭新的苏联不久就以其对本国各民族的镇压揭露出列宁在理论上讨论的民族自治在现实中的意义。相同地，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拒绝任何存在着多元社会主义的意见，而在它控制的共产党中只推行它自己的莫斯科模式。在饶勒斯的继承人、一战和二战之间法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列奥·布卢姆那令人难忘的习惯用语中，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外来民族主义党”。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自身恰是在社会主义采取的对待民族问题的方式上有影响的模范（或者，正如俄国诗人所说的，“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在 1945 年后的世界里，这种考虑呈现出新的兴趣和重要性。一方面，在西欧，作为对这些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作出的反应，社会民主党进一步趋于改良主义且与自由资本主义结成了永久联盟。这一联盟的最清晰的正式标志是 195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修正主义的巴特戈德斯堡纲领。西欧最重要的共产党以同样方式通过的“欧洲共产党”远景规划在他们与莫斯科的关系上采取多中心论，同样代表着与他们运作于其中的“民族”传统和解的一种方式（它所代表的别的东西只是在后来才渐渐清晰）。西方战后激进主义惊天动地的一年（1968 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期间，共产党面临着他们最大的担心——被踢出左翼。更富戏剧性的是，在欧洲以外，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和新的社会主义

运动蓬勃发展。这当中的许多，从毛泽东主义到“非洲社会主义”，明确强调他们民族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他们显然需要这么做，部分地是适应现实，但也是因为他们的经验距离经典的西欧社会主义的一些核心假定明显遥远（从经济发展、阶级结构、民族主义和除此之外的其它方面看都是如此）。可能因此，那些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毫不奇怪到常常对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反应冷淡（于是，毛泽东主义，对利希海姆来说，是对列宁主义的“幼稚模仿”，对科拉科夫斯基来说，是“稚气十足的”。）虽然他们的做法无疑经受住了考验，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用多元“社会主义”的视角而非单一模式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在此需要重申的是：我强调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我采取一视同仁的相对主义。而从它承认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正如某些形式的保守主义——可能更适合于某些特定形态的社会这个方面来说，多元社会主义的确含有一些相对主义成分（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可分的，或者说——用巴朗的话说——“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有发展为落后的欠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强烈倾向”），但这并未避开它们的区别，因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可能或多或少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相适应这个事实并不因此使它或多或少成为可取的或值得支持的。

有时候，人们不仅是一些西方社会主义者争论苏联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与那个社会的需求和特点是否是相符合的。这一争论，即共产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运作”的方式与资本主义不同，看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并非像后来那样不受欢迎。（简单套用克鲁史契夫（Khrushchev）的评论，即苏联用吨来测量产量的结果是枝状吊灯不可避免地把天花板拉塌）。而在此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看起来却令人难以置信。但即便关于适应性的争论能够

得以维持，这也不能使苏维埃共产主义更少专制或更值得从那些把自己描述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那里获得支持。这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的 20 世纪末可能比在更早的时候明显得多。

这里的陈述试图说明的是，现代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并不存在一种一元的传统。一方面，这代表着一个理论分裂的过程；但从另一个也是更合宜的方面看，它也是社会主义总以其多样性著称的必然纪念品。在很长一段时期，特别是冷战时期，这种多样性被压缩为官方共产主义政治集团和敌对的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政治组织之间的对立，很容易就被忽视了。现在它又伴随着承载它的不同种类的传统重现了。但是，它所重现的环境已经变了：共产主义传统已经崩溃，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也面临着自身许多以前的传统崩溃后重塑自身的任务。这是一个不仅确认社会主义传统的多样性而且确认它们得以建立其上的基本思想变得重要的环境，这也正是下面章节阐述的意图所在。

第二章 争 论

显然，社会主义一词不止一个含义。

——R.H. 唐尼

社会主义传统的多样性反映在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中。“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同样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答案。如果社会主义的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那么与这些传统有关的各种思潮和争论也不得不用同样多元的术语来探讨。因此，问题的更确切提法应当是“某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其思想和争论是什么？”

定义与难题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不乏有效的界定，但缺少的是达成共识的定义。的确，除此之外还能是其他什么呢？只要我们还没想出一些兼容并包的词来，概念的偷换就难免会开出许多无害的玩笑来。当然，界定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特征是可能的，无论这种社会主义是既存的还是人们向往的，是喜好的还是贬抑的，但这是一项不同的工作（虽然它常常装作是相同的）。因为这样有人就可能只根据某些基本特征来界定“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这里形容词（民主）指出了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但

具有结论性定义的名词（社会主义）却在与之密切相关的政策与实践层面留出了许多未定的空间。然而，为了解释所描述、捍卫或攻击的是什么东西，像这样尝试进行限制性的定义是可能的，也是令人满意的；但在理解时要注意所探讨的只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试图涵盖社会主义传统的全部。留意一下以下一些从新旧社会主义词汇中摘取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吧。虽然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和赫伯特·莫里森的“工党的所作所为”作为组织化社会主义的原本观点本应包含在内，但这种诱惑或许还是应当被抵制的好。下述观点都试图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构成：

（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状态，在那里生产资料或至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为公共所有和支配；一切行动都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而不谋任何特权和私利，一切都遵从人民的决定，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查尔斯·泰勒

一个社会，它已发达到能为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社会主义者）提供自由的、创造性发展的机会。

——加乔·彼得罗维奇

国家将其所得在全体国民中平均分配，并且把这种平均分配的维持当作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宪法的根本所在。

——萧伯纳

一种制度模式，其中中央政府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进行控制，或者正如我们所说的，作为一个原则，社会经济事务属于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

——约瑟夫·熊彼特

一种社会秩序，所有人都拥有最大可能的平等权利

去接触经济资源、知识文化和政治权力，而受到其他个人或社会团体支配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汤姆·博特蒙

一种社会秩序，它基于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更高的社会和经济保障，以及较之利益驱动下的工业经济自发产生的价值观更强调共同体的价值。

——理查德·洛温塔尔

经济制度中社会所有权占支配地位，政治和经济实行民主。

——亚力克·诺韦

人类以民主的方式有意识地控制个人、社会和自然环境达到一个最大可能的程度。

——加文·基钦

即便是如此简短而随意的定义浏览，也已很好地表明要想确切表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多么地困难。这里没有哪个定义承认它指的是某种特定版本的社会主义，但有些是有明显倾向的，这可以从其复杂的条件句中看出。对民主的不断强调使这一点显得清晰可辨，因为其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非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这是一项必要的义务。就像乔治·利希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要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也可以要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两者能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等大事。”我们不应假装把民主社会主义定义为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显然不是——从而回避这个问题。20 世纪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逃避这种问题的办法或许是断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不管它还涉及其它什么内容。换句话说，社会

主义是非资本主义。然而，如果把这当作根本性的定义，显然也不太合适。这部分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们对公有制的重要性的程度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此外，公有制体系很有理由被认为是非人人平等的和不民主的，甚至与许多社会主义者认定的基本目标（还请利希海姆原谅我的看法）背道而驰。更为困难的是，公有制可能是集权的（正如熊彼特所坚持的那样），而这将受到那些社会主义传统中分权论者和自由论者的反对。

一个更为可取的办法看起来是试图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如平等和公平），然后再根据结构和程序（如公有制和税收再分配）使这些价值产生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首先界定社会主义的价值或目的，然后探索这些目的应当如何实现和推进的适当方式。然而这种办法，除了它明显的优点外，将会受到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价值不能脱离一定的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是实现社会主义（例如，普遍的、非阶级的）价值的前提条件。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倾向于放弃由正义和平等这些困扰小资产阶级的言辞构建的社会主义道德。纵使这种放弃不被允许，价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要想达到定义上的连贯性和显著的一致性，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例如，社会主义可能涉及平等，但究竟是何种类型的平等？它要达到什么程度？此外，如果社会主义价值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话，（看起来完全有这种可能，例如自由与平等，个人与集体等），那么这些价值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紧张关系呢？这些关系又该如何处理呢？

考虑到这些，我们所列举的种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从散文式的和制度化的（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支配）直到最大胆、最人道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作为所有社会主义说法中最大胆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就填平了这个鸿沟——无产阶级的胜利改变

了生产方式，从而实现了人道主义和非异化的创造活动。然而，这还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说法，虽然它对哲学进行了一次扫荡，虽然其追随者把它当作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从中可以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但问题仍然存在，其他社会主义者也在作出他们的回答。社会主义应被看作是阶级的胜利还是思想的胜利？是大众政治和知识理性传统的进一步实现，还是与那个大传统的决裂？是科学的，还是道义的？是革命的，还是进化的？是集权的，还是自由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在为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论争提供了素材。

普通立场与非凡立场

浏览一下某些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较早的一些定义暗示着一个可能的出发点。这些定义表明社会主义者感兴趣的是提出一些社会目标（诸如平等和共同体），当然他们也认为就这些目标而言，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旨趣迥异、大相径庭的观点所具有的共同出发点就是对由资本主义大量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所作的社会主义的批评。这个秩序被不同的人指称为市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不管叫什么，它都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社会：追求私利、讲究契约、自由竞争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的社会纽带解体了，受道德约束的、自治的经济生活建立起来了，除了那些源自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之外，没有什么共同的社会目标。这种个人主义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一书中有着经典的描述：

葛搦硬先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得出钱来买。不通过买卖关系，谁也决不应该给谁什么东西

或者给谁帮忙。感谢之事应该废除，由于感谢而产生的德行是不应该有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的话，那么天堂也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地方，那么也就没有我们的事了。

社会主义者就是惯于针对这种个人主义发动攻击。实际上，“社会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就这一点来说，要比强调竞争的个人主义更为进步。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被攻击是因为它的生产只是为少数人创造财富，而给更多的人带来的却是苦难。这样，对个人主义的指控表明了社会主义者的两个观点：对一定价值的关注，以及宣称这些价值被否定的原因是一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因此，社会主义论争就集中到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哲学——个人主义的攻击之上。表一列出的是悉尼·韦布在其《英国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新社会主义和旧个人主义所作的有趣对比。

表一：新社会主义和旧个人主义的对比

| 激进个人主义 1840——1874 | 激进社会主义 1889 |
|----------------------|---------------------------------|
| “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 “最好的政府是能够安全而成功地管理最多的政府。” |
| 推论：只要能给承包商“甜头”，那就给他。 | 推论：共同体的集体组织只要能不用承包商或其他企业家，那就不用。 |

| | |
|--|--|
| <p>“要给私人工业企业最大可能的机会。”</p> | <p>“只要有可能，日益扩展的公共服务产业就应当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被组织和控制的。”</p> |
| <p>推论：使有利可图的垄断权发挥最好的社会效用就是将其交给一些幸运者去大发其财。</p> | <p>推论：每个工厂除了给实际的管理者应得的报酬之外，其余产出应当归市里所有或国家所有，或者被征以特别的税收。</p> |
| <p>“法律规范下的公开竞争和完全自由为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提供了最好的保证。”</p> | <p>“只有逐步增强法律规制才能避免把好的对手驱逐出局的恶性竞争。”</p> |
| <p>推论：约翰·布赖特认为造假只是竞争的一种形式，也即奥博伦·赫伯特所谓的“个人主义”。</p> | <p>推论：“现代的治国者会告诉你自由的个人竞争并非工业应当信赖的准则。”（约翰·莫利：《科布登的生活》，第一卷，第八章，第298页。）</p> |
| <p>“人们渴望的‘机会均等’的目标可以通过给予每个人对其所拥有的财产的完全所有权而最终实现。”</p> | <p>“其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甚至要接近‘机会均等’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完全私有权还存在于土地和其他经济垄断当中。”</p> |
| <p>推论：“维护自由和财产联盟”的政策。</p> | <p>推论：土地和其他经济垄断的“国有化”或“市有化”的政策。</p> |

| | |
|------------------------------------|--|
| <p>“最好的社会状态来自个人按其最佳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p> | <p>“社会繁荣是独立并超越个人利益的，而且必须作为终极目的来认真地追求。”</p> |
| <p>推论：“私人的恶使社会受益”。</p> | <p>推论：对社会科学和政治艺术进行研究。</p> |

资料来源：悉尼·韦布：《英国的社会主义》，1890年版。

对个人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总是成为社会主义论争的常见依据。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掩藏着的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它关于竞争、自利的价值观给人类的团结友爱设置了障碍。它阻滞了个性的发展，破坏了形成真正共同体的可能性。它让私欲得以膨胀，却使公共需求受到忽视。尽管提出的方式各不相同，但这些指控却是社会主义词汇中所共有的。它至少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以及它反对的是什么。它是非资本主义的（至少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和反个人主义的（当然不应与反个性混淆起来）。然而，这还只是消极的判定，并且掩盖了社会主义论争从这一共同基础出发而发生的不同的、常常相互冲突的形式出现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但理由却不尽相同；他们或许也都偏爱社会主义，但也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且理解的方式也不同。

在一个相当基础的层面上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些社会主义者在攻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确实攻击了现代化进程；而有些却是现代化的热衷者，他们攻击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在这方面的低效率。因此，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可能指责新资本主义“文明”的原子论、自然情感的堕落，希望重建一个更为有机的共同体；而其他的如圣西门可能为新“个

人主义”而兴奋不已，同时希望其潜能能从个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攻击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必须瞻前顾后，看看失去的往昔和崭新的未来。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其所面对的时代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又站在时代的对立面，以浪漫的情怀反对这个新社会。马克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早期（以及后来）关于非异化的、“完全”的人的概念和他关于资本主义带来的无情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这个概念是相提并论的。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创造性的、非异化的人的条件或许可以解决这个模糊性问题，或者至少可以减少模糊性使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早期争论大部分是由于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定位不同，这些争论后来继续引导着不同方向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者一边继续抵制现代化的“逻辑”，而另一边又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担当了现代化的排头兵。

社会主义的地位和取向问题总是出现在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中。自由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受到拒绝（被指责为个人主义）呢，还是作为启蒙运动的自由传统融入社会主义当中并付诸实践？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是标志着与现存社会的决裂呢，还是它的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消极的一致性——它对资本主义下的个人主义的攻击——很容易成为直接接触这些问题的障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它的主张的阶级实质已经揭示得够多的了。当社会主义者使用“工资奴役”一词时，他们是想把自由主义最标榜的解放成就看作一句空话。但这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其占主要地位的自由传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问题。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以其独立而完备的无产阶级文化独立于资产阶级社会大厦之外，它用无产阶级科学武装自己，准备迎接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建立新社会的时刻的到来。它将不再

是旧的延续，而是一种广泛的对立、广泛的决裂以及最后的超越。

然而，另一种看法却认为通过将其主张从阶级转变为更一般的措辞，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自由主义章程的延伸和实践。如果说前一种看法为革命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后者则成为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核心。这个传统承认它是同一文化体系如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并对自由主义主张提出挑战，以实现革命任务的方式来延伸它。因此，它主张自由如果想要变得普遍的话，就必须由平等来滋养，这就包括将其领域从政治扩大到社会和经济方面。伯恩斯坦写道：“确实没有什么自由的概念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的。”饶勒斯也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人权宣言》以完全的意义”。就这种观点而言，社会主义者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用1868年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民主要真想成为民主的话，就必须成为社会的民主”。

争论及其模糊性

自由主义的模糊性反映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争论中，而且对社会主义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1917年社会主义的重心从西欧移走以后，它自身的自由传统也移走了。人们已不再假定社会主义会建立在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或者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自由和民主的。这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假定。但这些本质特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已难以维继，因为它变得必须要么拒绝自由传统要么加强社会主义与它的联系。法西斯的出现使得事情更加迫切，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面临可证明为更糟的事情时是否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这些经验的确揭示了20世纪一般社会主义立场的一系列紧张，这些紧张支持

与社会主义传统的背离。

换个方式来看，很明显，社会主义争论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至少其中的某一些代表着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类型。例如，自由社会主义总是作为组织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前者描述了个体的解放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压迫结构的根除，并且经常用小共同体的自我取向来进行思考。它运用自由和自发性的语言来描绘它的目的。相反，组织社会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不自由少于它的无秩序。它像它所相信的那样寻求用社会主义计划和效率取代资本主义竞争的混乱、浪费和无计划。圣西门的著作作为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明确的早期来源。他认为新工业社会需要一个能够进行理性计划的组织体系。特别地，这包括由主要的生产者集团运作的“行政”对“政治”的取代，“以便形成一个普遍的组织系统，直接指向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工业目标”。

虽然这里提倡作为科学理性的计划，但它却不是中央统制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实际上，它明确拒绝政治集权主义而偏爱生产者自我管理的形式作为适当的组织模型（借此涂尔干才能够成功地借用圣西门来形成他自己关于工人社会主义的说法。由此抽象出通过生产者民主的连接线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拴在一起）。尽管如此，一般说来，组织化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和集中计划作为它的工具，并反对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分权和生产者控制。它既存在于费边主义改良传统，即通过它的集体主义寻求像萧伯纳所说的那样“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国家里”，人存在于统治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中。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的、自我管理的主张长期以来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定义外运作。这个定义由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主流的共产主义传统所提供。

作为理性的社会主义总是忍受着很多社会主义争论。在这里资本主义较少因为不公正和剥削而受到指责，更多的批评是针对它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所表现出来的纯粹非理性。的确，资

本主义的不公正——它为少数人创造福利而给多数人带来灾难，已经说明它无法以理性的方式来安排经济和社会生活。因此，H.G. 威尔斯（在他的《古人的新世界》中）描述社会主义者是怎样

需要一个完善的组织来处理那些具有集体重要性的人类事务。他说，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制造一大堆必需品、获得和分配食物、经营各种业务、生育和抚养孩子、任由疾病孳生和蔓延等等，这些方式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是如此糟糕以致于这里是一片艰辛，那里却一片浪费；这里是放纵和堕落，那里是贫困与死亡。他宣称为了这些集体的目标，为了满足那些共同的需求，人类出现了遵从乱民的方式，而实际上它应当遵从军队的方式。取代这种无秩序的个人奋斗的是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努力和计划。

按照这种观点，那么，社会主义不是被剥削阶级的胜利而是理性的凯旋。竞争是浪费和混乱的，而且阻碍社会对集体性问题的解决。

这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论点。它把社会主义直接放在启蒙传统之中并把它当作这种传统在当代的最为合理的载体。它进而显示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阶级的事业，而是理性人类的共同事业。这使得社会主义能够吸引那些对这项事业有职业兴趣的团体的成员。它也有助于解释，如 30 年代的苏维埃计划与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竞争和无组织的后果相比较，更具有吸引力。苏联“没有失业”的事实很容易使它看起来像个非理性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理性的灯塔，它表明了社会主义计划取代资本主义竞争将可

能出现的情景。然而，它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理性转向理性的强制统治的趋势，不论是通过被赋予超人意识的列宁主义政党还是通过贝亚特丽斯·韦布的“谦逊的专业精英”（韦布夫妇热爱苏联的事实看起来较少个人癖好，而更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纪律和理性秩序所产生的一种奇怪吸引力）。社会主义理性需要它的监护人，就像它需要压制“非理性”因素一样。

当然，社会主义应当被看作既是一个阶级的事业，也是理性人类的共同事业。作为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被认为是解救被剥削阶级所遭受的不幸的处方，而这个阶级的胜利却可以看作是对整个人类所遭受的不幸的解救。这种信念可以很容易带来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什么比这个阶级的胜利更重要，其他所有的阶级都必须受它的控制，因为人类自身的未来要依赖于它。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用阶级分类来构建他们的论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阶级剥削的体系，而社会主义是消灭或至少制止这种剥削的工具；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阶级分析和阶级运动的问题存在分歧。如果社会主义关注的是阶级，它是否不关注个人？如果它关注阶级权力，它是否不关注社会公正？如果它关注的是阶级剥削，它是否不关注其他形式的剥削？如果它是一个阶级的运动，它是否不是民众的普遍运动？

科学与历史

这个问题用来划分不同社会主义立场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为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答案，因为它强调生产方式的集中及其阶级属性对社会形式的决定作用。马克思的著名观点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着很好的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社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里提出的一些概念多年来一直作为大多数社会主义争论的基本素材。注释原著所带来的激烈争论和复杂运用现在看来可能显得有点过时，但这些争论仍是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历史的关键所在。

有些争论属于“马克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的类型，它们在“条件”和“决定”等术语上争论不休，都想说明马克思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或者不是决定论者和社会法则的提供者。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确都是这样去读他的著作的，但那不完全是马克思的错。同样，其他社会主义者否认他们会接受马克思的决定论，即使他们已经接受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集中的一般论述。从传统上看，马克思主义者已或多或少采用严格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作为社会分析的一般工具，而其他社会主义者却坚持认为“上层建筑”（比如政治和国家）有着更为独立的作用，并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这个范围内运作。然而，马克思的系统阐述的确揭示了他的分析的阶级属性，并排斥其它研究方法，包括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在内。马克思的分析单位是阶级而不是个人，因为个人只是在作为阶级成员的意义才具有社会重要性，他们完全是社会的产物。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意识产

生和社会变迁过程的问题，但对其他社会主义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无法接受的对个人的贬抑。

这个基本差异也反映在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其它含义中。它意味着拒绝任何其他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包括对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和价值观的构想以及对实现手段的设计。这种研究方法如果单纯从受社会决定的生产理论的角度来看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乌托邦的、不切实际的和非科学的。同样，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与那些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之间存有争议，后者要求以诸如“平均”或“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因为这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需求和回报的方式，这种方式模糊了社会分配的真正决定因素——生产方式的阶级属性。因此，卡尔·考茨基解释了一个大量论述分配原则的早期社会主义是怎样被另一种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后者认为“一个共同体中产品的分配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体系决定的”。某些社会主义者，以及许多批评社会主义的人可能坚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分配理论，但它实际上是生产的理论。这使得斯大林能够把消费平等的观念当作“只适合原始修道士团体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荒谬观点”加以摒弃。

这种摒弃使隐藏其后的科学社会主义受到重视。它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在很多时候希望在世人面前呈现一副科学理论的面孔——虽然这不是它的唯一面孔。作为社会道德的社会主义并不总能与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共存。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分标志着后者的灭亡，这一幕历史性的葬礼已被广泛接受；然而事实是，像圣西门这样的“空想家”声称自己在本质上是社会科学家，而“科学的”马克思，至少有一种观点认为，看起来像个极端的理想家。科学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科学，能够解释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动力。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历史科学——它能够确定历史变革时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社会科学

——确定当前社会的阶级基础和经济科学——确定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者宣称掌握复杂和完备的社会分析方法，它能够产生真理。方法和真理两者都得到坚决的捍卫，因为它们构成社会主义的独特地位。而其他社会主义者所做的只是区分科学上的真实和伦理上的需求，并对后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科学上的真实也有可能变成历史的必然。过去许多持不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论者常常感觉良好，都认为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指明无情的集体主义的历史进程的费边社改良主义者是这样，满怀信心等待资本主义瓦解和无产阶级创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时刻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描述了即将开创伟大历史高潮的进程：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是一出剧本已经写就的历史剧，无产阶级要求在适当的历史时刻扮演它的角色。它所展示的图景仍与过去一样：社会主义者等待资本主义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危机，无产阶级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已变成一个长期的和没有结果的等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争论都属于这种类型。许多社会主义者否认任何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因为即使资本主

义消亡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别的东西。同样，工人阶级在扮演其角色时也有可能失败。不论社会主义是否是历史的必然，这本身不会使它成为令人满意的。因此，有些社会主义者拒绝历史而倾向行动，不论是超越任何关于历史成熟或力量均衡的精确判断的暴乱行动，还是包含对自由选择理想的追求的更温和的行动。当 R.H. 唐尼敦促人们“选择平等”时，其实是让人们去创造历史，而不仅仅只是对他的敦促做出回答。

价值观和多重性

在认真对待价值观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大家广泛认同平等是核心价值，或许就是社会主义价值本身。社会主义注意到社会的结构，并寻求用平等的结构取代不平等的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实际上，这含有对平等价值的道德承诺，因为如果不能举例说明平等本身的话，是无法充分揭示事实的不平等的（用道德的术语来说，就是站在种种自由、进取、福利等基础上抵御不平等的进攻）。因此，社会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人人平等的观点来坚定他们的承诺，还提出平等主义的主张作为这种基本立场的延伸与应用。唐尼的《平等》仍保持着这种或许是最有力、最持久的观点，但即使这样也只是提醒我们要得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关于平等的这一结论是多么的困难（例如，就像 C.A.R. 克罗斯兰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所探讨的那样）。这部分由于社会主义者对平等信念的内涵存有不同意见，有的人信奉把平等视作单一、绝对价值的强硬的平等主义（如巴伯夫在《平等者宣言》中所说的，“让人们之间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分别。”），有的人信奉温和的平等主义，他们区分机会平等和机会本身，并致力于消灭仍无法明辩的种种不平等。

然而，这还不是把平等尊奉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所遇到的唯一困难。更大的困难在于社会主义信奉的价值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社会主义的地位正是由这些价值观形成的。例如，社会主义者既拥有平等，也同样拥抱自由，并不想让后者为个人主义者所霸占。有的社会主义者错误地创造了“社会主义自由”一词，这与它（自由）的“资产阶级”说法没有丝毫关系（就像他们发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却与资产阶级议会政体毫不相干），但其他社会主义者却既要平等也要自由，并且把平等概念推进了一步：不仅对自由的主张保持敏感，而且要对它进行扩展和延伸。实际上，在某些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平等”是为了追求“自由”才提出来的，借此可以扩大大多数人行为和选择的自由。克莱门特·阿特利断言：“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这并不是社会主义争论中唯一把平等看作是为其它价值服务的工具性的社会主义价值的说法。把平等看作是社会主义中心价值的人常常由于更进一步的观察（像唐尼那样）而认为平等事实上发挥着促进诸如博爱、友谊、公民权和共同体等价值的作用，而这些价值才是根本性的。

由此进一步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终极目的的性质和范围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平淡无奇的，也有超凡脱俗的。社会主义捍卫福利和安全，要求结束由资本主义引起的贫困和失业。如果有人反对说这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一个干脆的回答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相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确切内涵。其他社会主义者超越这种福利目标，认为社会主义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对社会生活有着更大的影响，产生像安奈林·贝文所描述的更为“安定”的局面，或促进企业、共同体和其他合作组织的发展。当然，这并不能穷尽社会主义的所有要求。在某些人看来，例如欧文，人性的变迁是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其中最为雄心勃勃的观点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重塑人性，恢复由废除受社会决定

的人的异化带来的人的统一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说明书。在这种科拉考斯基称作“对完美整体的梦想”中，是一种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集体与个体、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融合。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诸多反讽之一，因为这种融合的确在 20 世纪实现了，而且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的，但这种形式却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决创造性的解放相去甚远。就其自身历史来说，这个梦想是否产生梦魇则是另一回事。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没有单一的社会主义论题，就像没有单一的社会主义传统一样。而且，社会主义论争不仅具有多样性，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紧张、模糊，甚至是冲突。表二试图用速记的办法勾勒出一些社会主义论争的轮廓。

表二：社会主义论争的轮廓

| | |
|------|-------|
| 学 说 | 价 值 观 |
| 历 史 | 行 动 |
| 决定论 | 进化论 |
| 革 命 | 改 革 |
| 生 产 | 分 配 |
| 理性主义 | 道德主义 |
| 集权主义 | 分权主义 |
| 阶 级 | 个 人 |
| 平 等 | 自 由 |
| 国 家 | 社 群 |
| 现代化 | 复 兴 |

| | |
|-----|------|
| 福 利 | 整 体 |
| 命 令 | 自我管理 |
| 官僚制 | 民主制 |

需要强调的是，表二所列举的只是简要地说明社会主义争论的某些领域和紧张关系。它并非无所不包，每个观点都可以列出其他的概念。相应的两组也不是互相对立的，因为那常常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此外，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能够而且的确可以容纳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学说与价值观、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平等与自由。然而区别是重要的，这至少说明它们维系着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伦理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基础不同。诉诸历史的社会主义与诉诸人的精力与意志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建立在国家之下的社会主义与建立在社群之上的社会主义也有所区别。一个依靠命令和计划的组织社会主义不同于实行直接民主和自我管理的自由社会主义。改善和劝说的改良式社会主义与破坏和超越的革命式社会主义的基础不尽相同。允诺更为安全、更为平等、更为自由或至少更为“宽容”（借用奥威尔的概念）的社会主义，其抱负是不同于允诺对人类现实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造的社会主义的。如此等等。

这些紧张关系并不构成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但它们的确表明不同种类的社会主义所发展的领域的类型。当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论争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是在同一地方的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形式。新的事实证据拓展了争论的范围或是改变了它的焦点。因此，“既存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从教条社会主义得到一个回应，后者坚持一个与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特征相关的特定观点。同样，女权主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在传统上把眼光盯在工资经济上的阶级剥削，却没有看到家庭经济上的

性别剥削。全球经济的变化特征，20世纪末市场自由主义的复兴，阶级结构的转变和传统社区的破裂，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事实检验并发展着社会主义争论的全部内容。当这些争论得到发展和重申时，社会主义理论也得到重新估价（就像过去作为经济决定论者的马克思与作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的无止境的循环再生）。社会主义的地位是由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构成的（例如，国家与社群、计划与自由、平等主义与多样性、团结与机会、规制与市场），除非相信没有这么多紧张关系存在而只有一种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这种信念是无法维系的。此外，一度声称要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内部的紧张关系的伟大的马克思式的“综合”连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很久以前就在那些紧张的压力下分崩离析了；1945年后西方的社会民主的解决方式也同样分崩离析了，西方社会逐渐地散了架。

在我们考虑如何给种种社会主义定位之前，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们的来源以及我们可以从这种观念的历史中学到什么。所以，随后的部分大都是通过对传统的核心问题和紧张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来探究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它的方法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结构形式是什么？谁是创造社会主义的行为者？然而，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第三章 学 说

从最简单和最基本的概念上看，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经验理论，也是一个道德学说。

——伯纳德·克里克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争论，诸如关于目的和手段、策略和行为者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更为基本的区别，它影响着这些争论所采用的形式。实际上，正是这个区别界定着社会主义的地位，因为它标明社会主义争论所由以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区别在先前所讨论的紧张关系——科学与价值，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中曾出现过。社会主义表现为两种学说：分析和解释的实证学说以及道德和价值的规范学说。

学说的类型

指出这个区别并坚持它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实际的社会主义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学说基础作一简洁的区分。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往往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道德主义者，他们把理论的分析 and 道德的评价结合起来。两个学说的争论是相辅相成的，每一方都可以从对方得到启发，来拓展他们的论题和加强他们的立场。例

如，英国早期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是所谓的里卡德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剥削理论和关于价值的劳工理论，一个是欧文主义者关于市场资本主义的道德教义。这种二元性在后来的英国社会主义中得以延续，比如费边理性主义关于经济“租金”的理论，它把关于剥削的分析扩展到资本家和地主身上（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体现在它的集体主义学说当中，就与伦理社会主义者和独立工党共同提出的道德论题掺和在一起。而且，如果社会主义的道德家们准备扩大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提倡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往往会得到理性主义者的火力支援，虽然最严格的理性主义者常常一交锋就击中道德主义的软肋。

也许软肋的比喻的确不如坚韧的内皮来得恰当。这在马克思身上表现得很明显，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发现，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且是道德热情的问题。通俗一点地说，马克思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身上，但仍是他成熟期思想的核心——形成他的社会主义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又反过来支撑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共和色彩的价值观，它指向资本主义之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新恢复。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的：“有的人认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把个人压制成被剥夺了所有主观能动性的孔德式的普在物，这种看法是研究他的著作时产生的最为荒谬的误解之一。”即使是枯燥的老费边社成员也运用他们精巧的历史社会学的技艺来构建集体主义的谱系，并成为研究道德共同体和社会共识的理性主义者。

因此，理性主义者是道德主义者，而道德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不论他们看起来是这样还是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只是证明社会主义是而且必然是一门兼具两种意义的学说。它在哲学上解释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优越性，也在理论上说明了社会

是如何真正构建的，以及这种结构的决定因素。这种必然的二元性看起来可能会削弱构成其基础的区别的重要性，但是看一下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两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就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至少社会主义者把它看作是跟他们想要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普遍的社会主义立场同样重要。作为理论的学说并不总是与作为价值的学说紧密相连，即便它们是必要的和天然的搭档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可能共同存在于那些不是正常所希望的或者甚至被正式否认的地方。有些社会主义者看起来喜欢用一种风中笛声般的道德主义呢喃来自我满足，而这一舒适的位置在他们因与资本主义和官方的合约而不得不弄脏双手时被证明是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正如拉姆齐·麦克唐纳所发现的那样）。其他社会主义者拒绝所有的价值语言，用一种包含所有答案的“科学”学说把自己包装起来，这种姿态在历史进程不断提出的新问题面前露出了无能和失败的迹象。

当马克思第一次向空想社会主义者开火时，他把他的对手描述为“脱离实际的空论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他把社会系统看作是个别思想家（“小资产阶级”）精神的产物，乌托邦构想是适合不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写道：

只要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这就是脱离实际的（空想的）科学和革命的科学之间的最初的区别，而且是抬高后者、贬抑前者。一个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反动的），另一个是安然扎根于历史进程之中的，并代表着这一进程的进步代表的阶级的观点。因此，诸如蒲鲁东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个进程，并简单地阻止无效的和落后的社会秩序，沉溺于对竞争体制作简单的道德批评。

因而这意味着对“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的说的拒绝和对另一种说法的发展。攻击的目标是构成科学研究方法的错误的和不成熟的概念，以及在社会主义争论中对道德的完全诉求。应该重申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夸大了对科学地位的要求，比如说圣西门就相信他是工业社会新科学的奠基人。我们也应该记得19世纪是这样一个阶段：受自然科学声望的影响，启蒙运动的传统以各种方式激励着社会思想家去着手建构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社会历史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模式化的过程，人们通过种种努力想把这些模式解释为社会规律，可以用来指导未来，也可以用来解释过去。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人把马克思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全部传统的创始人。

这个基础仍是困难的和足以引起争论的，但为了当前的目的，还有许多观点需要阐明。例如，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与由他的遗产形成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些区别。看起来清楚不过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模仿自然科学，即使他情愿放弃一些他所偏爱的联想以换取这种模仿的产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科学”要求扎根于可观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运动的现实当中，而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荒诞的”科学。它在本质上是个需要实证的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希海姆才能说“只是在马克思介入之后，社会主义者才开始明白资本主义是如何真正运转的”。然而，它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宣称发现了

“历史的铁律”。实际上，马克思在晚年时还在嘲笑这样一种观念：“把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当作万能钥匙，而它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相反，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应当被看作（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个指出一般条件因素的“引线”，而不是决定性的铁律。因此，马克思著作的现代阐释者们才能够把他的社会理论的实质说成是一个“研究假设”（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其中的一个阐释者特雷尔·卡弗）。

然而，即使所有这些已得到恰当的说明，还是有些话要交代的。如果马克思的一般社会理论——其关注的焦点是技术的核心作用和生产方式，可以这样看待的话，那么他的更为精密的经济学理论——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矛盾、危机和崩溃的动力解释却并非如此。没有理由说这具有研究假设的特征，它所具有的是能被证实的因果分析的必然性。而且，正是作为成熟的经济学家和科学的资本主义分析家的马克思，为后来的用经济规律武装起来的广博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此外，即使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按这种趋势提出来的而不是作为一个严格的决定论，事实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一个体系。它是无所不包和自成体系的，它不需要进一步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当中吸取养分；也不需要得到其他学科的帮助；并且，如果有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话，那也只有一个科学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

因此，部分地从理论必备的开放和经验意义上看，但同时也从与什么构成科学这一特定观点想联系的闭合意义上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都是一种教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有两个引申的特点需要注意。第一，马克思的学说宣称它结合了分析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包括要确定一个代理人，通过他这种结合才能生效，历史进程才能自我完成。当然，对马克思来说这个代理人就是无产阶级，但这个代理人的发现看

起来更像是个哲学活动而不是经验活动。在《神圣家族》中可以见到这样的系统表述：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是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即使马克思能够部分摆脱一些传统批评者对他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肆意攻击，事实仍是他的立场所代表的不像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方法或一套分析工具。它是一门关于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动力的学说，它包含着过去和未来并以共产主义为终结，同时也宣布“史前史”的结束。

第二，按照这种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的立场代表着对作为道德学说的社会主义的最清楚、最根本的拒绝。需要重复的是，这与马克思本人是否受价值观的推动这个问题无关，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肯定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指控必须基于历史的和经济的分析，而不是任何独立的道德论题。实际上，独立的道德领域内的任何信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误解，因为它没能认识到道德立场的依赖性，甚至无法用道德词汇来表达物质利益。

因此，伦理的考虑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无关，也与个别资本家道德责任的性质或相信个人在阶级立场之外还追求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无关。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言里所解释的那样：

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

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此外，同样存在一个误解，即认为工人阶级清楚这些价值观对其自身的解放是必不可少的，并进而通过运动来获得实现。这种想法不是孤立的，因为只有通过历史进程中的解放运动，这个目标才能得到理解。这样的话，在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自由和必然之间就没有区别了。很明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仅马克思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伦理基础或道德哲学，而且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否认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必要。

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

这些简短评论的目的在于使马克思学说的特征和地位受到某种重视。这对沟通马克思和 19 世纪末期的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巩固了它对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优势，而且宣称自己是关于社会的无所不包的综合科学。它不再表现为一种研究假设和经验调查的方法，如果它曾经是这样的话，而是表现为一种关于经济规律和历史决定论的严谨学说。这是个羽翼丰满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在其范围之内是可以自豪展示和令人难忘的。这种把马克思的著作奉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做法是社会主义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不论是对运动还是对理论来说都是这样。这个发展最早出现在第二国际时期到 1914 年前的一代人中，当马克思主义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后出现了第二次和更为持久的发展。因此，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与我们讨论有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的

优势代表着一种对社会主义学说理解的优势。乌托邦和道德主义传统从社会主义主流地位滑到了边缘，转变为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或者等着为后来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势力提供基础。把马克思的著作扩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并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完整的意识形态，是又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把自己定位为综合性的科学学说而不是一个道德学说或温和的经验理论，并且用那些概念把自己展示给世界——也把世界展示给自己。

此处不宜详尽探讨这个发展过程发生的任何细枝末节。恩格斯通常被认为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今天他在这方面得到的是另人遗憾的评价。他在马克思墓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出版于马克思逝世后的《反杜林论》，开始被接受为理解马克思著作的权威参考框架。其结果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支持这个体系的方法就是现在普遍应用的（包括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通过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强化了作为完整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同时，社会主义也加强了其独立于道德价值的地位，因为它开始立足于历史决定论所揭示的过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正好反映了 19 世纪末期普遍的思想环境，这个环境充满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要抗拒这种环境是困难的。对恩格斯来说，由于他自己的工作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他的任务不是抗拒马克思主义的渗透之势，而是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吸收进他的工作中。

这项事业被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并形成了至少一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长）的社会主义论战。虽然它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它的影响在其马克思主义的躯壳下更为广泛，渗透到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假设中。在看几个相关例子

之前，有必要指出以上这种理解和社会主义立场的提出的一般的和基本的影晌。它产生了一种论战的独特方式。从社会主义的普遍发展情况看，这种论战方式的确比独特的学说内容更重要。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开始相信他们理解了历史进程，并且这个看法使他们的政治行动有了可靠的科学基础。这个基础的主要因素是基本相同的（例如，马克思对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等的解释），但它们结合起来的效果是把社会主义推崇为完整的科学体系。这种地位必然抵御各种批评并在各种棘手证据面前予以坚持。进一步的效果是任何学说的发展或创新（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实质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都不得不成为对岌岌可危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地位的巩固，而不是对这种地位的削弱。

这种地位所确信的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可以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底线。它不是意志行为或道德说服的结果，也不是偶然的或勉强得到的结果。它包含按社会交替来思考的历史进程，一个由某种转折点标志的过程。科学学说在历史运动里头也是带有政治含义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义者经常寻求把他们的政治行为定位在正统学说内，即使（或许说特别）当这种行为看起来与之背道而驰时。学说的正统性保证行为的成功或使它相信成功，或至少赋予它以合理性。这种状况在现实中的表现，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还有一个论战的科学方式的普遍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相信学说的完整性经常使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把问题简化和压缩到现成的解释框架中，而不留一点不确定的空间。这正如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曾经说过的：“因为相信 A 和 B 并非完全不同，所以就说它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反映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思想倾向。然而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为那些相信已经解开历史之谜的社会主义者设置了难题。

这种信念是 1914 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正统学说的核心，也是 1914 年事件造成如此大的精神创伤的原因。人们认为崩溃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在全球革命的压力面前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共产主义已经解体了，而民族主义还在苟延残喘。历史事件（先是 1914 年，然后是 1917 年）之所以能给社会主义的地位造成如此破坏，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树立为未经证实、但却牢不可破的理论体系。因此，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理论家和正统学说的捍卫者，卡尔·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建立在它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它能够独特地解释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是怎样预示着无产阶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立的。考茨基把达尔文主义和恩格斯整理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作为历史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这种说法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考茨基宣称：“最终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关于无产阶级即将采取行动的历史科学。”

考茨基在这个时期总是被当作正统学说的象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论战方式本身由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科学特征而反映了主流学说。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是个极端的正统派。她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牢牢立足于对客观必然性的分析。正是这种坚持使她（在她的积累理论中）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分析方法，这个分析回答了为什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一般性阐释应该得到证明的严格条件和原因。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对待这个问题的角度看，她的分析是具有特殊性的，但它的确反映了这样一种需要，它不允许对社会主义能够提供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衰落的科学阐释有任何怀疑。更为一般的是，普列汉诺夫（通常被说成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整理马克思主义时走得更远，他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并加以说

明和辩护，而且以小册子的形式到处宣扬。这种方法后来成为作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征。即使马克思的著作被真正用来解释国际经济的发展——比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Hilferding）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分析，它的观点和结论仍是那些正统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任务是指出预示着资本主义解体和无产阶级胜利的历史趋势。

社会主义与必然性

科学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内在规律的原因，表现出了它在构建复杂的理论解释体系方面的伟大而独特的智识。如果说这里所关注的只是科学与内在规律而牺牲了概念本身的话，那么理由是这些都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而且，它的拥护者总是想加强这种看法，不管他们各自的意见是什么。因此，罗莎·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相反，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心，因为“如果有人像伯恩斯坦那样承认资本主义不是朝着它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必然性。”关于同一问题，考茨基写道：

一旦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和无产阶级作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动力的观念被放弃了，那么我将不得不承认我也就完了，因为我的生命将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是可以凭它的科学地位赢得广泛的兴趣和发挥相当的影响的。法国的工团主义者索雷尔（Sorel）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他来说，科学社会主义

的真实性只是在于它的实用价值，它是支持无产阶级完成其革命任务的意识形态武器。这也许可以用来证明为什么个别社会主义者会深受科学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历史必然性的影响。举两个英国的例子：威廉·莫里斯描述自己的一生本来“注定是个悲剧性的结局”，直到有一天他的观点为这样的认识所改变——“伟大变革的种子，有的人把它称作社会革命，开始发芽”。还有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最有力的代表者，他把“最基本的争论”描述为“一种方法，通过它人类文明可以得到彻底的维持”。这种立场促使一个观察家写道（这一点很有先见，因为后来斯特雷奇反对马克思并投入凯恩斯的怀抱）：“斯特雷奇清楚地感到有一种保护资产阶级体系良性发展的可能性，他不大可能会去谋求对它的改变。”

如果说1914年的事件打破了第二国际纯粹的学说结构并导致国际社会主义之间正式的和最终的分裂的话，那么1917年的事件则把这一裂痕扩大为鸿沟。按照正统学说的观点，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应该发生。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由成熟资本主义下的发达的工人阶级来实现的。但这次夺权革命却是在一个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打基础的历史任务）都相当欠缺的农业社会发生的。因此，作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监护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对列宁主义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经济条件还不成熟，革命必须受到抑制。

然而，如果这种判断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话，即使它被后来的发展情况所证明，它也只是科学社会主义固有脆弱性的反映，它发现自己是如此易受历史事件的影响和削弱。科学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已走向终结，它的外衣现在换成了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它的科学性现在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

列宁在许多方面为教条社会主义的兴衰作了盖棺定论。这不

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用实践的推土机碾过理论的大厦（或者简单一点说是因为他是行为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本本社会主义者）。他总是坚持用实践的锤子来敲打理论的铁砧（正如内尔·哈丁（Neil Harding）在《列宁的政治思想》当中所强调和证明的）。这项工作把革命实践放在理论基础之上。因此，到1917年列宁感到满意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被他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证明是有理的，“发展的客观过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它除了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外不可能从垄断中得到发展（战争已经把它的数量、作用和重要性扩大了10倍）”。因此，用哈丁的话来说，列宁是“极端教条的政治家”，他的实践活动是他的理论立场不折不扣的体现，即使当环境看起来极为不利以及当他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时。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顶点，在这个传统中理论被赋予了预言的性质，能够阐明社会发展的未来进程并要求社会主义实践与之相呼应。因此，列宁的胜利是这种传统的实现而不是（正如有时候认为的那样）它的废止。然而，当支撑列宁的主张（对帝国主义造成的大破坏产生世界性革命的预期）的理论基础由于对事件预测的失败而被冲垮时，它的实现之日也是它的解体之时。列宁的革命是基于教条的，而不是机会主义，但其胜利的性质却证明了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无能。当然，重要的原因不是理论的错误，而是对理论是什么以及它在社会主义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存在根本性的误解。

伯恩斯坦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修正主义”遭到第二国际正统派猛烈围攻的原因。在向主流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某些主导性因素（关于价值、无产阶级的贫困、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提出挑战和提出修正主义的改良意图时，他也向整个正统理论的先验的、科学的基础提出挑战。按照马克思生产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说

法，伯恩斯坦认为必须给予“意识形态的特别是伦理的因素比正常情况更大的独立活动的空间”。同样，如果不能只依靠经济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在伯恩斯坦看来就必须为社会主义建构一个独立的道德理由。换句话说，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至少得到另一种理论的补充。这标志着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虽然这种发展已经出现在政治实践中，而不是在理论言辞中，毕竟有那么多人高声反对修正主义。

它也出现在第二国际正统派的故乡（德国）之外的社会主义论战中。例如，法国社会主义领袖饶勒斯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让它自由地吸收其他的传统。特别是他不再只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学说，而是当作人类对道德价值长期的、自觉的追求的表达。因此，在第二国际内部，饶勒斯和考茨基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对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价值的问题，对考茨基来说，它是居于其他学说之上的最复杂的社会科学。其次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对其影响很小并在某种程度上与费边主义对立，因此它不甘在理论上居于马克思主义的下风，而是宣称它们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租金理论优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在它的历史分析中它提出的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解释（悉尼·韦布在《费边论丛》中把它描述为“社会趋势的不可抗拒的蔓延”）至少在英国为集体主义改良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基础。最早的费边主义者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经验主义者，而是自信的空谈理论者（虽然这种类型不需要正统学说的支持）。然而，作为完整的英国社会主义，它的核心和特殊性是它深受道德主义的影响，而且其来源是多种多样的。用唐尼的话来说，这是“毫无顾忌的伦理的”社会主义传统。如果说这使它脱离 1914 年前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并由于在理论上缺乏基本的联系而被置于不重要的位置的话，那么这却使它后来能够在不同基础之上建构民主社会主

义。现在又有人要求它再次发挥这个作用，在右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造成破坏的基础上重建民主社会主义。

教条的危险性

这里讨论的各种社会主义论点将其理论抬高到科学学说的地位，但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都是无助的。列宁的例子已经为这种影响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说明，但许多其他的情况亦如此，不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例如，以 1914 年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境况为条件的一种决定论，相信资本主义的成熟是无产阶级必将胜利的必要前提，就被证明是对指导行动没有什么帮助。它产生一种保守主义，消极等待条件的成熟，在党的革命理论和它的实际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了无法愈合的鸿沟。或者再看一下同路人的情况，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说服自己相信斯大林的俄国是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他们之所以没有从历史复杂性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探究，是因为这反映了教条传统的本质，这种教条传统教导说社会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废除和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因此苏联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和捍卫（即使这包括掩饰或回避不安定的因素）。实际上，在整个 30 年代，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理论传统，这个传统预示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先验图式——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继承者，都无力度过这个多难的 10 年，即使他们让自己相信（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吸引力来证明）他们是唯一具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他们的理论没有给资本主义复苏和稳定留有任何余地（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嘲笑的原因）；他们把法西斯主义理解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垂死挣

扎，而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或许应该把资本主义民主与其他更糟的东西区分开来，必要的话还要捍卫它（而不是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客观”社会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就像有一段时期共产主义者的学说和实践所做的那样）。德国共产党人拒绝反对希特勒，这提醒我们理论传统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极为重要的后果：政治上的行动或不行动。

如果这还只是特例的话，那么与具有理论高度的科学（或准科学）学说密切相连的更为一般的结果和特征同样可以得到证实。一个基本的但并非不重要的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其结果是正统学说的发展成为其支持者的发展。正确的学说和它的适当应用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这就给予学说的掌握者以重要的角色，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卓越理解使他们能够领导一个政党，并进而以一个适当的政治方向来引导人民群众。考茨基断言：“今天，知识仍是有产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强大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它必须让人把社会主义带给它。”它必须回到后期的‘外来的意识’的问题上来。但这足以使我们相信，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按照对科学知识的拥有来界定的话，那么它也意味着将给知识的拥有者带来特殊的权威。这种权威经常得到宣扬并转化为权力。

宣称自己是立足于马克思的著作的理论传统还有一个更为普遍、更为基本的特征。马克思曾开创性地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但它却被发展为关于即时政治行动的科学。利希海姆在谈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指出了这一点：

这个理论结合了一个高度新颖的分析，它适用于政治秩序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长期变迁。它因而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用来解释 16 世纪以来

社会演化的工具，但它对短期的政治行动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它不仅不能发挥这个作用，而且那些想这样做的人把长期经济决定论转变为这样一种立场，即把政治学简化为经济学的一支。这种“简化论”和“经济主义”总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核心特征，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它也就是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所嘲讽的“预言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

这又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关于长期社会变革的理论被当作短期政治行动的指南，那么由该理论所提供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在它分析资本主义动力方面（这个问题既存在与最初的公式，也存在于后来的运用当中）也就被当作是政治因果关系的教条。换句话说，一个关于价值、利润下降、资本集中等问题的理论（或多或少是有效的）被扩展为一个关于该理论（阶级传统、阶级意识、社会主义）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学说。然而，这是不合理的和误导的扩展，因为这两个领域在分析上是不同的。马克思在二者之间搭起了哲学的桥梁，而不是经验的，但这座桥无法承受加在其上的经验证据的重量。即使马克思放弃铁的决定论，在他的研究方法中仍有足够的决定论（恩格斯想把它描述为“最终决定因素”）几乎不给其他因素留下一些运作的空间。然而正是这些“其他因素”从许多不同方面阻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产生政治影响。阶级意识在特定的社会内部或社会之间具有不同形式，它产生整合也产生反抗。思想、信仰、社会团体、国家、宗教、民族、国家主义等上层建筑始终表现出明显的不愿被决定的倾向，而且有证据表明有相当能力作出自我决定（一种延伸到其经济基础的能力，就像斯大林用实践来说话，如果不是用理论的话）。这里不是要问为什么理论模型无法产生政治好处（对前一阶段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痛苦而缠人

的问题)，而是要确定研究方法中导致这种失败的缺陷，这种研究方法相信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型也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因果关系的学说。这种研究方向显示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用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的话来说，不是一门关于社会的普遍科学，而“只是还没有成为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还可以说是政治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最敏锐的解析，但现在明显脱离任何能使人信服的社会主义事业。把马克思一句著名的话颠倒一下就是，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认识世界。

当民主党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时，他们是想挫挫它的科学自大感。即使他们在一般意义上接受了马克思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庞大的社会结构时所使用的阐述生产方式的集中及其阶级基础的概念，民主社会党人还是与彻底的经济决定论划清了界限。他们把它当作不适当的历史而拒绝它，而且想要坚持一个至少部分独立的关于政治学、价值观和思想的领域（这个领域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们也向马克思对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的崩溃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找出这些和其他马克思的设想在实践中的失败。

然而，在这些特定问题之外存在着两条批评的主线。第一，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造成的影响是：他们只是鹦鹉学舌、照本宣科，把所有问题都简化为严格的经济分类，相信只有他们才知道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并且展示一个自高自大而不宽容的政治学（特别是针对那些对“理想主义”作些微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特征被认为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错误地声称拥有的科学地位。当然，目前这些已不多见，因为这种必然性的进程已经瓦解，但旧的习惯却不那么容易消失。第二条批评主线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缺乏伦理基础这一点上；确切地说，是指它否认需要这样一个基础。列

宁在1920年写道：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是完全从属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道德是用来摧毁旧的剥削社会和把所有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所有的道德都在于这个统一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我们揭露所有道德神话的谬误。

这是一种论辩式声明，但仍意味着否认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独立的道德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特征。这个立场受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攻击，部分是由于对个人的贬抑，这体现在除了阶级划分拒绝其他任何方法，也由于历史必然和道德需要的融合。所有社会主义的目标都是无阶级的社会，但在那些根据历史内在规律的科学理论来提出这个目标的人和那些把这个目标看作是好社会的道德学说的人之间有着根本区别。民主社会主义者站在后一个立场上，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传统看作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不恰当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基础，而不管它思想的广博和理论的伟大。就像伯纳德·克里克所说的：“没有批判道德哲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受欢迎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传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些最复杂的理论分析的话，那么正是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最好地发展了它的道德学说。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个历史的差别，并不只是因为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普遍命运，而且也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显然，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少了一些“科学”的味道（虽然不久以前奥尔萨瑟还通过摒弃经验世界来试图重建马克思理论的科学地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已经走到舞台的中心，

他的著作作为多产的分析方法显得更为温和，并且（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获得灵感）更少经济决定论，而更多地关注“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当然，这些发展并不适用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适用于大多数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但它们的确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变化。它们甚至也反映把马克思主义整合到更为宽泛的民主社会主义中的进程，要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话，这事可能早就发生了，而且可能会由于那场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的灭亡而得以完善。然而，目前仍然需要辨别支持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的不同学说。

当然，社会主义的确同时需要实证主义学说和规范主义学说、经验的理论和道德的理论。如果说没有道德学说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没有经验理论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幻想。然而，经验理论变为科学学说之后产生了对基于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的蔑视。同样，某些“道德”社会主义的说法也带有对理论的轻视。两种立场都是不恰当的，而且在实践中证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说社会主义需要两种类型的学说并不是说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这样两个传统之间存在着区别，一个相信（如马克思所说）它“解决了历史的谜团，……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答案”，并一直用这种话语来讨论本质主义、矛盾和客观主义；另一个则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理论的道德计划。据报道有人这样诘难威廉·莫里斯：“莫里斯同志接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吗？”，他的回答是：“坦率地说，我不知道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什么，而且我也绝不想知道。”

第四章 方 法

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对于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运动本身就是一切。

——爱德华·伯恩斯坦

如果社会主义者在理论认识上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存有异议，那么这种异议会在社会主义者实践其学说的方式方面进一步表现出来。这两个异议是紧密相联的。这样，当“修正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点上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的时候，这种挑战不只是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必定受到不同的理论基础的指导，而且还意味着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改良和革命

确切地说，这些著名的争论，只是对其各自的支持者来说，才具有政治意义。修正主义也暗含着改良主义，如同正统论也涉及到革命论。事实上，易于理解的是，事物不仅不像二分法所显示的那样简单明了，而且关于经济理论的争论还会不可避免地推衍到关于政治方法的争论上去。如果资本主义的崩溃正处于历史

发展的关口，并且在这种境况下，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是唯一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话，那么关于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革命性设想就是历史发展的计划书中的完整的一部分。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并不是必然就要灭亡，如果它还能得到巩固和调整，那么社会主义就需要在政府行为和竞选压力方面采取一种改良主义的策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方法的争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和范围更广泛的各类社会主义的观点密不可分的。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社会主义者为追求各自的目标，曾经提出和实践过不同的方法。虽然这些方法上的差异经常被归缩为近似于“改良”和“革命”的类目，但是这样的归缩对于这些术语的实际表现来说，是不尽适宜的，同时也妨碍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关于方法的争论。一个改良者可能不必然就是改良主义者。有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也为改良而奔走呼告，就如同某些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有时也承认革命的必要性。走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就要排除其他超议会的活动形式。在社会主义者之中，有些拒绝暴力，而另一些则赞成暴力；有些强调组织和纪律的必要性，其余则强调自发的重要性；有些是暴乱分子，但是革命党人却谴责暴乱主义，而社会主义者则要力争夺取政府，并将之摧毁。政治活动与工业活动并非一致，而追求政治目标的工业活动则推动了追求经济目标的政治活动。这样，就有一大批的社会主义者推行实践社会主义的实验，以图指出一条内在于和平平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就可以辨认出这些观点的不同之处。到了19世纪中叶，主要的观点，以及其后的传统理论基础，都已经展现于大众之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极左翼——巴伯夫和波纳洛蒂的革命和颠覆性的“共产主义”，与不断地组织反抗活动的布朗基及其革命性的先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信徒们，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革命的反抗性的社团主

义，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有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相信社会的改良可以通过开明的立法和理智的立法者来实现；而有些则是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根据他们自己的重建社会的原则，来创办社团；那些与路易斯·勃朗相仿的社会主义者，则将改良主义的基础放在建立联盟和争取议会胜利上面，这种做法被德国的拉萨尔发展成为其竞选组织和政府活动的策略；也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譬如蒲鲁东，他们支持那些心怀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传统的人来指导其活动，从而拒绝那些赞成从工业的好战精神中自我解放的“政治的”社会主义和议会主义。

就是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策略相互对抗的背景之下，马克思开始用其思想来控制工人运动。他必须在理论上超越它们，并在实践中胜过它们。而这个目标则是通过从下面几条渠道来得以实现的：清算乌托邦、攻击蒲鲁东知识的贫困、与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同朴素的布朗基主义保持距离并且否定拉萨尔。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的时间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最高理论。而当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活动和组织的意识形态时，它又成为实践的最高准则。虽然学者们已经对其间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但是最重要的结果显然是，主流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政治活动的战略性调整。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需要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也反过来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先锋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体。而当它满足工人运动的需要时，它就不仅仅只是用来表述的理论，而且还是指导活动的战略。但是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呢？

貌似简单的问题后面往往隐藏着不少困难，这一点我们从第二国际的历史中就可以得到见证。然而，这些困难和马克思作品本身所提供的社会方法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理论中革命的核心

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马克思的学说并没有对革命进程的特征给予详细的讨论，这就反映出从其总体上来说它并不是一种关于发展的政治学理论。马克思社会变迁的模型是植根于他的社会冲突理论之上的，因此它就把革命作为其理论核心。它认为，尽管有时候阶级对立并不采取公开的武装斗争的形式，尽管阶级对立是和各阶层的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的，但是阶级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调解的。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是把阶级冲突作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并且是一台通过革命（或多或少也通过暴力）起推动作用的火车头。早期马克思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正如我们在号召准备战斗的《共产党宣言》中见到的），后来让位于晚期马克思的强调长期结构的观点（这种观点体现在其关于基本原理的阐述里。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没有谈及革命的作用，但是革命还是社会变迁的不变的必需的方法）。

那么，马克思本人到底是怎样理解革命的呢？这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马克思讨论社会从这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时，他经常使用一种妇产学的比喻，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有益的线索。当描述新社会经由一段适宜的妊娠期，借助于合格的“助产妇”的作用，而从旧社会中诞生出来时，他就经常使用子宫、胚胎和助产妇等词语来加以形象化的阐述。社会是经过长期的酝酿，达到成熟之后才产生的（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例外，它代表的是一种有效的社会“避孕”方法的最终结果）。社会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的。当新社会诞生之时，束缚生产的那些“镣铐”就必须被砸碎。马克思就是用妇产学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的。这就意味着革命就像分娩一样，是必需的和无法避免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规模浩大的期限较长的过程。当新社会从旧社会的母体中诞生之时，这是一个“破坏”的时刻，但是却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形成过程的顶峰。就像分娩一样，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但是这是为了超脱和解救而所必

需的。

马克思对此不惜笔墨，浓彩重墨地告诫人们要警惕早熟冒进的革命所招致的危险。既然社会革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时刻才发生的，那么在其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或尚未完备的情况下，还相信可以促成革命的发生的念头，就是不科学的。而推行暴动政策的布朗基主义者，号称是“革命的炼丹术士们”，竟然也相信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布朗基主义者相信“总体上说来，革命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为少数派依据事先设定的计划创造出来的。最后，才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些针对不科学的革命的炼丹主义的警告，也并不能完全表明马克思自己的立场。

在马克思的总体理论中，革命即便被认为是社会变迁的火车头，但是这也并不阻止他支持在现存的秩序范围之内进行特定的社会改革的要求，也不能阻止他投身于争取建立在民主共和制之上的普选权的事业。他的观点，是很策略的，是取决于社会与民主改良、长期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之上的。他对政府的分析，结合了依据其总的理论所产生的本质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政府只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和每一特定的政府都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造的认识，由此也决定了他的上述观点。这样的结合，再一次反映出他的政治学缺少一种发展理论（这也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构造一种发展理论的原因之所在）。在政治方法方面，结果就是，马克思将暴力革命当作社会转型的典范（用《资本论》上的语言来说，就是：“暴力是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的助产妇”）。但是同时，在其成熟期的附论里，他承认在一些国家里，和平的宪政主义道路可能对工人阶级有益。在这些附记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其在1872年于阿姆斯特丹所作的演说报告：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考虑各国不同的制度、习惯和传统。我们并不否认，在诸如美国、英国，如果我更好地知晓其具体制度的话，也许还要加上荷兰，在那里劳苦大众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即使那是真实的话，我们也仍然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的大陆国家里，武力才是我们的革命的杠杆。

从上述关于马克思的道路的简略梗概中，我们足以发现其所遗留的深刻而又模糊的特点。它既把政府说成本质上是阶级的工具，同时在分析实际的政府时，又暗示着与此种本质主义的说明绝不相容的成份；它表明工人运动必须摧毁政府，但是同时还必须运用智谋；它宣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又提出一种承认例外的学说，还有其他的关键性的疏忽（例如，政党的任务、政党和阶级的关系、政治领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使其成为一种躲避性的政治学的方法论和一种自相矛盾的政治学的遗产。当进一步考查到其缺少任何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持续讨论时（正如下章所示），马克思的学说就成为一种更难以理解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指导思想。当相关的限定条件被视为只是在政治学中处于第二位的和派生的地位时，上述这些矛盾就被认为是理论建构中的必然的不足为奇的产物。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当第二国际辩论“革命”的真正意思，或列宁认为打碎国家机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做法时，相互对立的阵营都有可能援引马克思来为自己进行辩护。

修正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形成了“革命与改良”的争吵。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在其 1891 年的《爱尔芙特宣告》中，就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它信奉革命信条，却参与改良性的竞选和议会的政治活动。人们经常从其中所涉及的理论 and 实践之间的鸿沟这方面来谈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故事（1914 年，欧洲的社会主义就是陷入了这个鸿沟之中而不可自拔）。人们也经常辩论：在这个完全真实的故事里，到底谁是罪魁祸首，而更好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列宁当然也把这段历史当作腐败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客观教材，并披露出其隐藏在革命言辞的面纱之下的改良主义者的本质，因此用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来加以反对。然而，就列宁而言，就像他把考茨基当作“叛徒”一样，其中的是非曲折，是非常值得回顾的。在第二国际的全盛时期，列宁拜服在考茨基的权威之下，认为他是既反对改良主义者、又反对暴动主义者的保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卫士，认为他的观点是植根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之上的，是极具策略性的。而考茨基是这么说的：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并不在于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而在于尽可能地拖延此类灾难的发生。也就是说，要小心地避免任何类似于挑衅或带有挑衅外表的事情。

在 1909 年《通往权力之路》的书中，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领袖的考茨基区分了革命的政党与创造革命的政党。他说：

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政党，而非创造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只能通过革命来达到。我们也知道，我们并无能力来创造革命，正如我们的敌人也不能阻止革命的发生一样。我们也并不计划要激发革命，或为革命准备土壤。

这样的表述，以我们这些现在的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来，好像是放弃了整个游戏，将革命降低为只是一种隐喻而已，并为政治惰性文过饰非。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也恰好准确地反映了第二国际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氛围，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等待资本主义的成熟，这反过来又必然会实现社会主义。这当然需要一个革命的时刻，而这也是一个自然进行的发展过程。真正重要的是，当革命的剧变到来之时，应确保双方的力量对比能够得到一场快速而毫无痛苦的胜利。那么，从这个观点出发，既是一个改良者同时又是一个革命者就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必需的。

当然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全然的改良者和全然的革命者。前者就意味着要深入到通向社会主义的竞选道路，而后者则要考虑怎样判断革命“成熟”的程度，怎样联系革命成熟的条件去积极地推动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这种困境，以及选择一种明确的战略的必要性，在其“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与“激进的”卢森堡的高度不同的道路之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质疑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说中的关键要素的科学地位、以及由之必然带来的含义时，伯恩斯坦争论说：应当把社会主义当作已经开始并进行着的一个进程，并且能够为民主的改良主义所推进。他在1898年写道：

我坚定地相信，现在的这代人会看到很大部分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即使不是以官方式，至少也会是以一种令人满意的形式来得到实现。持久增大的社会责任（例如，个人针对社会和社会针对个人的责任和共同权利，在国家或政府之内的扩展着的诸如监督经济生活建设乡村、地区和省级的民主自治政府，和所有这些团体的扩展着的任务，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状况。

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预设 20 世纪社会民主制度的基本主题的伯恩斯坦，才能够宣布说：对他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毫无意义，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并非是一场单一的戏剧性的巨变。

伯恩斯坦的观点，受到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斥责。这可能导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伯恩斯坦只是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简单地理论化了。即使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正式赞同革命理论，他也认为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个改良的社团而已。甚至是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新版的《法兰西内战》所作的阐述详尽的序言中，也好像赞同宪政道路。他说：“1848 年的斗争模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今天都已经是过时的了”。恩格斯宣扬竞选政治的优点，称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是先进的：

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展进行得那样主动，那样平稳，那样不可抗拒，同时又是那样均衡。所有政府所采用的针对性的干涉措施，都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甚至在今天，我们都能争取到 2500 万选民。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到这个世纪末我们就能赢得更大部分的社会中间阶层（这中间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

并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决定性力量。其他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将屈服于前，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而不被干扰，直到摆脱了统治的政府系统；而不要把这日益增长的打击力量事先就浪费于防卫性的战斗之中，而要将其完整无损地保持到决定性的那天……世界历史戏剧性地给我们来了个天翻地覆。我们，“革命者们”，“造反者们”，竟然在合法方式上比在非法方式和革命之中获益更多；而那些秩序党（他们自称是秩序党），处于这种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合法的形势下，正渐渐走向消亡。

模糊性仍然存在（仍然会出现“决定性的一天”，而秩序党也会在形势所迫时抛弃其合法主义）。马克思承认革命标准之外还有特殊例外，但是恩格斯明显地扩展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他全面地为宪政政治进行辩护，认为在19世纪末宪政政治是社会主义者的适宜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创见，而是对西欧社会大量社会主义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这种真实作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改革和竞选运动的实行纲要。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所表述的：“民心向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的日常需要而奋斗”。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整合为“正常的政治”的过程，而原先的推翻政治体系本身的信念则很难再坚持下去。这个整合过程进行得如此深远，以致于在1898年的法国，“正常的政治”已经是深入人心，当时一个名叫米勒兰的社会主义者竟然在资产阶级政府里担任了部长的职务。这次“米勒兰事件”在国际社会主义世界里激起了哗然大波。总的看来，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从理论意义上来说，改良的策略和革命的策略具有有机的联系。如同乔在其《第二国际史》中所评述的：“如果不能改进排水系统或运输服务，推翻现存社会是很困难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伯恩斯坦一样认识到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内部革命理论和改良实践之间的鸿沟，但是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他们力图用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办法来消弥这个鸿沟。这就是激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所持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罗莎·卢森堡身上；而在持相同观点的第二国际的左翼当中，主要是由列宁来代表的。卢森堡和列宁都同意考茨基所作的对修正主义的反驳，后来，他们都对社会民主思想的领导地位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之间，也相互攻击。卢森堡在其发表于1899年的《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中，不断驳斥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及其内含的改良主义。她断言改良方法除了作为革命策略的一部分以外，并没有其它价值或意义，因为资本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超法律的现象，所以实现社会主义并没有一条合法的道路。这样改良和革命就“不是从历史的柜台中凭其兴趣就可以选择的互有差别的历史发展的方法，而是选择热腊肠还是冷腊肠的问题”。但是它们毕竟还是代表了因其目标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从而种类各异的行为：

那些宣称反对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革命，并赞成以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来取而代之的人们，事实上并不选择一条更平稳、更镇静和更缓慢的道路来实现同样的目标，而是用这样的道路去实现另外不同的目标，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采取一种对旧社会进行表面调整的立场，而不是建设新社会的立场。如果我们信奉这种修正主义的政治概念，我们得到的是与当我们信奉修正主义的经济理论时所得到的相同的结论。我们并非要计划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改良资本主义；并非要压制劳工系统，而是要削减剥削。也就是说，要禁止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禁止资本主义本身。

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攻击，后来发展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的修正主义的攻击。她深深地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因此斥责那种不主动促进革命意识的觉醒、反而窒息其发展的政治作风。她从 1905 年的俄国事件中得到启示，从而赞同把群众性的罢工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我们从中也能概要地了解她的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实现自我解放的信念。卢森堡信奉马克思的观点，相信无产阶级通过其真正革命的主体最终能够和将会解放自己。一方面，这也导致她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和中间路线；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她拒绝列宁的把政党作为革命先锋队的组织模式。列宁主义所体现的并不是政党与阶级、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它只是代表了“从布朗基的阴谋小团体的运动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大众的运动的一次机械的组织原则的转变”而已。

卢森堡与列宁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 1914 年的社会主义灾难归因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他们都相信革命必然是人造的（尽管各自的具体手段有所不同），而不是等来的。他们都指责 1914 年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认为正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等待策略，不仅掩盖了它重新堕落成为改良主义的事实，而且还使工人的阶级运动得以衰退。考茨基认为成熟的革命应当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见解，他是借助于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来支持其革命的观点的。与此相似，列宁也是确定无疑地基于其对马克思的另类理解（尤其体现在其著于十月革命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才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采取革命运动，以便打碎国家机器，镇压敌人的反抗，并自由运用政治暴力。他认为这种革命运动是和虚伪的议会民主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论是在立宪独裁政体里，还是在多数民主共和体

制里，资本主义的议会政体的真正实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回到底由多大数目的统治阶级通过议会来束缚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

革命已经摆上了社会主义者的议事日程，它不再只是比喻而已，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主题。

如同前面章节所述，列宁自己确信不疑地认为，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目前是着手点燃俄国革命之火的时候了。他在其制订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成功地完成了俄国革命。这也为以后声称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时代的延续（也即后来所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基础。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声明表明，或只是部分表明，列宁主义者是创造革命的专家里手。由第三国际建立的遍布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都承继了这种革命的职业精神，从而也就确定了它们的任务：把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从堕落的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拯救出来，并向他们提供革命的领导。尽管在 1918 年之后马上就爆发了一些革命，而在欧洲的各个政府中间广泛地蔓延着畏惧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的恐慌，但是国际革命还是没能实现。而社会主义也只是作为“革命的”共产主义与“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居中形态，而保留在那些苏维埃的有缺陷的极权政府里。

对于 1914 年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也许要作两个补充说明，其中第一是关于工团主义，第二是关于英国的社会主义。前者断然拒绝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并坚决赞成由生产者直接选举的政治活动；后者则是完全的议会党人和宪政主义者。两者都与改良主义息息相关：前者谴责它，而后者拥护它。法国的工团主义哲学家乔治·索雷尔，就非常关心议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所起的削弱作用，因为议会主义用教授般的含糊言辞来调和相反的事物，从而鼓励妥协和社会和平的思想。如果工人阶级想要执行

其征服世界的职责，就急需提高其自身的阶级狂热、英雄主义和真实性，而这些都是通过总罢工和无产阶级的英雄“神话”等途径来得以实现的。它的作用，并不在于赢得某次特定的胜利，而是阐明、动员和两极化：“总罢工的思想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致于它将与其接触的所有事物都导入革命的轨道。”尽管把索雷尔当作工团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人物，会引起人们的诸多误解，但是提倡并实践生产者的战斗精神，并将它当作“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法，这只为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提供了少许的答案。而英国的行业社会主义者提倡工业领域内所采用的“蚕食性控制”的策略，也是普通的社会主义方法的另一种形式。

如果工团主义一直未被第二国际纳入为其主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整个英国社会主义也会采取一条极为不同的道路。无论是伦理社会主义所内含的道德主义，还是费边主义之中的理性主义，都助长了宪政主义的使用。伦理社会主义者拒绝诉诸暴力手段，他们忙着从事于道德说服和议会辩论。如同基尔·哈迪经常描述的：“他们并不从事阶级斗争，而只忙于体制斗争。”同时，出于与伯恩斯坦相似的理由，费边主义者还满怀信心地宣布为什么革命是不必要的，为什么正在进行中的改革进程能够逐渐地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萧伯纳在《费边文丛》中《过渡为社会民主党》一文的结尾考察了“现今社会民主党人单调的实践纲领”的特征并宣称：

在这之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运用既定原则和延续已有实践而得到的，所有这些都带着与英国精神非常相宜的“圣器收藏室”的烙印。所有这些都与其所冠称的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头衔无关：它们一点都不涉及断头台，也不公开宣扬人权，也不发誓去夺取国家政权。总之，它们不涉及一切本质上非英格兰

的东西。它们是一定会出现的，它们都是我们征途中的里程碑。即使是那些对此感到畏惧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这种追求“微不足道的改善设施”的正义之道是如此的卑鄙、缓慢和怯懦，以致于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之表示敬佩。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它引发了一种早已废弃的早期的社会主义灾变说。在更少见的萧伯纳的模式里，他只是克服了一瞬即逝的迟疑，就把这种正义之道当作 20 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统理念。

与经验相符的策略

我们已经勾勒出了 20 世纪至关重要的 20 年代之前的在社会主义方法上被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现在就可以根据后来的经验来进行观察。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策略都不能完全达到其目标，至少不曾以原先所设想的方式令人信服地达到过其目标。考茨基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成熟到某一特定时刻，就会进入到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缓慢而又持续的过度成熟的现象。列宁主义世界革命的观点，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失去了其学说基础，在其实际运用中，也并没有给西欧的任何地方带来革命。改良主义的观点，在诸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经过一段长久而不受干扰的时期，当然能够赢得政权、实现改良。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不能取得任何一点被其 1914 年之前的各类支持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成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工团主义及其派生物已经不再是有影响的运动了。需要补充的是，为工人运动所促进的两极分化，不仅没有削弱工人运动，而且也清除了对其有利的理论和策略进行选择的

可能性。

1919年谋杀罗莎·卢森堡的事件，标志着非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至于那种非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它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样的信念相脱离）是否切实可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布尔什维克挪用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至少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的时间相当于30年）里，把它僵化为没有内在联系的理论堆积。这样它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者的有创造性的理论源泉了。通过其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模式，莫斯科找到了其所需要的工具，用来掩饰其方针政策，并以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面貌出现，把它贯彻到各个卫星党中间去（当莫斯科的政策明显地不适宜于这些卫星党所面临的本国的情况时，当这些政策极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时，这些掩饰就变得更为急需的了）。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这边来讲，抵抗来自共产主义者的攻击的需要，可以驱使许多社会主义者采取一种比预计的更为短见的更为平和的社会民主政治的形式。但是处于两极分化的境地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1945年以来，这种格局急需有所调整，但是直到苏联的1989年事件的附带结果发生之前，其基本形态还是维持原样。

尽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成效显著，但是从地位、形式和方法上来看，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所提供的革命设想相隔千里。虽然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革命的思想意识，而把列宁主义视为革命的行动指南，其间的差别还是历然可辨的。列宁宣称，只要给予充足的组织和纪律保证，社会主义者就能够在那些未必可能的地方举行革命。他的论断，为实践所证实。但是到底能否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在那些可能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举行革命呢？1945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好像完全不是这回事。在这一期间（以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巴特戈德斯堡通过修正后的基础教义为标志），不仅更多社会民主党人成为改良主义者，而且左派也更多

地靠向改良主义。此外，在此期间，西欧的共产主义的特性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列宁就曾指责说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领导，是欧洲革命的失败之源。因此他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政党，以便带给欧洲的工人阶级以真正革命的领导。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言自明的是，那些奉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其领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结合在一起），是西方革命的最大障碍。

然而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最显著的是在意大利，最缓慢的是在法国）之前的一代时间里，西欧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都是准确地沿着改良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方向进行着，在此过程中它同时拒绝任何的革命意图。并且，这种“欧洲共产主义”并非只是作为一种用以避免恐吓其追随者（如选民）的手段而出现，而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风俗的全盘接受。就像卡里略（西班牙的新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表述的：“西欧的政治体系，是建立在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风俗（议会制、政治和哲学的多元论、分权学说、分散管理和人权等）的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其夺权和掌权过程中，都重视这种“本质上的正确性”。很清楚的是，所有这些都与列宁主义相去甚远，也与列宁所指定的党的角色相去甚远。而正如欧洲共产主义的左翼批评家们（恩斯特·芒代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今天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正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昨天民主主义的推论，这是令人无法满意的”）经常指出的那样，这些都已经非常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了。当然，欧洲共产主义者都坚决否认上述的指责，因为即使从卡里略的观点来看，在力图改造资本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只是想要“管理”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还是大有区别的。也有人辩论说，改良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即使它们看上去是相同的），其中有的是真正的改良主义，而有些则是虚假的改良主义。

差别只是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从任何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魁必须“被看作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力量的正在形成着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米利班德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一旦大家都明白（客观地说）社会民主主义确实是在真正地对另外的派系起作用的话，由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敌对状态而产生的窘境，就有可能被打破。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里，至少有些东西还是相同的、相通的。然而，新的理论趋向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不尽合理的西方民主政体的政治组织（现在当然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能够延续这么久的时间？为什么革命变成了不必要的，而在不少时候它又被不言自明地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呢？在思考此类问题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会回想起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里，关于改良主义、议会活动等等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是作为一个战术性的问题而出现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权机构，除了能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们提供新的作战良机之外，其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价值。事实上，只是出于一种信念上的需要，人们才认为民主政权机构缺乏内在价值。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撕下民主政权的表面的民主的假面具（在1984-1985年间的矿工罢工期间，亚瑟·斯卡吉尔就声称，警察的所作所为，清晰地揭露出在其民主表面之下的英国，是一个“真正”的警察国家）；他们的讨论，集中在资产阶级的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服务。就是在这样的思潮之下，马克思阐述了这个问题，而此后的讨论也是在同样的氛围中进行的（这些讨论，包括列宁在1920年在其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他反对那些极左的为反议会主义而所的种种的辩论）。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共产主义者对于西欧民主政体的“正当合理性”的发现，代表着与传统的一种背离（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过时的和勉

为其难的；而对于另外的人来说，其转变思想的重要性被降低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只把它作为一个战术上的反应而已)。当代的这段历史，现在看上去好像恍若隔世一般。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改良主义具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而西方民主政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两个发现，对于信奉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新事物。一开始他们就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思想范围之内，不断地提出这些观点，距今至少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在1914年之前，社会民主党就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把自由民主政体的传统延续和吸收进自身的机构之中去，因为这符合其社会变迁的发展模式。在1917年以后，这个设想不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不再被谴责为是一种欺骗（此前共产主义者就是这么谴责它的），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价值（社会民主党人先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如果“社会民主主义”现在意指一种明确的改良主义的观点的话（姑且不论这种看法到底是贬损了“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赞同了“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其拥护者来说，这也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一种完整的政策（它已将其范围从政治和公民的领域扩展到社会和经济的领域）。而现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虽然不是空洞无物的，但是还是相当不完整的。简单地说，“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只是用来表明这样的一种姿态：即不仅要求社会主义，而且还要求民主主义坚持将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方式和结构形式。在整个20世纪期间，至少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弄清楚这样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布尔什维克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完全可能是非民主的；而法西

斯主义则表明：有时候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也会变得无限糟糕。因此，历史的选择范围大大超越了 1914 年之前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单一的范畴。这就促使那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去界定他们（至少是他们自己的社会）与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被认为是相当可观的成就；而社会主义也视作是相同的文明惯例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这并不只是政治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和传播的问题。理查德·亨利·托尼在其著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作品中，就在英国一种“在自由传统的氛围中浸润发展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政治文化对于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阐述：

其结果就是存在大量的意见（其数量多于大多数其他国家）。这些意见对诸如个人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宽容、在政治事务中不使用暴力和议会支配政府等主题极为敏感；而这些主题，都被概括为是公平游戏及其保证。照现在的形势来看，社会主义要想通过赢得民众支持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它的唯一出路，在于接受现实。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必须认识到（而不只是从书本上读到而已）：深受经济盘剥之苦的阶级，也正是最重视这些（公平游戏的）基本礼节的阶级。他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给予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以选择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尽管其带有令人讨厌的虚伪性）还是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机会，那么每次他们都会选择前者。他们必须毫无疑问地搞清楚：他们所鼓吹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这个事实是一个聪明的而非愚蠢的证据，这也意味着亨利·杜比具有多多益善的意识。……作为社会主义者，他无意放弃其公民权利（毕竟，他是通过相当艰

苦的奋斗才赢得其公民权利的)。但是，不管是值得赞美的还是令人遗憾的，这样的心态只能取决于事实，并且任何现实主义的策略都必须基于事实之上。

托尼的观点，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它不仅仅是说，出于战术上的需要，我们要重视亨利·杜比的看法；而是还认为，亨利·杜比是对的。然而，接受这样的观点并不要求民主社会主义者变成政治无知者；在那些民主并不存在、或遭蔑视的地方，其它方法就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尤其是，当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府被非宪政的反抗所颠覆时，作为回报，新政府还被冠以民主的名号。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广泛表达了对于这样的颠覆行为的畏惧与期待，并就英国的左派问题进行了辩论。这种事态的严重程度可以从这么一个故事见其一斑：在 1932 年，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温和稳健的克莱蒙特·艾德礼，也就是后来的首相，建议说社会主义者要训练人民，以便在武装力量中占据领导位置，来应付颠覆政府的不测事件。1945 年工党政府完成其工作计划的能力，能够被视为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策略的生存性的一种辩护（用 G.D.H. 科尔的措词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就是“事实如此”）。然而，民主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不会对如下的现象感到惊奇：一个民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为一场政变所推翻（如同智利所发生的），或以武装接收的形式来实现通过普选而达到的社会主义政党掌权的目的（如同希腊所发生的）。相对于战后的“民主的”共产主义者，或以纯粹观念的名义在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进行争斗的各类政治派别，如果民主社会主义者能够更为持久地要求政治权利的话，他们也会对不同的改良主义有所了解。民主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热烈拥护自由民主政治，因此必然容易懈怠其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心。这个历史潮流，既可在其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可在其实际事务运作中，得到

体现。于此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发现民主社会主义退化为纯粹的竞选主义和政府主义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它难以令人信服地宣称（除非是在诡辩的意义上）：它的改良努力正是实现社会转化的更广泛的策略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足以能够这样指控民主社会主义，即一般地说来，不论何时何地，与其说民主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挑战，不如说它支持资本主义（除非，在形势迫使之下人们需要采用这样的分析模式）。历史上的证据告诉我们：社会民主主义采取过不同的形式，并能够实现不同的后果。当然它并没有送来“社会主义”，但是也有可能当时传统上设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展望，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并且（用伯恩斯坦的话来说）处于变化过程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评价。这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坚持下去”的问题，甚至当环境不利时（譬如说在最近的时代里），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事实就是这样，那么民主社会主义需要明确的方向感和策略，否则就会导致单纯的改良主义和调和的整合论的出现。组成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那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长期坚持这样的观点。并且，他们的民主方法的主张，是和与政治行动相关的更为积极和更为扩展的民主方法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就像托尼所说的），关心民主政治并不仅是一种政治机械论，而且还是“一种求得解救的有力手段”。这并不是要退回到被动消极的政治状态去，而是意味着要动员民众。这样类似于米利班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关心资产阶级宪政主义强加于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束缚”，而类似于 A. 比万（英国工党左派也即比万派的领袖）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则强调议会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所提供的巨大机会。然而，这些机会必须经由不断地释放民主能量的方法来得到完全的利用，否则就会产生优柔寡断和困乏厌倦现象。用比万的话来说，就是“当社会主义者使用民主价值全力以赴于解决时代问题时，大无畏的精神是他们

获得成功的基础。”换句话说，民主社会主义给了政治行动的特征和质量以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以怀着仅在理论上存在的同情心来看待这种论点及其实践者。

从这些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评论之中，形成了一个最终的普适的观点。它涉及到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方法和所要达成的结局之间的关系。民主社会主义，如同大家见到的那样，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方法和社会主义结局，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的争论。这就使我们（如同以前就意识到的那样）有可能采用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由此选择何种方式只具有工具性的和战术上的意义。而把依靠作为先锋队的政党的铁的纪律来实现革命的信念与革命后无政府的民主前途结合起来，也是完全可能的了。这种政治方式与政治结局的分离，不仅只是看上去不可能而已，而且也是完全不符合那些历史证据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政治方式与政治结局不仅应当彼此相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同一回事。如果说议会的宪政的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只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革命的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也只产生了国家权威主义。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是对的，她说：“社会主义者的方法；并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加以选择的（就像从历史柜台中挑出热腊肠或冷腊肠），你所选择的菜单会影响你将来可能得到的菜肴。”

第五章 结 构

在我看来，在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总有两个重要的分野——改革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分野，中央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之间的分野。

G.D.H. 科勒

如果说改良和改革之间的对抗是社会主义历史中令人熟悉的主题，那么关于社会主义的结构形式的争论则不是那样令人熟悉。在过去的不同时期，它们之间的这些争论已经成为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活动给主流社会主义带来了纷扰。然而，在20世纪末，关于社会主义的结构原则和形态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主义者讨论的中心。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明确一些论点、问题和传统。

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

搞清楚当代人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的原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一些背景。在科拉柯夫斯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权威性的陈述中，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由普罗

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开始而在斯大林的恐怖的暴政中达到顶点的奇怪的命运”做出了评论。抛开（至少暂时抛开）斯大林对于马克思的暗中的修正不谈，科拉克夫斯基的这一评论意见可以扩展到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的评价。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有它的不同的形式：纯正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群主义和自我管理主义。这些形式以蒲鲁东的互助论、傅立叶的法朗基，欧文的合作生活实验和圣西门的理论——由马克思的对于人类的全面的解放思想资源所支持的，将政治家的行政管理替换为生产者的行政管理的理论——为代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已经在各方面与中央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紧密相连。

相对的来看，这种联系是仁慈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绝对的来看，这种联系是恶毒的（独裁的共产主义），但是无论怎样总是存在这种联系。20世纪的共产主义发明了单一的政党独裁作为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选择在国家之上建立前所未有的强权和责任的方法，成为现代的官僚福利国家的建筑师。很明显，这两种道路都将社会主义带人了一条远远偏离最初的无国家共产主义的道路之上。在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可以宣称（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对于我来说，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坚守阵地的决心如此明显，以致于考虑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浪费”。随着对于一个非计划的、联合的社会主义的提倡成为主流，对这些“其它形式”进行判断就变得仅仅是历史性的、技术性的、和过时的探讨了。G.D.H. 科勒就是一个此种社会主义的提倡者，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做了大量调查基础上写出的著作《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带着一种孤独的自信，认为自己“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我把它们两者都看作是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一代人之后，激进右派和激进左派好像在他们

于国家的厌恶中联合起来了。然而，当右派在以下问题——国家应该做什么事情（例如，非管理化、非民族化、福利的私有市场、更多的不平等的自由）和国家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减少中央在国家政治上的力量，而不是增强这样的力量）——有明确看法的时候，左派看起来却在给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其它版本的内容时候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与右派不同，左派以民主可信性和公民自由的名义为削弱国家的政治上的力量做好了准备，却发现它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非中央集权主义版本的时候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在 20 世纪末，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西方当代的左派中似乎只有极少的朋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一种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模糊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确认一些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得到发展的理由。它们包括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特殊环境、一个有纪律的政党组织的后退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的勃勃野心。前者产生了一个以单一政党专政为基础的独裁的国家官僚的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这种模型在有些地方是被强迫组织起来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是主动采用的——在这里社会主义表现为国家机构和经济发展的代理机构。后者产生了一种根植于日益加强的官僚化社会民主政党（这一政党的贵族性质可以参考米歇尔在《政党》中关于本世纪早期德国政党的论述）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式。这一政党的中心活动，就是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的问题上采取逐渐扩张态度，给国家强加更多的功能和责任，但是对于这一活动——即逐渐扩张的国家组织和社会主义目标——所导致的后果却没有给予多少重视。

如果这些讨论与实践有联系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有关，那么就当然也有一些与理论有关的重要讨论。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有一种重要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

资本主义的主要攻击就是，指责资本主义的浪费和对于无政府状态之下的竞争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因而也无法与社会主义计划的优点相比。很明显，关于计划的讨论包括社会主义立场的许多问题，并且同样明显的是，这一讨论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中央集权主义偏见和对于经济上的多样性以及社会主观能动性有强烈反感的讨论。安德烈·戈尔兹（Andre Gorz）在他的《告别工人阶级》中说的很好：

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优越性也就是它在实践上的卑下性的来源。认为社会应该是有计划的结果，也就是要求考虑每一个人把他们的行为的功能作用于社会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一般来说，没有任何形式的行为不会导致它所没有设想的社会的结果。古典的社会主义教条发现很难与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达成妥协。这种多元化不仅仅是简单地理解为党派和工会的多元化，而更是不同的工作、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共存，多种多样和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围和不同的社会存在的共存。

因此，同样地，古典的社会主义教条也很难与平等的原则达成妥协，而平等的原则自然地培育了中央集权主义者集体供应和统一管理的政治。现代行政国家的发展已出现背离这一过程的现象，国家供应已逐渐地被本地供应所替代，自觉自愿主义已经被职业化和外加于纷繁的多样性之上的统一性所替代。无须说明，这一过程已带来许多实际的成就（尽管也许需要说明一点，官僚主义有相当的优点），但是它也给社会主义带来了许多其他的后果。随着人们的注意力逐渐地集中于中央权力的立法可能性上，这一过程也就伴随着由无数工人阶级的自助和民主的组织的萎

缩。因此，A.H. 赫尔西（A.H. Halsey）描述这一过程说，在不列颠，“从地方共同体到民族国家的层次，工人运动从民族民主和福利出发，从友爱出发，从平等和自由出发，”，而在这情况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没有从政党中发展出对于官僚主义国家的有威胁的东西”。基于相同的理由，一种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于被中央集权化的阶级政治所征服。

因此从不同方向，都有可能以牺牲其他版本的社会主义传统为代价来描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过程。然而，为了让这些问题的焦点更加清晰，有必要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组织的范围内，严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基本制度的讨论非常之少。其中当务之急是“乌托邦主义”的品质证明中的一部分，马克思曾想使自己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疏远。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直不愿理会那些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组织结构提出问题的人，认为那样做就像是写“未来餐馆的食谱”一样打发时光。未来社会的组织必然是由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来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的真空

这一方法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特征。因此考茨基在《阶级斗争》（1892）中解释道，对未来社会秩序的结构的关注“与现代科学的看法是根本无法协调的”，因为社会秩序的结构将是产生它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因此没有什么比社会主义者描绘一幅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图画更幼稚的了。假设这种描述是足够明智的，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它的前提和含意。它拒绝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原则来思考，而不仅仅是拒绝通过它的组

织上的细节来思考。这一假定就是仅仅有一个单一的结构原则在起作用——通过生产，私有产权被公共产权所代替，并且其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这种实践中发展出来。

当然，这并不是阻止马克思去描述由这个单一的结构改变所导致的人类生活的全面的转变。这一未来的生活开辟了一个自由的领域，一个由于劳动分工的废除而带来的创造性的后果不再异化的领域，当它变得

对于我来说，可以今天做这一件事而明天做另一件事，上午去打猎，下午去捕鱼，晚上去养牛，餐后发一番批评，然而我却不是猎人、渔夫、养牛人或批评家，只是因为我想这么做。

在这里引用这个值得纪念的公式的目的不是去探索一些人们熟悉的它的对立面（例如，技术主义的异议——它如何适用于脑外科医生和航空公司飞行员？）或女权主义者的异议（谁做饭和洗盘子？），而是来确认一种思考的方式，使得一个原初的结构变化跳跃到最具有创新的结果成为可能，“而在它们之间没有其它的东西”。实际上，企图澄清这中间地带的性质的努力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科学和历史的依据而徒劳无功。

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的分析，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却没有这样做。似乎社会主义是非资本主义的就足够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自由联合的人类的生产……按照固定的计划有意识的进行控制”提及社会主义的经济，但是对于自由联合、有意识的规则、固定的计划这些术语是否能与一个可行的、非强制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相协调，并没有更深刻的思考。除了马克思的其它巨大的贡献之外，并不是要求他应该创造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而是他的研究方法证明没

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将仍然是一个短缺、选择、矛盾和决定的竞技场。这样一种认识本身似乎是重要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和轻视小规模 and 特殊生产的中央集权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认识甚至变得更为重要。资本主义中央集中的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前提，替代了工业和农业的小生产，通过必要的社会化变为社会主义合理的单一的经济。就像考茨基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被看作“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工业问题”。

鉴于此，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以及由谁来运行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更有趣。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中，阿列克·诺韦（Alec Nove）注意到（以他作为前东欧计划经济的权威观点来看）“中央计划的功能逻辑非常‘适合’中央专制的实践”。既然表明马克思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共和主义传道士没有困难，那么同样的事实是，他倡导的那种分析方式，不可能考虑到由那种可能“适合”所导致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第一个提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如何能与政治自由保持协调的问题，而对于这一个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适当的回答。巴枯宁自己的回答（这一回答成为来自无政府主义和工会主义者控告巴枯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创造一种新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国家专制：

“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我们不断在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和演说中遇到的名词，能够充分证明所谓的人民的国家只是对大众的专制，而这种专制是由真正或虚假的“科学家”组成的新而少的贵族团体来实行的。人民，由于没有受到教育，完全被排除在政府管理之外，被迫成为被统治的群体。一种绝妙的解放！

如果同时能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留下了的很可能会失去，那么简单地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专制倾向的追究是不行的。巴枯宁的观点是一个真正的观点，它在 20 世纪的后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实践中已经获得了足够重视，而在这一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权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的基础，从而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世人变得非常熟悉的专制的后果。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明显地拒绝认真地看待全部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的时候，当在“联合的生产者”的知识中不能保证每一个人认真工作的时候，声称这样的后果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无关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阻止做这种声明）。“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要学会如何实现它自己的解放方案”，约翰·杜恩写道（在他的《面对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一书中），“那么，在如何在实践上和原则上赢得民主的胜利的问题上，它必须开始一种新的层次和风格的反思。”

这就将注意力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本身——整个讨论的真正中心。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结构原则讨论的不足，从总体上来说是对政治讨论的不足，从而使政治问题压缩到一种从属和派生状态。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系统的关于政治理论的阐述，因为（像米利班德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一书中所说）“我得到的经典著作中对于政治重大问题和政治理论只是沉默或敷衍搪塞。”因此马克思对于国家缺乏有力的分析与对于社会主义的组织问题的忽视并存。那些寻找马克思对于临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的性质的意义的人，以及后来寻找“取消所有阶级”的意义的人，便不得不在一些分散凌乱的参考资料中翻箱倒柜。因此，多年以来，这在导致这一马克思主义注释家队伍无害的学术上分歧的同时，也强调了应该连贯的政治分析中的裂痕。

至少在政治组织方面，只用马克思对于临时（尽管也是“充

满活力的”)的无产阶级独裁时期——跟随在其后的是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在这种社会中，再也没有“所谓的政治权力”——的必要性所做的阐述，就弥补了这一裂痕。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地行使权力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它表现为以一种在无产阶级手中得到强化和集中的国家权力，正如在1850年的《三月通讯》中马克思所宣称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任务〔是〕贯彻最彻底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却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讨论中，颂扬了公社的非集权化的民主，而这种民主是作为“劳动最终获得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建立在既有国家政权的废墟之上的。按照大卫·迈克李兰的话来说，它代表着马克思的这一信念：社会主义将以“政府功能的非专业化”显得优越。马克思用公社的名义来描述它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用“公社”来描述其意义所在

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应该是一个工作团体而非议会团体，同时也是行政和立法团体。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局，立刻失去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任的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一样。从公社委员起，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财产。不仅城市的管理，而是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但是，与马克思以前似乎提出的观点相反，公社的结构是不是也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呢（像恩格斯后来宣称的）？或者说即使如马克思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公社自身“仅仅是特殊情况下城

市的崛起”，公社是否就应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坚固的政治结构的一种期望呢？重要的是这一情况不得不作为一个问题的形式存在。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这个关键问题给出答案，比如中央政治权力将在何种意义上与一个非中央集权化的公社结构相联系，以及巴枯宁所提出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在政府里行动。

列宁和政治的终结

更加重要的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地方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展开性的论述，而这是任何政治体制都要被迫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人民代表性和信任性，政治竞争和对手的组织，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政治自由的形式。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的原因。它们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政治的派生地位，并且反映在这样的信念里：国家和所有无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国家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表现，因而当社会主义消灭了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以后，这些阶级矛盾注定要消亡。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将不再有所谓的政治权力”。这样一个没有阶级的统一的社会，将不需要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所必须的政治机器。当然在实践上，这将被转换为以单一阶级的名义而出现的单一政党的统治，其依据是政治分裂与对抗没有生存的基础。若从这样一种理论传统出发，即政治（和其他）斗争在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派生物，这种转换也不能由于其不合理而被抛弃。。虽然 20 世纪的党国模式自身是在产生它的理论传统指引下建立的，但是它最后埋葬了（或理应如此）这种政治依赖模式。它死亡的教训只不过证明了它活着时的教训。

因此，表明这样的事实，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没有提供

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组织结构的展开性的论述是不够的，除非我们也同时明白对于这一问题的忽视不是视而不见，而是它是一个真正的它的重要前提的权威的表达。唯一重要的结构改变是财产关系的变化，以此为基础，其它的关系得以产生以一种并非由乌托邦的臆想所期望而是由那些历史行为者自身所决定的方式建立起来。然而，社会主义对（支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制的）阶级矛盾的消灭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统一的民主的保证，也是一个一元社会的反映。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全面的保证了，它不需要精细的说明。从字面上来看，它承诺政治的终结。某些“政治权力”将继续存在，但是没有必要对将要采取的简单管理方式再遮遮掩掩。

尽管几乎没有通过所预想的方式，这一承诺还是实现了。那些将这种思想方式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权确实给了政治一个终结，或者至少是世人已经看到的最接近政治终结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列宁。是列宁在他写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夜的《国家与革命》中，将终结政治的一般概念转换为一种在革命后社会中将代替国家的民众自我管理的机构的理论，同样也是列宁，在革命的开始阶段，控制了以“民主集中制”的单一政党和镇压性的国家官僚体系为基础的独裁主义的发展。对于这一转变，无须求助于玩世不恭的解释。前者代表了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后组织问题的解决，而后者代表了他在实践中的方案。只有那些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特别关注的人才会对列宁的这种分裂感到诧异。

与人们熟悉的把列宁当作革命机会主义者的看法相反，先前我们已经提到列宁为什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安全的基础上构筑他的政治实践。如果他关于使革命成为可能的条件的阐述是正确的，那么，他对革命后社会的阐述也就是正确的。在布哈林之后，他用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需要破坏现存的国家机器的理

论来自我满足，而在马克思之后，他用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要由一个建立在公社模式之上的民众自治体系来代替这一理论来自我满足。因此，在《国家与革命》中，正是列宁（像哈丁所说）“把公社从被遗忘的角落中拯救出来”。他论证说，马克思对于公社的描述建立了社会主义组织的正确形式；苏维埃是这种形式在实践中的体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把生产与分配过程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组织点上，即在这个点上，生产和分配只靠一个民众自我管理系统通过简化的流水线即可完成。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由列宁在人们熟悉的文章中自信地加以阐述。

列宁在下面这段人们熟悉的文章中自信地描述了这幅图画的意思：

我们工人，应以资本主义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应依靠自己作为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严格的铁的纪律，我们应使国家官吏成为只是执行我们的命令的负责的、可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我们就能够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使一切官僚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监督和统计职能越来越简单，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再也不是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下的非中央集权化的、参与性的民主的描述（在这种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将轮流统治，而且很快就会习惯于无人统治”）代表了一种传统的高峰，它是马克思最初的普

罗米修斯式的解放性的积极的自我管理观点的完成，是古典民主理想自身的最终实现。

然而，作为一种传统的高峰，它也是这一传统的缺陷最为明显的地方（正如 A.J. 伯兰在《列宁与政治的终结》一书中充分论证的）。如政治和行政的后果可以简单地从对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得到这个基本假设。抛弃“资本主义”政治，这一想法从字面上讲，是在社会主义中，对人的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所替代。有这样一种假设：由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团结意味着有组织的不团结不可能有一个合法的基础。因此，列宁反映了一种传统：提供无分权的民主，无政治的行政，无公民自由的公民行动。在自我管理社会的抒情诗般的阐述背后，隐藏着“武装工人的国家权力”，而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政党的论述的缺乏（限于唯一一个一闪而过的附注），仅仅是确认了它注定要填充的政治真空。列宁的早期著作《怎么办》则被证明是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紧迫性做了更为可靠的指南。

在这一方面和别的方面，以及在社会主义形式发展中所谓的列宁主义时期，夸大列宁主义的重要性都是困难的，已确立的观点和传统假设陷入一团混乱。

经典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为代表，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将会扩展已经存在的民主的形式，而不是消灭它们。因此，考茨基立即对布尔什维克政治上的独裁进行谴责，但是这一谴责也暴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假设是丝毫未经探讨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可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压迫最显著的批评来自罗莎·卢森堡，并非基于由考茨基提出的一般的自由基础，而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党的政治独裁阻止了阶级的自由发展。如果革命不想枯萎，那么它就需要政治自由和民主：“没有普选，没有不受约束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观点的自由辩驳，生命就在每一个公共制度中死掉，而仅仅成为一种

生命的表象，在这种生活中，官僚机构成为唯一活跃的因素。”但是，卢森堡的观点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述：布尔什维克已经证明：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必然采取民主的意志自由的方式是一种幻想，独裁和官僚的方式也是可能的（而且也许可能性更大）。

对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后果中，或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动荡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把苏维埃当作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民主的具体形式是可能的，用社会主义术语表达的话，这就是政治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在1918-1920年的意大利，葛兰西可以把都灵工人“议会”运动表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一“议会”观念的一部分，来反对政党统治、国会统治和官僚统治。它是一种权力来自下面，而不是由上面强加的方式，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被看作是工人阶级制度之间的关系网络。

将这些制度连接起来，将它们协调排列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化的能力和权力的等级制度，同时尊重每一等很必要的自治和明晰性，就是在此时此地建立一种真正的工人阶级民主——一种积极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并准备此时此地取而代之，继承全国性的管理和控制基本职能的工人民主。

随着战后的工人阶级黩武政策（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倡导者与那些被遗忘的人物相联系，如荷兰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潘尼柯克）的崩溃，这个“会议”共产主义注定要成为一个少数的传统。其大部分被列宁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与改良主义社会民主派在争夺西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所淹没。在重要的意义上，甚至那些非列宁主义者也被迫在这场两极分化中将自己归入“革命”一方来反对“改良”。这对于葛兰西来说，包括在组织模式上从重视议会转变为重视政党。它还包括对许多反独裁革命的作用的信仰，即“在革命之后”，或更加精确地说是为了巩

固革命的需要，在经过一段训练和独裁时期之后，建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述的那种自我管理的社会道路就会畅通无阻。比如，工团主义者汤姆·曼可以宣称“未来的前景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向像奴隶般的下属发号施令，（而是）……平等个人的联合体的到来”；但是接着可以证实他对第三国际的支持，因为“有俄国的经验给我们做指导，我完全同意将有一个时期，不管长短，必须诉诸于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在写就这些文字的时候，苏维埃就已经被政党和国家所吞没了。不久就会有从“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马戏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唯一没有的就是苏维埃本身。

集体主义及其批评

如果在国际社会主义内部，被战后松弛的工人阶级跋扈政策所强化的有组织的分裂是有影响的，以致于到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流派就被专政的共产主义有效地埋葬了，那么在社会主义分裂的另一个方面，类似的过程也产生了。比如，在英国，费边主义者发展了一种代表着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精华的集体主义原则。萧伯纳在他给《费边文集》写的文章中，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概念”解释为

指这样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渴望通过民主来把所有的人们集中到政府中，以便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租金获得信任，直至最终通过土地、资本和国家的工业组织——通过所有的生产资源获得信任，一句话，通过被不负责任的私人的贪婪所肆意挥霍的东西获得信任。

也许应该说早期的费边主义者并不完全是通常被描述的相当僵化的国家集权主义者，至少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城市重视正视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角色。费边主义的历史性声誉也不应遮蔽这样的事实：英国早期社会主义的其它分支是联合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就像基尔·哈迪（Keir Hardie）的伦理社会主义里所反映的：期待一段中央集权时期仅仅是一个互助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或者更重要的，表现在威廉·莫里斯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改良的版本的有力反对以及他对非中央集权化自我管理的联合社会主义的一贯坚持中。

然而，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经典的费边主义仍然代表了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它是集体主义的，强调通过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来安排有效生产和平均主义分配的社会主义组织特性。它也反对其它种类的社会主义——不仅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且反对所有那些把自我管理（通常是生产者）作为其强调的中心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 20 世纪的 20 年代这段时期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此时，费边集体主义受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挑战（工业斗争增强了工人控制的要求，当国家主权受到来自多元主义者的智力挑战的时代）。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 G.D.H. 科勒为领袖，论证说，社会主义关涉自由和自我管理，关键在工作场所，但扩展到整个社会，并且期望工会组织从目前的消极、防御状态发展为一种对控制工业和建立基尔特社会的核心负起责任的，自我管理的工业化基尔特社会。

基尔特社会主义声称是工团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综合体。在强调工业自由的核心性方面，说它是前者无疑是对的，但是说它包含工团主义的成分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未能承认包括消费者利益在内的普遍的利益的地方主义。后者避免了工团主义的中心缺陷但是也抛弃了工团主义的核心价值。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煞费苦心的体系是用来在这两者之间建成一个可运作的混合

体。如果特别强调集体主义的弱点和危险，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已内涵于目前的未来。科勒在他的《工业中的自我管理》中注意到了“我们在今天如何以一种轻率的方式向‘国家’对人的生命进行控制的方向前进”；以及“在今天的国家中，通过议会进行民主控制比一场闹剧好不了多少，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将如何成为官僚机构的人间天堂”。它将提供更多的安全，但是它既不能改变工人的从属的地位，也不能为自由和民主的实行提供更一般的范围。正因如此，它不会对人类动机的重大改变产生任何影响，也不能被证明是一种能够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产生普遍反应的社会主义。它从上面强加，将从下面枯萎。

就像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会议”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注定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景象中消褪。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分裂的又一个牺牲品。然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相关思想似乎一度在英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的一个替代性方向。曾经发生了一段持续十年之久的，将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例证结合起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结构形式的争论。这一争论提出了诸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利益平衡、民主和效率、领土和功能退化等关键问题。1920年科勒（在他的《再论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和韦布夫妇（在他们的《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同盟宪章》中）都提出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结构形式的成熟思想。如果他们强调的东西仍有所不同，两者的观点都反映了一种流行的信念：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权力分配的结构形式进行思考是重要的（并且这样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地留给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也不能被它所解决）。1918年工党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的基础，随着它将“一般所有权”和“民众管理”的结合使用，反映了这一思想的流行。

然而这种对非中央集权化、自我管理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开放却在后来的半个世纪被有效地封闭了。它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有组织的对抗中无处藏身。前者采用了一种政党

独裁主义的方式，而后者则满足于采用一种包括反对向既存宪政安排表示效忠在内的谨慎的改良主义。经济萧条使工人运动失去了能量和想象力，而将国家视为救济手段。经济计划思想的广泛诱惑（受俄罗斯的例子影响）帮助加强了对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强调，同时由凯恩斯（Keynesian）需求管理思想所开创的机会在同一方向上更柔和地推进。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投下的阴影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保持警觉的需要以及巩固已经建立的政治形式的需要。当然，这是历史的速记，但是在一种对于远方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听而不闻的政治实践中，这些纷杂的影响是明显的。比如，在英国，社会主义变成了民族主义而且以一种否定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要求的公共合作的官僚主义的形式出现，而虽然有先前基尔特社会主义对首相的同情，1945年的工党政府现在看来是“严苛的中央集权”（K.O. 摩根《掌权的工党——1945 - 1951》）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以一种不那么消极的方式讲述这一故事。20世纪的政治经验至少提供了资料，通过它可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专制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那么多西方社会主义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费力完成这一任务，事实上也是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再设想将生产的方式由私人所有转向公共所有能足以使对自由的政治组织的任何关怀成为多余。像往常一样，R.H. 唐尼（R.H. Tawney）给出了实质要点：

事实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观念将它看作除政治权力以外，一切事物的国有化，其它所有的一切都仰赖于此，但中庸地说，真理并不是依据观点得出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国家是否拥有和控制生产手段，而且在于谁拥有并控制国家。

而且，对于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将通过将经济权力加到政治权力中来增大国家的一般权力问题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一问题应被看作更重要而非无足轻重。这最后一点饶勒斯早些时候就强调过了，他以经济权力多样化和政治权力的非中央集权化描述了社会主义（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组织》中）：

如果已经控制国家外交和军事力量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員也被授权管理全部劳工力量，而且如果他们在各种层次上，能以他们任命军事官员的方式任命经理人員，这将给一小撮人连亚洲的暴君都从未梦想过的权力——因为亚洲的暴君控制的仅仅是公众生活的表面而不是国家的经济。

因此，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确定为包括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政治代表和负责任的有效机制，同时还有准确划分市场与国家各自的角色，就变得重要了。它将结合并扩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赢得的民主自由，而不是将它们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自由的虚幻概念加以废除。

然而，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构建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它被在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十年”里最为成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版本所毁坏，这一版本宣扬了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的全部国家机器在本质上是虚假的，因为它有阶级的属性。然而，它也面临着一种来自社会民主主义的稀释，这种社会民主通过放松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接受已经存在的宪法性和制度性安排来对它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信心的丧失做出反应。20世纪使得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联系，如果更有必要的话，更加困难；并且为这样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即一个不仅确认社

会主义与议会民主的共存性，而且超越这一点提出一种将民主作为其积极的组织原则的社会主义提供证明仍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有能力的社会主义？

但是是否曾经有，或现在有这样一种可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吗？或者像长久以前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所表明的，是不是真的如此，即社会主义组织上的紧迫性只能是（最好的结果）导致官僚主义的统治和（最差的结果）其它的甚至更加暴政的统治方式？“我本人无法想象”，熊彼特写道，“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一种社会主义组织会有任何庞大的完全官僚化机构的形式之外的其它形式”。这样的问题也许可以被社会主义者避开——只要它们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上。但在 20 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变成了世界政治实践中紧要的问题。甚至在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的地方，比如在前南斯拉夫，有证据表明，政党主导政治角色阻止了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对于它们来说不结合是非常可能的，而缺乏的是一种更加客观的证据，这些证据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它们思考社会主义）有一种深刻的影响。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评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时候，乔治·奥威尔用这样的用词来总结“我们目前的困境”：

资本主义导致领取救济金的长队，市场的崩溃和战争。集体化导致集体庄园、领袖崇拜和战争。除非有计划的经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智力的自由相结合，没有走出这一困境的办法。

奥威尔继续对于没有人会把这个“某种”转变成实际可行的计划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进行评论。如果这听起来像本世纪中期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映的声音，那么 20 年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仍然可以被表达为同样的词语。在《漫长的革命》中，雷蒙德·威廉在阐述社会变革的僵局时，说这一僵局来自这样的事实

看起来我们只有被迫选择投机或者官僚主义，而我們不喜欢投机，同样，官僚也不那么吸引人。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能量没有了，希望破灭了，而且当然，目前在投机商与官僚之间的妥协仍旧没有受到挑战。

一种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由共产主义提供的，而社会民主集体主义看起来只能提供一种扩大的作为福利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的国家官僚主义的期望。如果这一期望导致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抵抗声音的增加（比如，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战后的《新费边文丛》中论证说“有计划的经济和权力的集中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了”），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个声音只是少数派的声音，结果，少数派加快了从社会主义里退出而不是增进民主要求。

然而，就像在其它方面一样，敌对的社会主义集团在 50 和 60 年代的松散化产生了一些后果。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独立地对苏维埃国家展开批评，从列宁主义谈到葛兰西，重新采用“议会”共产主义的传统，努力去重申在 20 世纪后期给人们多少带来一些信心的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解放诺言。在一种对于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和有组织的社会民主的官僚主义的拒绝中，在对于纯粹自由主义的自我管理的传统进行重新确认的过程中（必须加一句，在非常纯粹自由主义的方式上，并不是一直如此），60 年代西方的文化革命找到了它的政治表达（最明显的是 1968 事件）。

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也包括对于西方政治民主的有效性的承认；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产生了一种对于生产者民主和权力的民主化分散的新兴趣。比如，在法国，“工人自治”在7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复兴中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在同一段时间内的瑞典的社会主义（部分地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进攻的反映）重新形成了它的信念基础，即在民主中强调生产者民主的作用，而这种民主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明显的目标。同样，在德国社会主义的非激进化的翻新过程中——这一过程在1959年的歌德堡计划中达到高峰——它转变为需要一个民主的、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基层集团”将与国家分享权力。歌德堡计划包括著名的“尽可能地竞争，尽可能地计划”的原则。在1974年这又被表述为（被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施特拉瑟 Strasser）：“尽可能地工人自治，最大限度地中央计划和行政管理”。

更普遍的，在一段时期内（比如，戈尔兹和巴罗的著作），欧洲一些最有革新性的社会主义思想专注于讨论一种自治主义的、非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可能性的问题以及一个有组织的、产品主义的社会主义版本的不可能的问题。以前那种反对小规模、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的理论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从共产主义世界自身内部，通过与经济 and 政体相联系，反对者和改良者的声音探讨了新的多元主义的可能性。曾经一度甚至看起来似乎一种走向更加激进的方向的社会民主，可以与一种通过改良自身来产生新组织形式的共产主义相联系。

事实上，这变成最短暂的幕间休息。还远远没有变得更大胆，社会民主已被没有预料到的疯狂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复兴压制了，而对于那些刚刚努力从一种社会主义的版本中解放出自己的人，共产主义的倒塌，并没有给带来任何对于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探讨的兴趣。如果70年代似乎开启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结构

性的新思考，那么到了 90 年代，看起来似乎对于受虐待的旧思想的残骸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看起来很清楚，一种承担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双重责任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种以基本民主的方式表现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需要有一种实现这一切的结构形式的理论。用政治的用语来说，就是要求注意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性结构，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将继续作为集体决定的中心存在，而且它必须稳固建立在一种发达的和非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政治多元和政治与公民的自由之上的结构之上。换句话说，需要一种有更多民主，而不是有更少民主的政治结构。用经济的用语来说，这将要求（像阿列克·诺韦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一种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有多种社会所有权的方式，对于小规模生产和自我管理有一种偏好，中央经济计划被限定于重大策略决定方面，市场选择和竞争机制要根据确定的规则运行，在一个自由的劳工市场上，物质待遇上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是有意识地限制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既有计划也有市场，既有中央集权也有地方分权，既有国家调控也有自我管理的经济结构。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将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并没有在工厂的大门前停止，也没有被工厂的出口前停止。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它将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和有权力的社会主义。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来说，它也将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少数派的一种社会主义。

第六章 行动者

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对无产阶级的危机的一种反映。

安德烈·戈尔兹

如果说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话，那么是谁带来的呢？谁是其行动者和代理人呢？根据这里所进行的争论的一般方式，类似这样的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精确：是哪一类行为者，他们所设想和主张的是何种社会主义？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主义者看上去对关于动力的中心问题有着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虽然其间还有一些困难）。但是到了20世纪末叶，事实看上去显然并非如此。如果说过去像安德烈·戈尔兹那样的社会主义者能令人信服地向工人阶级道声再见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社会主义者现在则难以令人信服地向工人阶级点头致意（这是因为现在在工人阶级的问题上存有疑义，他们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界定）。

社会主义的代理人

关于力量的问题，为什么就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讨论的中心问

题呢？为什么旧的公理（这个公理就是：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承载者）会变成一个新问题呢？这里明显地涵盖了大量的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马上得到确认，因为它们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其进行概括，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会返回来论述它们。首先，在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实践中，阶级运动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从而阶级本身就转变成为政党组织。这样，作为社会主义行为者的工人阶级为作为阶级代理人的政党所补充。一方面，这可能会被说成只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阶级与政党关系的问题而已；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它也完整地暴露了“替代主义”的问题，其程度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于认为政党并不就是仅仅补充了阶级，而是完全替代了阶级。不仅如此，如同托洛茨基在 1904 年所警告的，这个过程还会进一步展开：“起初政党组织用自身来代替整个政党，然后中央委员会用自身来代替政党组织；最后单个的‘独裁者’就会用自已来代替中央委员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替代过程已经被视为是 20 世纪共产主义传统的独特的实际运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类似的分析方法已经被用于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分析之中。

在当代社会主义的力量问题上产生偏见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可能要陈述得更为直率些。社会主义的传统的行为者并没有表现出令人信服的才能来以符合对其所进行的描绘，他们不仅经常走错政治路线，而且有时候他们甚至参与到相反的生产活动中去了。西方的工人阶级不只是未能履行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布置的革命角色（这种角色最后见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而已，并且看上去甚至是更加不革命了。在 1914 年之后，列宁就有了这样的忧虑：西方的工人阶级，除非给予明确果决的革命领导，否则会通过社会民主党人的奸诈的作用，而体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的忧虑，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然而，甚至从改良主义方

面来说，工人阶级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并不总是足以保证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进行持久的再建设。法西斯主义的经验（这个经验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30%的纳粹党成员是手工工人，而这些手工工人曾被视为是最有希望的欧洲社会主义的原料）就为我们展现了右派的大众动员的前景，并降低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期望。在近来的几十年里，不断变化着的西方阶级结构的特征，被认为大体上是对关于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社会主义动力的新问题的描述。而在西方世界之外，这样的问题是以引入新类的社会主义行为者，并赋以另外的政治角色的方法来提出和回答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令我们毫不惊奇的是，今天关于社会主义动力问题的重要性值得引起重视。在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在同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驳斥和嘲笑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方案缺少任何令人信服的动力，反映出他们的一般方法的非历史性和非科学性，并且构成了他们的乌托邦主义的基础。圣西门在法国把他的“系统”演示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制度，尤其是一种社团（这些社团将在一个新的生产主义的基础上重组社会）的五花八门的聚合体；而同时傅立叶却在坐等愿意资助其社会实验的恩主，计划籍此来证明其纲要的正确性，并将这个世界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正是为了反对这样的乌托邦主义，青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作了物质主义的说明，就像《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的开场白所宣告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现在再来解释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规划四处寻觅适宜的动力，而是只需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规划和动力是内在于历史过程之中的。我们需要认可首创的行为，而不需要去发明首创的行为。资本主义是生产方式的阶级占有的当代形式，但是如同以往的占有形式一样，它自身也

业已产生了敌对的和最后超越的内部力量。无产阶级就是这些力量的代表者，但是也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和革命的胜利者。无产阶级将在规模、力量、组织和意识等诸方面得以发展，其发展情形就像原先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情形一样壮观。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会从一个自发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阶级力量的极化过程正在渐次地悄悄地进行。而居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则被吸纳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阵营”的阶级两极分化之中。这种敌意会在资本主义危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形势下达到其“决定性的时刻”，而此时无产阶级就会通过“绝大多数”的革命解放自身，并且由此也将整个人类从阶级压迫和阶级敌对的最后形式中解救出来。“因此，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里就这样把工人阶级任命为革命的主体，社会主义的载体。虽然这里给出的是用《共产党宣言》的戏剧性的习语所表达的梗概，为了考虑后来的形势发展还需要从不同方面来进行补充和限定，但是它确实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的观点。社会主义需要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而得到实现；事实上，社会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胜利。这里并不存在“阶级斗争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这样的问题，因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规定了其他的一切事情，并注定最后以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来得以终止。它反映在形式各异的劳方反对资方的斗争和不断发展的劳工力量的工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中。关于工人阶级掌权的确切的时间和形势，应该还有不少可以讨论和调整的余地，但是这里却把工人阶级掌权说成是如此的确切无疑，就像白天过后就是黑夜一样。马克思本人没有提供一种对于社会阶级本质的解释性的说明，这也不要紧，因为阶级是根据它们和生产方式的关系而被确定的，并且通过各自的

阶级行为而展现出来。

在我们探讨那些马克思使之与革命主体的界定联系在一起的题材之前，需要对这种界定本身的本质作些论述。这也暗示了在动力问题上当代社会主义者的严重的认识危机。甚至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不仅能听到现在就很熟悉的质疑阶级地位和阶级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声，而且可以听到就关于界定革命主体本身的基本问题而提出质疑的声音。简单地说，如果是马克思本人搞错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根据阶级前途与阶级表现之间的明显的鸿沟而设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对其根本性的进行理论识别的基础怀有深切的疑虑才被设想出来的。如同巴胡罗所描述的：“让一个特殊的阶级，一个在再生产过程中因其地位而受局限的阶级，承担起整个人类命运的重担，这只是一个黑格尔似的错误而已”。

换句话说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开始看上去就像是由马克思所作出的哲学上的发明似的。这是如下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早先已引用过的《神圣家族》的话语）的产物，这种观点认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什么，并且因为其阶级本质，它必定要做出什么作为。事先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可行性论证，无产阶级就被赋予了历史角色。它在履行其主要的历史角色中的表现，或许会引起对其作为行为者的能力的怀疑，或者甚至暗示着它并不明了其真正角色之所在。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它会必然“成为其所是的”。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预测的基础，并不来自于对于处于行动之中的无产阶级的观察（也不是来自于其本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有限的参与）。他的预测，从最初的和原始的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哲学思考过程的产物，而这更被这样的一种观点所扩展和支持。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包括同源发生的劳工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它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即集体劳动者阶级有能力和有必要通

过集体分配行为来解放自己，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但是，这种对于无产阶级化的描述，也还不是历史分析的产物，而是通过因为无产阶级的本质内容，这个阶级必须做些什么的思路，而设计出来的。

戈尔兹就令人信服地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通过这样的办法描述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以此表明它会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本质意识来。这就是说，在生命攸关的要成为其规划的那样的必然性的推动下，才能得以发生的。然而历史的分析是这样的薄弱，以致于不能真正支持那些用以巩固其理论而设计出来的命题。在他的这个结论里，马克思就来到了其理论上的十字路口，并且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能够真正丰富其原初直觉的分析方法来。当然，从上述描述中，就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仅仅通过由马克思所作出的哲学的发明过程就已经获得了力量，这样做显然是荒谬的。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通过资本主义才得以产生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反抗阶级。也正是这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对反抗资本主义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也反映在工人阶级的工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上。根据其数量与组织，19世纪的工人阶级就能够令人信服地被认为是一个上升的阶级。这样，马克思的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主义行为者的定义，并不是一个离奇的定义（即使它只是一种哲学推理的产物，而不是出于经验观察而得到的结论）。

阶级和政党

关键在于，马克思不仅仅发现了行动者，并且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不仅要发展其自身能力，而且还要发展其必然性。无产阶级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且还要为了整个人类来履行这个历史任务的，因此它被认为是普适的阶级。就是以这种形式，作为社会主义行动者的无产阶级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之中。而无产阶级以这样的形式入场，就为思考社会主义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后果。后果之一就是产生了一个这样的社会主义信条：不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也保证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存在。当马克思主义者尚在坐等无产阶级成为其应如所是的时候，这个信条支持了他们，并使他们能够不断地解释频繁延误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并相信下次（或再下一次）将不会这样（即那时候资本主义总危机就会到来）。当西方工人阶级以不符合其理论的方式行动时（如1914年的情形），还可以籍此来斥责其领导者的反复无常。当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受到民众运动的挑战时（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后阶段，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序幕。尽管以一种未受教条约束的眼光来看，这些民众运动也可以预示着一种相当异类的运动政体的可能性。

纵然无产阶级看上去也许不像是个革命的阶级，但是事实上人们还是任命了它的特殊地位。就它担负了整个人类的工程而言，那么它为此所作出的牺牲，是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的。至于工团主义者索雷尔，他原先所主张的作为好斗的、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的行动者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角色，为其作为社会主义动力的角色所取代。当然，工团主义一般都把产业工人视为社会主义直接的和不妥协的行动者。与其说它是围绕着生产来挑战资本主义，不如说它是通过政党和议会的迂回的误入歧途的途径来挑战资本主义，而这是和以一种广泛的无产阶级性的形式出现的真实性标志紧密相联的，用一句俗语来说，那就是：“没有白净的手，只有充满老茧的手”。至于无产阶级是怎样从一个自发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的，工团主义者会指出是由大罢工引致的阶级发展。尽管列宁强调领导与助织，但他也解释了革命形势是如何推翻常规的设想，并且作为政治教育的学校而为社会主义的行动者提供服务的：“在革命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一周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在一年的困倦的日常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列宁的评论暗含着一个重要的重点转移：无产阶级应该在革命剧变中学会起到其革命作用，而不是在这样的革命的序曲中去学会起到其革命作用。换言之，无产阶级坚持其社会主义行动者的角色，但是它执行其角色的能力，甚至其认识到自身角色的意识，现在都依赖于另外的行动者提供这样的环境（在这之中阶级发展能得以进行）的能力。这个重点转移（关于这一点马上就要进行更多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行动者的问题的传统认识内部引起了持久的张力，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这种张力的根源，在于必须要调和作为社会主义行动者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意义上的）必然的角色和其履行这个角色的真实能力和意识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描绘了这个过程，并籍此表明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性格发展，这个令人愉悦的调和会自然而然地进行。然而，甚至在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奴役的无产阶级，和期望作为自我解放的革命动力而行动的无产阶级，两者也是很难共存的。这就指出了一个问题，即使该问

题的存在既未为人所承认，也未为人所探究。然而，这个问题仍然作为马克思传统理论内部的一种特有的张力而存在。这种张力，存在于作为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的欺骗者的无产阶级和作为新社会和新人类的自觉的行动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中。

如果说在列宁身上能够更明显地发现这种张力，那么也正是列宁，最直接地从根源上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工人阶级产生了工人运动，但是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就一定存在着必然联系吗？如此恼人的问题，仍然隐藏于马克思对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的有机发展所作的说明（这个说明，也支持了第二国际的正统观点）的外观之下。马克思千真万确地把“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规定为是为工人运动提供实践的和理论的服务，而在这过程中，无产阶级就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的政治使命是以如下的事实（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言）为基础的：“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最先进的部分的独特的地位，来源于他们根据无产阶级的更开阔的意图和命运而对无产阶级的本质所具有的优越的理解力。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构成一个只归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并且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看上去这可以引出关于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动者的角色的疑惑，但是事实上人们并不承认这样的疑惑的存在。尽管看起来只有在那些更好地知晓局势并能从侧翼给予激励的其他行动者的帮助下，无产阶级的使命才能得以履行。但是这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却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毫无问题的。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对无产阶级和其先进部分的相互关系，或阶级与政党之间的一般关系提出补充说明。这个问题以一种有机发展的自我显现的方式，被认为是并不存在的。这种预先就认

定是毫无疑问的处理方式还可以见于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之中。它承认工人阶级在其获得自觉意识和政权的征途中，需要得到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帮助，但是这个帮助的工作被看作是阶级发展的有机过程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其自身从来就没被认为会引发某些异常的困境。

所有这些都需要被我们铭记在心，因为列宁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被认为是破除了正统观念。重要的是，列宁在处理阶级、政党与自觉意识的问题时，能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统观念作出反响。这样，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他就能够引用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意义深远的真实的”评论。考茨基是这样说的（而这也正是列宁所引述的）：

社会主义者的自觉意识被阐述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和直接的结果，但是这绝对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一起出现的，而不是从这一者之中产生出那一者来；它们各自都是在不同的形势下而出现的，现代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只有在渊博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科学的载体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个阶层的个体成员的思想中，现代社会主义才能得以产生。也正是他们，把它传达给那些智力上较为发达的无产者，而他们反过来又把它引入到当地形势许可其发生的无产阶级斗争中去。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就是这样被从无到有地引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去的，而不是在其内部就自发地出现的。

因为这听上去好像是列宁主义的真情表露，所以我们需要牢记的是，这也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统理念的真实表露。并且，

这种分析，在为革命的行动者配备合适的理论装置的过程中，为社会民主党暗示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考茨基的概念体系中，政党是“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聚合体”。

列宁辩称说阶级地位并不是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自发的创始者，并且认为对政党及其先锋队的这样的产生过程必须主动地进行干预。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的是，列宁并没有开辟新的领域。事实上列宁强调先进政党必须与工人和工人斗争保持密切联系，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论联系实践的表述。列宁也会指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社会主义理论大体而言也被认为是出自于同样的资产阶级的源头。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既不应认为其是卓越的、值得注意的，也不应感到震惊不已。然而在关于行动者和动力，尤其是在政党和阶级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为什么列宁主义就必须被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呢？

从经常被引用的《怎么办？》一书中关于工人阶级自觉意识的问题的相关章节之中，我们是找不到这个答案的。它是这么说的：

我们已经讲过，在工人之中，是不可能拥有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的，它是必须从无到有地灌输给他们的。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受其本身的能力所限，他们自己只能够发展出一种工会意识来。

正如大家所见到的那样，列宁主义的革新，并不取决于“从无到有”的意识问题（而意识问题却已经成为流行的正统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它所依赖的，可以从同一文本的更远的段落中得到披露：

既然工人大众自身毫无疑问地在其运动过程中能够制定出独立的思想意识，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这里没有另外的中间道路（因为人类没能产生出“第三种”思想意识）可走。……这里还有许多关于自发性的空谈。但是自发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会导致其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依附。……因为自发性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工联主义……而工联主义则意味着工人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资产阶级的奴役。因此，我们的任务（即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与自发性作斗争，把工人阶级的运动从这些力求使之受到资产阶级派系支配的自发的工联主义者的手里转移出来，并把它置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控制之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平衡决然地远离阶级，而偏向于政党。考茨基的看似毫无问题的关于阶级——政党关系的公式（不管人们是怎样评判其优缺点的）的观点，形似简单，而现在看起来，却是极有疑义的。这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斗争是否同时产生和是否需要政党和那些理论家为它们提供桥梁的问题了。在列宁的公式里，对无产阶级而言，它不仅不能发展出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而且还会发展出资产阶级的意识来。换言之，这就是以其自发性的本质而运行的无产阶级的自然的发展界线，而这里是没有有效的中间道路的。这样政党的作用就不是在阶级必然发展出社会主义意识的过程中提供帮助，而是把阶级从其朝向资产阶级意识的自然的发展路线中解脱出来。不仅如此。事实上，（与“经济主义者”的观点正好相反的是），经济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会产生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这样的经济主义，却将会产生出一种工会意识

来，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与现存社会相结合，而并非与其革命的超越性相结合。这也就是一个未受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失去正确的革命领导的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样的革命理论和这样的革命领导的本源就是政党。正是政党，现在决定了阶级的命运，从这个意义（即政党仍然指望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动者）而言，用替代主义的语言来形容列宁主义的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然而，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说法已经被决然地改变了。政党被视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的火车头，是急需运送一个所有迹象都表明其正向错误方向运动（如果听任其自身的设备来行事的话）的阶级的火车头。这也已暗示了政党的地位和组织。它的地位来源于其解释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凭证，作为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承载者，政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因为它知道政党本质上是什么和它要“成为其所是”所需要的条件。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政党，其组织方式使它能够将其正确的理论转化为有效的政治领导。这样的政党并不是开放的和多元主义的，而是（尤其在俄国的形势下）狭隘的、集权的和纪律严明的。这样，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先进政党就是对这种干涉（如果无产阶级要想履行马克思所指定给它的历史性使命的话，这种干预就是必需的）的修正了的观点的真实的写照。当然，这也指出（和预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其对于工人阶级（即后期所说的劳苦大众）的真实利益的优越的理论知识上而产生的能够论断的那种权威。只要稍微回顾一下 20 世纪的政党——政府关系的历程，我们就足以驱散认为这种思考模式已经只是过时的爱好而已的任何类似的见解：

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列宁的阶级——政党的关系的说法，在当时和随后的岁月里，都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当时最主要的质疑来自于罗莎·卢森堡，她

的指责既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也反对力图用有组织的政党的政治领导来取代阶级的自发的革命主动精神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被视为是“只不过将主张合谋团体的布朗基主义的组织原则有机地移用到工人大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中来”。卢森堡执着于“自发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否定政党、领导或组织的使命，它所意含的，是对把这些使命提升于阶级的革命性的自我组织之上的任何观点的驳斥。这些阶级——政党的关系的措词是极其重要的，人们也必须承认：从历史上来看“与所有可能存在的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永无错失相比，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下的错误，是无限地更为成功和更有价值”。

与列宁（还有考茨基）不同，罗莎·卢森堡相信工人阶级自身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在罢工和暴动之中，它展现了其本质和命运。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维持和鼓励其处于这样的自我表述的状态之中，而不是力图将其置于一个编制的铸模之中来扼杀它。如果这个观点看上去似乎给革命组织提供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基础的话（用这个观点，能够解释卢森堡的斯巴达克思同盟的命运），它仍然作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的真实重申而出现。这并不只是卢森堡的主张而已，这也已经成为那些抵制列宁的阶级——政党关系的描述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马克思难道不经常坚持认为（用其《协会临时章程》的绪论中的语言来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吗？确定无疑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有的观点都认为社会主义不只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因此，人们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或者和列宁主义相混淆。这样，凭籍于原著的文本，人们可以放心地重申马克思主

义是一种阶级活动的学说；而相比之下，列宁主义则是一种政党活动的学说。

新行动者，新问题

唯一能使人消除疑虑的问题，就是回归到马克思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本质上的革命特征的哲学的信念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对照列宁主义的真实含意而产生出来的问题。非常明显地，这一问题的中心意思之一，就是工人阶级在实践中不可能产生出革命意识，工人阶级如要履行其作为社会主义行动者的职责，就需要纪律的约束。换言之，这个问题就是：尽管工人阶级运动具有非革命的本质，我们怎样来进行革命；并且，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在那些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和经济的主导要素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怎样进行。列宁就曾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如果无产阶级的理论水平能使无产阶级理解它的客观利益和历史使命（即使这本身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尽管无产阶级事实上看上去并不知晓历史所要求于它的使命，并且它甚至并不作为一种发达的社会形式而存在）的话，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够为无产阶级运动所操纵。

这样，列宁就解释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行动者怎样能够在实践中履行其职责。再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看上去可能扰乱了这个解释，但是至少也从真实世界中得出一些贴切的（如果说也是混乱的）证据。这些证据揭示了：在力图简单地从阶级观点中读出阶级行为，或者相信从前者之中可以引致出对于后者的一种特定的表达的过程是必然的或一往无前的任一尝试，都是有困难的。列宁认同的是一个将西方的工人阶级结合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而非一个逐次的无产阶级同质和意识的发展过

程。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地方主义的角色是以工人贵族的形式而出现的，并且还处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之下。此外，在确定处于俄国形势之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性时，列宁不仅强调了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政党的重要职责，而且还确定了其他行动者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农民和民族的重要职责。而且，当西方的工人阶级未能对来自俄国的帝国主义的锁链被打破了的信号作出反应时（列宁的革命理论坚持认为这种反应会即将到来，尽管他自己早先也描述过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堕落的特性），列宁就把社会主义行动者的班底扩张到他所能容纳的，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受害者的这个世界上的受压迫的人民：“我们现在不仅是作为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者，而且同样作为受压迫人民的代表者而存在”。

于是，传统社会主义演员表的扩展和分解的决定性时刻就来到了。作为无产阶级的代理者的政党，将在西方社会里引导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者。全球性的革命是确定无疑地要发生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不再被视为是其动力之所在，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性的大众和东方的民族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现在都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方，因此需要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解放的说法。然而，这些都为全球力量的平衡所担保：

在最后的分析中，斗争的结果为这样的事实所决定：即俄国、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其人口数量在全球总人口中占据着绝大多数，并且在过去几年期间，正是这些大多数的人们非常迅疾地投入于解放斗争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斗争的最终结果确定无疑地将会到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才是完全的和绝对可信的。

结局还是老样子，但是现在该轮到担负新使命、并处于新的革命环境之中的新的社会主义行动者上场了。

这样，发生于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的重心的转变（它最早在 1917 年就显现出来，后来又更多地更进一步地得以证实），其本身在关于动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里都带来了深远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语汇可能还是照旧，但是在那引进以政党来取代无产阶级的地方，“无产阶级”这个词语已经成为政党的一种隐喻。这就是在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在那里共产主义者动员农民加入全国性的人民党主义的大众运动之中。这也发展出了一种值得重视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名称，其情景就像“阶级”和“人民”被熔入了各类反帝国主义的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教义一样。一些国家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就像法农和卡布拉尔），不仅以贫困农民取代了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真正革命的阶级，并且在他们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普遍拒斥的过程中，也遗弃了马克思主义。卡布拉尔这样写道：“我们寻找工人阶级，但并没有找到”。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例如乔治·利希海姆），面对着毛泽东主义、卡斯特罗主义、非洲社会主义及其他的各种此类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五花八门的聚合体时，会产生一番对于意识形态的绝望：

国家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农民等同于无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等同于反资本主义，直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中费力地被详尽描写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所有特征都遭到抛弃，而只主张一种简单的二分法：西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忍饥挨饿的民众。

当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认同为社会主义的承载者的时候，也就

同时认同了一种能够从无产阶级的动力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承继其所历经的时代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这样在此基础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领袖就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他们认为这是由错误的行动者，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发动的一场革命）也和它即将产生的那种政体的可怖的征兆紧密相联。事情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致于列宁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以各类理论变体的形式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公正、经济现代化和经济独立的各类民众运动的理论的（和组织的）基础。这种不祥的征兆也可以被归纳成为更宽泛的 20 世纪的术语，有时这也被描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也即理论是美好的，而现实是龌龊的）。然而从中也确定无疑地表明：实践领域并不按照理论领域所预设的那样行事。当然，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以其理论上的中肯而著称。它解决了一个历史之谜（它的理论成就就是：给出了一个通过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作用，而得以达成的实践演示）。

因此，在论证为什么农民不具有作为社会主义行动者的地位、或者为什么那些不重要的民族性、会被国际经济的发展及其与之相随的民族分裂所吞没、或者为什么西方的工人阶级必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并不存有什么困难。但是，这里理应存在这样的困难的。关于马克思初创性地把无产阶级等同为社会主义的行动者这个本质特征，我们已经对此论述颇多，但是这种等同是根植于一种把劳资关系当作通过阶级行动而产生的社会现实的基本的决定因素。但是，为什么阶级地位就会产生特定的阶级活动？为什么关于社会决定的本性的一般理论，就会给这种决定可能引起的实际形式和实际结果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南？然而更为根本的是，与为种族的、伦理的、宗教的、性别的和其它的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醒目的对立相比较，为什么与生产方式相联的阶级对立就被认为是具有唯一的决定性的重

要意义？

如果说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忽略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至少在 20 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的任何人）就必须面对它们。例如，在 1848 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能够满怀信心地预言国家社会主义化的到来；但是一个世纪以后，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的是，这只是标示着（借用 E.H. 卡尔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化”。这可以令人回想起在欧洲历史上，在民族主义示意其不能满足于这样的从属的和派生的地位之时，马克思就宣布了他自己的从阶级层面上提出的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在 20 世纪末期，随着新近共产主义的废弃和民族主义的活跃，这种地位颠倒就更进一步根深蒂固了。西方工人阶级未能按其预期的方式行事，自然被视为是主要的理论问题（与之相随的，是在 20 世纪的政党——国家体系中，政党以其自身取代阶级的能力问题）。这就出现了一种“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结果，有时它也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活动的前景方面作出冷酷无情的悲观厌世的结论（从马尔库塞所主张的结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近代的葛兰西的信徒们所主张的一样）它也主张一种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更加积极乐观的方案，认为建立工人阶级的文化霸权的工程是可能的。总的来说，尽管在阶级地位和阶级行为上存在着不一致之处，这个问题还是按照正规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被设定了出来。然而这个问题就是按照这种形式从那些用来讨论该问题的术语中产生了出来，并且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壮观的场景：近年来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本不该栖身的边隅里夺路而出，在对不必要付出的如此巨大的努力表示遗憾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赞赏其中的灵巧的步法（他们正是凭此摆脱了困境）。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西方工人阶级未能“成为其应如是”的很大的责任，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及其领导。尽管

20 世纪的社会民主政治还具有理论上的假象，尽管它的主要的支持是来自于在工人阶级之中，它还是被指责为通过其中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而背叛了工人阶级，并且因而被认为是“客观地（从而扼杀了人的主观作用）”对待现存秩序。这个指责首先是由列宁提出来的（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也正是列宁，解释了尽管英国工党是由真正的工人阶级所组成，但是它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与此相反的是，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其各个层级中缺乏无产阶级的成员，但是它却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这也成为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统理论；并且它对于许多当代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简单地说）社会民主政治已经多次被证实易于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之中接受长期有效的诱惑，以致于退化成为仅仅是竞选主义和一种对于现存秩序的长久和解而已。而事实上，（在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它也不仅只展示了一种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还展示了逼迫范围更广的社会接受其自身定义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争论是普遍的，并且经常是毫无结果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控社会民主政治背叛了工人阶级，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而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所作的反指控则是，它正是按照人民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来行事的。而那些相信工人阶级的“本质的”革命和自我解放的能力的人们，尽管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同样还有列宁主义的政党）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挠这些能力的实施，但是他们却令人感到惊奇地毫不为之所动，并且一直和到处宣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客观”任务是一宗信条。此情此景之下，这样的辩论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

从阶级到人民

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理论（从其 1917 年以后的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包括那些虽被自我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并非共产主义的，和通常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非常显而易见地需要对其自身进行有关社会主义行动者的说明。尽管它根植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它也必须将社会主义思想的普遍性与反映这个普遍性的运动相互协调起来。这样，甚至在第二国际期间，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念宣称无产阶级是普适的阶级（而此时饶勒斯却宁愿把社会主义政党描述为“所有的伟大事业和所有的伟大思想的几何轨迹”），马克思主义就结合了思想和利益、普遍和特殊，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被视为是工人阶级利益的胜利。民主社会主义者拒绝这个公式，而主张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观点，但是后者的普适性并不能被削减为前者的排他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被剥削阶级的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受惠者和民众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然基石，但是其本身并不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样的等同（即把工人阶级等同于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是错误的。

这种等同之所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价值问题，因此任何人都容易接受，并且都能够作出道德选择；而且还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只在阶级范围之内处理问题，这就给作为个体的人类留下了太小的“空间”。而这种等同之所以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则是因为它用以支撑的社会分析是有缺陷的：为资本主义所贬伐和分化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的开明社会主义者的阶级。就像萧伯纳所言：“正如从蓟中就能采集到葡萄一样，从 19 世纪的人类成果

中，也产生出大量的远见卓识”。不仅如此，这也是一种相信资本主义危机将使工人阶级激进化的错误观念。就如同当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日益增多的阶级分化和新的居间集团的出现，就确信阶级的两极分化就已经进行着，也被证明是个错误的观念一样。从所有上述这些分析之中所达成的结论（无论以原则为借口，还是以政策为理由），就是必须构筑能够广泛吸引不同社会等级的民众的说服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英国，早期的费边社员把其兴趣对准新的社会阶层（诸如管理者、职业工作和专业技师等）；而 R.H. 托尼则结合了费边社的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主义，建议说：工党必须看上去更少一些像工会的地方利益的捍卫者，以此来吸引所有那些“其人生事务并非在于攫取利润，而在于进行建设性的活动”的人士。由此所产生的，“并非是授予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的产业工人的权利要求以次等的地位的问题，而是把这些权利要求按其本质上所示的样子进行描述的问题”。而在本质上，这些权利要求就是对配得上整个人类的生活的要求。在如此的生活状态之中，正派人士并不会为其同辈所拒斥。以这种方式来拟定社会主义的辩论，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激进的和爱国的传统文化并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例如，在英国社会主义内部，就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与“真正”的英国、人民的英国（欧文将其描述为“正好只紧靠着英国表面之下的英国”）的多愁善感的潜流，和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动员这种英国的企图。社会主义可能被等同为社会团结，这样就使得公共文化的基础植根于共享的信念之中。这个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相分离之后，就特别被用来区别瑞典的社会主义，并且成为诸如恩斯特·维格福斯和皮尔·阿尔宾·汉森之类的关键性人物的中心思想（正是后者创造了“人类家园”这个隐喻，用来表述一个美好社会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的主张），那么，总的说来，当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在业已产生出一种工人主

义的态度传统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之内运作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就已经探索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基础和更一般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其 1959 年的巴特戈德斯堡纲要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宣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成为人民的政党了。”

然而，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以“人民换取阶级”的替代主义的特殊的观点之中，不仅只是一类社会主义成为其受害者，而且任何一类的严肃的社会主义都同样成为受害者。这也许并不就是新的行动者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的问题了。这可以被视为是对于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级的非激进化和新的社会团体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反响而展现出来的。这就又把人们的注意力指引到体现于当代在动力问题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之中的西欧变化着的阶级结构的重要性上面。许多社会主义者把“新的”工人阶级规定为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并由此得出保守的结论；而另外的社会主义者则发现了“新的”技术工人阶级（而这也引起了对于权力和管理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也有不少人想方设法要找到传统的左派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尽管其中也经常（最明显的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革命”）仍然反映了在许多方面必须把他们自己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的行动者与正熟睡着的巨人联系在一起。而一些社会主义者则探索把各不相同的被剥夺权利的人们聚集起来，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则强调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新的有产阶层之中赢取支持。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被当作当代社会主义内部的动力危机的证据。尽管面临着为无产阶级未能以所期望的方式行事而产生的危机，但是在被普拉兹所称为社会主义阶级分析的“边界问题”得到的广泛注意之中，还是反映了要保留“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行动者的企图。一方面，现代工人阶级的界线被设定得如此宽泛，以致于社会主义不再需要依赖传统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另一

方面，这个界线又被设定得如此狭窄（就像普拉兹所做的），以致于工人阶级沦落为社会的极少数部分，这样任何的社会主义策略都显然必须以工人阶级与其他的社会团体的联盟作为必要条件。以这种方式，阶级分析本身就为社会主义带来了直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启示。事实上，如同从为欧洲共产主义者用来支持其在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流行的联盟”的观点而发展出来的那种阶级分析一样，这种阶级分析明显地也是主题先行的和蓄意而为的。对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这个观点的一个反响，是基于对变化着的阶级模式进行简单的分析而作出的。在英国，这是通过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在1981年所作的《工人阶级的前进步伐是否停顿不前？》一书中，主要集中讨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于左派的种种辩论）的作用而得以广为传播的。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内部，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外部，人们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是否真的标志着对于社会主义的自我解放的行动者的遗弃，而不是对它所作的保留和重新阐释？加之，如果它真的意指如此，它是否也标志着要以“人民”来取代“阶级”，从而也要遗弃关于把处于中心地位的劳资双方的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内部的根本对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对于循规蹈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就产生了许多难题。而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则不存在什么难题。除非社会主义是根据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定义，而无产阶级本身则是根据劳资双方的相互关系来定义的，否则即使无产阶级不能履行其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或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使命，也并不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致命性的损失。会带来致命性的损失的，是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在一个尚残存着破碎的旧的阶级界线的“新时期”里寻求到新的支持者，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动力的问题处于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中心位置。期望传统的工人阶级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承

载者，这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料旧的工人阶级（例如，那些仍然依恋于诸如“自由的集体主义的协议”之类的陈腐观念的工人阶级）将反映和复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来挑战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成就并不只是确定了社会主义的传统的行动者（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手工劳动的强健孔武的男性）的有限的几种刻版的模式，而在于确定了作为其基础的劳资关系的些许特征。女权主义也扩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定义（使其定义的范围从原来的“工作”变为现在的“生活”），并且也扩展了可能存在的社会主义行动者的范围。

鲍曼写道：“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完全周而复始的和循环不息的。开始之时……它是作为一种寻找顾客的思想而存在；后来就变成了寻找思想的顾客。”这些顾客包括所有那些寻找一种比 20 世纪晚期的全球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更为理性、更为安全和更为人道的安排社会（其中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 and 社区）的方式。如果说这样的顾客难以与社会主义建立联系，有人就会辩称说：这与已经提供的各类社会主义和传统上对社会主义的施动者所作的有限的几种解释有关。当安德烈·戈尔兹认为：“后工业时代的主导的社会主义行动者应该是一个非生产者的没有阶级分野的社会集团时，这看上去似乎代表了任何种类的前后一贯的社会主义策略的最终消解；或者它还可以用来指明这样一个基本的暗示：要以整体的事业需要整体的对象的方式来重新修订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最初确实是根据一种普适性的人道主义来规划社会主义事业的，但是后来却把它限定为一个单一的阶级在一条单一的战线进行战斗。这个单一的阶级的行动者不能如所期盼的那样行事所导致的危机，迟早会使社会主义找到一个与其章程一样宽阔的基础。此外，如同巴胡罗所说的：“从眼下的形势之中导出的道路并不需要被所有想要讨论它的人认作是‘社会主义’”。

第七章 未 来

社会主义死了。

(阿兰·托瑞尼)

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可能的未来。

(汤姆·博特蒙)

在 20 世纪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遇到的难题是本世纪即将过去。如果说 19 世纪教给了人们关于资本主义反对自身本性的重大教训的话，那么 20 世纪就教给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同样教训。从许多方面看，20 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从一种观点来看，这成为胜利和证明自身的史实；然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是一次令人沮丧和导致分裂的旅行。就像鲍曼在《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中描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它穿着乌托邦的盛装庄严地来到世界上，而今变得由于它所宣称的目标及原则的实现而失去活力”。

此时与彼时

让我们考虑一下 1900 年的社会主义世界与今天的社会主义

世界的区别。在 1900 年，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但人们相信将很快会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都把历史作为自己的武器，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于社会的包罗万象的学说，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自身经济矛盾的压力下必然灭亡，以及为什么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将获得政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费边主义者的历史科学认为，有一种导致集体化的动力，可以被改革者用来建立一个生产与分配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将在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

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政体之下。但是这些政体中没有一个是达到了本世纪初的革命者和改良者对社会主义的描述。改良主义的角度是西方工人阶级通过选举，达到社会主义，这似乎有利于停止社会民主这片沙滩的流失，而社会民主即使在发展福利资本主义的有限目标上也越来越困难。由于所选择的领导人对其历史角色顽固的拒绝，革命的角度在西方当然进展得更加不妙。1917 年以后，其它地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创造了一种权威的党国的模式，作为 20 世纪“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而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 1989 年社会主义的颠覆性的大分裂。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可以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之上，在 20 世纪末，它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都是独裁国家。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的批评者所引用的）或一个偶然的事实（它的朋友所暗示的），但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众来说，它是一个决定性的来解释“社会主义”为什么有如此重要影响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对后面作出一个结论看起来有些似是而非。在西方民主国家，改良社会主义者已经大体建立了社会主义，但是它

却变得更加难以发展社会民主。在其它社会，革命社会主义者大体建立了社会主义，但是它们都是独裁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初西欧社会主义者以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验版本是正确的，然而，不论是通过改良还是改革，他们相信这些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的观点则是错误的；他们不相信其它版本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前提条件不具备的地方也是可能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他们是自己理论的囚徒，尤其是他们把它当成科学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顽固的世界总是能够令他们惊讶的原因。

刚才的结论不仅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和不同的社会之间的明显的联系上是似是而非的，而且也与 20 世纪的相匹敌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相呼应。一种独裁的共产主义（东方）对应着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西方）。直到本世纪下半叶苏维埃戏剧性的崩溃（当瑞典长期保持的社会民主也出现裂痕之时）以前，在社会主义的世界杯比赛中，苏联和瑞典在本世纪曾长期竞争，而在当时看来，这场比赛要持续到下一世纪。因此，这里是西方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的两难困境中最重要的部分。本世纪的第一教训好像是左派仅有非民主的共产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两个选择。如果这确实是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以下情形就不足为奇了：西方的工人（以及许多社会主义者）满足于社会民主，而对探索一个更加险恶的道路逐渐失去兴趣。除了锁链，他们还有更多可以扔掉的东西，这里的“更多”包括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这些是他们通过长期斗争而艰难获得的。就像利希海姆所说：“社会民主也许是令人讨厌的，但是至少人们熟悉它，并且它并不对自由和尊严构成威胁”。

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记录可能是有争论的。人们也会认识到办公室中的社会民主党派的退化趋势，但是他们的民主记录是重要的。在这一记录中，虽然来自左派的反对他们的“选举主

义”控诉可以做他们民主敏感性的确证，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洗刷右派给予他们的有罪的污点。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也许是不确定的，或者是被推迟到无限远的未来；但是他们对于民主的承诺不是如此。到目前为止，20世纪似乎表明，至少在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可以有一种平衡（当然，与以前的看法相反，在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西方的工人阶级明智地选择了政治自由。这一选择，当然，通过将社会民主和福利相结合的能力，通过改良进步，通过一个持续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变得更加有吸引力。这种改良主义尽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但它曾经是前1914年社会民主的实用策略；而它成为以后社会民主政治的明确的基础。它的黄金年代是1945年后资本主义大发展和社会民主繁荣的战后“恢复”期，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但界限并不清楚。

要适应西欧政治生活的现实，共产党就需要向“欧洲共产主义”的方向转移。这一方向确凿无疑地通向社会民主，并且导致了背离“无产阶级”民主的早期列宁主义的批判。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共产主义者对于议会民主的忠诚宣言和对于革命道路的批判，与认为没有意识形态冲淡的社会民主的高调是相当的。如果说欧洲共产主义的建筑师之一卡里略坚持认为，“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不可能有任何混淆”是因为前者“倾向于改造资本家社会而不是管理它”的话，这也不能隐藏他采用的在本世纪初会被认可的明确的修正主义立场。西方共产主义政党的历史仅仅确认了这一点，有时（如在意大利）表明这些政党最终的衰落，而他们最终正式信奉了社会民主。

然而，如果欧洲共产主义竭尽全力地通过转向社会民主的方向来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那么它们也因此接受了目前社会民主自己的问题。当他们说他们在改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

(不像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仅仅是说说而已)，欧洲共产主义者也许会声称，他们不是在儿戏，但是这样也不能够使他们有效地保持社会改良主义。如果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是西方共产主义传统关于历史问题的一个反映，那么社会民主自身的传统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早期让人舒服的结论，即在西方，可以把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方式，最终变成让人不那么舒服的原因。如果说本世纪最大的教训是，左派仅能在非民主的共产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之间选择的话，那么次之的教训，也是一个更加令人惊慌的教训就是，甚至是社会民主的选择也变得不太可能了。

社会民主党的困境

社会的民主的策略曾经被资本主义这头奶牛所哺育，在反复无常的 20 世纪中，社会主义的策略是继续稳定推进的。它的成果可以在保护性立法和福利供应——组成在此阶段的社会政策的历史——成长的过程被看到（用历史主义的用词，这代表了一个主要工人阶级生活的安全性方面的进步）。在本世纪中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盛时代，有可能相信这一过程将继续以不被打断的方式进行下去，社会主义的乳汁将继续从资本主义的奶牛身上流出。的确，以这种信仰为基础，不通过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于产品的社会拥有），达到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以福利和社会平等为限度）看起来是可能的。福利资本主义可以产生社会产品，而这种社会产品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以及“社会主义者”在以前曾相信仅仅通过废除私人的所有权可以达到的。对于社会民主的修正主义以克罗斯兰在 1950 年写出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为代表。在书中，他带着对于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羡慕

的眼光，在那里古老的意识形态的重负已经被抛弃了（为了选举人的利益）。

很明显这一观点以一种过于仁慈和温顺的现代资本主义为基础。它并没有考虑到在资本主义内部急速发展的不平等性，资本主义用来是在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在缩小不平等，即使（像当时提忒墨斯所展现，并且在以后被广泛证实的那样）是运用福利组织也是同此。所以情况是，不是仅仅反思社会主义的手段，还应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是一些社会民主派所采取的策略选择，是社会民主派在资本主义可以确实产生什么的方向上，以及巨大的目的放弃的方向上的社会民主派的历史性的雄心勃勃的调整。8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社会民主党派也许可以被看作它的正式的宣言。如果资本主义不能产生平等，那么社会民主派将满足于它可以产生的东西，而且尽其所能进行哺乳。

这就在一般意义上指向了一个基本特性和社会民主传统的困境。对于通过改革和让步的政治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方式做出调整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然而，这种分配的政治学在资本主义的青春期和成长期是最成功的，而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收缩期则不那么成功。换句话说，它代表了一种依赖的政治学而不是一种变化和转型的政治学。因此战后长期的资本主义繁荣期也是社会民主最有信心和最成功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倒塌的扩充为社会民主带来了危机。事实上，在这些时期内社会民主在福利供应和保护反对放纵的资本主义市场方面的成就可以以资本主义的“共同意识”作为一个负担为代表，而这种负担阻止了经济体制根据其自身的内在动力有效地运转。在经济衰退和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当社会民主的左派发现一个可信的反抗或有选择性的行为很困难的时候，当所需要的东西不是一个依赖性的分配的策略而是一个使人信服的生产的策略的时候，现代新右派关于这一讨论的逻辑的探索的效果是很好的。

这表明在社会民主方面的更加一般化的组织化和理论上的弱点。它的方法是改良而它的工具是国家。结果是它在国家中积聚了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但是对于社会民主的组织结构的问题没有从控制、自治和可信性方面给以许多严肃的思考。福利社会的看法因此变成福利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器。中央集权的统一性战胜了非中央化主义和多样性。一个自治政府的社会主义在管理型的集体主义失去了自己。社会的所有权变成国家所有权。这看起来太露骨了而且没有必要的标准，但是它形成了近期社会民主的危机。不仅仅是社会民主的策略即收取、分配被战后长期经济的繁荣后严峻的经济气候所削弱，而且它与国家的联合（在那里的人们不把国家当作“他们”的国家）也被自由主义者关于自由、选择和自治的讨论所削弱。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紧密结合而不是与民主的自我管理政府相结合，而这在西方的选民中产生了一种显著的厌恶情绪，使得他们不再相信将一种社会主义的分配扩展到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值得的。当这些选民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随着一个不断下降的给社会民主国家支付必要的税赋的意愿的出现，那么不是社会民主的野心的扩展被证明更加倔强，而是它的扩展被收缩所取代。

如果所有这一切反映了当代社会民主的困难，它也反映了为什么这一传统不能平稳存在的原因。如果一个选择是投降而且力求一个与市场自由主义最终的和谐，另一个选择则是试图探索一个理论和策略的重新定义。这在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发生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党派中是有证据的，而在一代之后的反激进化过程中同样也有证据，就像在觉醒的新修正主义中有证据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上由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所提供的社会民主的“客观”本性的个性是几乎不足够的原因。事实上，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困难越来越大。在本世纪初有一个包罗万象的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过程中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曾经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本世纪初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们也是第二国际政党和高级政治实践的领袖们；在本世纪末他们则至多是以佛龛和博学的杂志和一种退步政治实践表现出来的“职业马克思主义”（帕金的用语）的实践者。更有甚者，最近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麦克里兰曾经指出的，“当马克思以哲学开始移到经济学，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却以相反的方向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海市蜃楼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本世纪已看到了组成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这副扑克牌的全部的倒塌，这一信念的倒塌在 1989 年的大溃散的以前很久即已经发生在以其正统学说组成的体系之中。1914 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随着其后 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较早地表明，事实不会那么容易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低头。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暗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探索，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被共产主义所适应，且以一种权威化的版本在起作用。更新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西方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起源于它对于共产主义正统学说的叛逃，而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的灌入的成分在 1917 年以前没有被认识到（当“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资本论》中恩格斯后来添加的内容时），而在 1917 年以后被压制了。然而，这一智力的活动的很大部分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成长的问题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崩溃，阶级矛盾并没有增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出现。这些如何解释？更进一步，在东欧，有社会主义党国模式的问题存在，而在那些地方对

于私人所有权生产方式的放弃，明显地没有产生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不等和压制的停止。因此，这一新马克思主义将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的日益增强的模糊性搅和在一起而斗争，而这种公式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性质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而同时强调在解释资本主义有能力保持自身而不导致压制（在政治民主的条件下）的问题上强调意识形态范围的角色。

的确，现代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提供了在西方社会主义的自身郁闷的评价的学说。虽然马克思被确认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最有理论深度的理论化著作，但是在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阙如的状况下，在他考虑社会主义的未来的过程的问题上，他继续给出一个完全没有保证的结论（在此结论之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给出了科学的数据），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很多部分被生产商品的失败历史所充斥就不足为奇了。

在列宁之后，通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社会民主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所确认，这一过程（平易地说）建立在多少有些夸张的关于社会民主政治家在关于一个阶级的自己的实际利益问题上完全误导的结果之上。更加一般地是，社会民主的持久性“问题”逐渐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来对待。许多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及其类似物相结合，它们把支持霸权的过程概念化了。以某种观点来看，观察一个意识形态的束缚是如何被打碎是困难的（并且，事实上，一些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给出了这一最后的病态的判决）。

因此，像往常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够继续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大发展，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为什么不是等等问题。这种高级知识的要求继续将“马克思主义者”与其它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而他们看起来看到了他们的道学的和改革者的高傲。通俗的马克

思主义知道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社会主义革命就在下一个资本主义的拐角之处，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些人阻挡了道路）可以被排挤出大路之外的话。职业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恰好不是事实。西方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如果这一用词并不意味着一个统一的活跃和存活状态的话）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看起来在解释世界而不是在改变世界上效果更好（而改变世界，就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是更重要的）。

在面对这一使人畏惧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时，也许一剂简单思维的药是好的。毕竟，它不能真正那么令人惊讶，即西方的选民已经证实了愿意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结合而不愿意拥抱另类的社会主义（而这与社会的民主相反）。更进一步，可能这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特性无关，而与被揭示的社会主义的属性更有关系。毕竟，在20世纪，学习资本主义民主的特性的可行的其它选择性的版本曾经是可能的。西欧的选民已经可以观察那些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权被消除的社会。他们能够把这样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作比较。与本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相反，他们明白了将社会主义与政治上的暴政相结合是太可能了。他们明白共产党所宣称的，他们对于自由民主的忠诚曾经是斯大林主义的遁词。简单思想的要点是未来社会主义将明确地依靠社会主义者来劝说在资本主义民主状态下的公民的多数的能力，而在资本主义民主的状态下，公民们被提供的更多、更好，而不是更差，而且他们给出了能够真正带来他们所宣称的可能结果的证据基础。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需要给出至少一样的时间和能量来实践那个任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让人信服陈述，而不是一个更加熟悉的任务——指责、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其它选择的性质是问题之所在，因为有一些更坏的其它选择。事实上，是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其它选择的性质（一种非管理的、可分割的新自由主义形式）是当代的一种挑战。人们

将回忆起，是马克思撇开所有这些偏见，为未来的小饭馆写出菜谱——一个无目的的活动，而这是留给那些未来社会主义的厨师的有能力的手来做的事情。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者迫不及待在这个问题上从马克思那里寻求领导。这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位置，如果它曾经是可靠的话。关于社会主义有更多可说的必要，而非资本主义则没有那么多要说的必要。甚至即使人们信任食谱，他们也有权利想知道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厨房的组织，如果有可能的话，来试验它的热度。

社会主义在一方面的失败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疏忽或遗忘。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因为它是由一种特殊的分析（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而推演出来的，问题性质要严重得多。说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甚至，在一些版本中，是每一个个人的问题的根源）的论证自然地扩展到这样的一种假设，即从定义上，同样的问题将不会在社会主义状态下存在，或者在社会主义状态下不会出现重大问题。因此可以声称资本主义的结束也将意味着对于国家、权力和政治（“所谓合适的说法”）的放弃。这一理论的内容来自它的信奉者（尤其是列宁）由字面意义所理解的意思，而且完全难以置信，是一种绝对正确的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主宰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传统上就缺乏任何严格的政治理论，而政治是被看作（“实质上”）一种其它的事情。更近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相对自治性”的国家的探索也许可以被看作是扔掉这一包袱的尝试。

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中，20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多少有几分严重信任性问题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社会主义者最近以一种私人话语的形式在讲话、写作，而同时几乎见不到他们说服公众的行为了。如果曾经有一个时期，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可以不因事件的发生而发怒、感动，那么这段时间已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或者是它应该如此）。当然，那儿

留下了那些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以一种未被探索的和不能被探索的事物的答案的方式存在的。这一单词在某些时候被使用，好像它拥有一种神秘的属性，能够解决在它运作过程中的每一个问题。有一个故事讲到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工党政治家在他的第一个选举见面会上回答问题，当被问到他支持哪一种住房政策时，他应该回答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住房政策。同样，教育、医疗、经济等等也是如此。

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是不能仅仅从实践经验中学到新知识的。它将念着自信的咒语（“为使用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等等）走向自己的坟墓，而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再听信它的话了。它的社会主义概念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中保持纯洁的状态，判断这种社会主义，我们发现这种实践根本与“社会主义”的自身主旨没有关联，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在其中将发现“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导致任何与其自身原始方式相关的问题。看起来，不管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决心是以一种理论批评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一种更加实际的防守的斗争的方式出现的，都是足够的。实际上，许多社会主义者当他们从本质上是以否定、反对和防守的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明显地更加舒服。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著述甚多，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却语焉不详。他们把自己捆绑于反抗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的保护性斗争之中，而没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发展性的陈述，而这通常看起来更像从过去的角度来防守未来。

让人信任的社会主义

在世纪转换之际，萧伯纳描述了为什么由许多当代社会主义

的狂热者所持的社会主义观念事实上是一个幻想：

如果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际上交给那些把自己工作外的全部精力和所有热情都献给了“事业”的人，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不会为它尽举手之劳，并且甚至将蔑视和厌恶它，把它看作一个可悲的、庸俗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今天中产阶级的荣誉的扩展。当社会主义的任何部分，展现了自己在实际的建议中，可以由一个真正的政府所采用，并且由一个真正的执行人所运作，那么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是在这些国家里最后可以被依靠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人。

也许，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没有必要像萧伯纳的顽皮的费边主义所意味的那样庸俗和让人尊敬。也许真的没有必要与萧伯纳一起游泳或与威廉·莫理斯一起淹死。然而，萧伯纳的观点是一个真正的，并且至少在世纪末和世纪初在评价社会主义的状态的时候有同样力量的观点。实际上，在政治理论家约翰·杜恩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有趣的讨论中有一个直接的回应，即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中心的问题是意识到“最好的社会主义政府最终仅仅是一个政府”。

然而事实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历尽艰难度过了那些年代来避开认识这一点的需要。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和谐的同义词。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被认为是对政府的废除和任何形式不平等和压迫的消除。一个经济上富足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治的结束和经济的缺乏。社会主义计划的理性代替了市场的非理性。集体主义规划与生产者自我管理共存。随着新社会主义男（女）人走进以前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留下的老路，甚至人性自己也变形了。现在要点是不是社会主义者不应该相信这些东西

太多，而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应该依靠这样的信仰。例如，在伟大革命的戏剧中，经常发现新的社会主义人。奥威尔在西班牙革命中发现了他们（穿着无政府主义者的衣服）：

革命的空气仍然像我第一次认识它一样。一般的人和个别的人、农民和百万富翁，仍然以平等身份相待。每一个人都付同样的钱、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而且称呼其他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阶级，没有贫民阶级，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牧师，没有阿谀奉承，没有溜须拍马。我正呼吸着平等的空气。

然而，同样也要提起的是，奥威尔从西班牙带来的主要教训并不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这就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可以快速地和无情地被另一种社会主义——更加“真实”的一种社会主义——所摧毁。

因此要点是，社会主义者应该被看作知道他们在世界上的道路，而不应该被看作他们居住在一个完全由他们自己构造的世界中。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的困难状况当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教育过程。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仍然不得不与社会主义以前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的产品作斗争。甚至在希望在他们的社会的感情有所增长的时候，一个让人信服的社会主义将对待人像他们（或多或少）所展现的那样。社会主义将认识到，政治生活所代表的是理论和组织的永远的问题，且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同样要求认识到国家是一个集体性决定的舞台，要求认识到做出这些决定所依据的机制和程序。它将承认经济生活中的稀缺性是经常的和持续的状态，它需要根据在有限的资源上进行竞争来做出决定。它

不会夸大整体经济规划和超级理性并且会承认这样的规划既在技术上不可能也在实践上不可取。就这方面而言，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它将证明一种从政治和经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而且它不仅是从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真正经验中学习。当然，它将不会假装它是一门科学，或它可以预测未来，或它的到来不可避免的，或是它已经解开了历史之谜。

事实上，应该说社会主义者需要知道（而且被别人看到知道）不仅多而且有少的方面。至少在西方，他们需要表明不仅是他们了解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而且要表明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可行的策略和程序——在这些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势的意义上。这比它听起来要困难的多，而且只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演讲家会使它听起来容易。同样，杜恩在这一点上也说得很好：

最为严重的政治上的怀疑（关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怀疑现在牢牢地建立在这些社会的人们的经验之中，在那里，社会主义的政策无论有多少真正的成功，乃是社会主义的政府是否知道或是能否知道他们在作什么。

然而明显地他们应该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他们想使人们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相信，他们能够提供这些社会问题的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的话。更进一步，他们必须运作的环境是这样一个环境：在那里资本主义不会在一个下午或一个星期里就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是即使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将包括一个政治的过程，至少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兴起时间一样。在其中，当一个关键的要点被达到，当面临着失去它的位置和特权的时候，将可能有一个来自资本主义的最坚决的抵抗。更加切近的，这一

环境是这样一个环境：真正的选择和斗争是在不同的市场系统和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之中进行的。

因此，在这个重大而困难的意义上，社会主义者需要知道更多，如果社会主义想有一个未来的话。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尽管社会主义的可信性依赖于社会主义者对于过去知道很少而不是依赖于他们知道过去拥有什么。部分地说，这包括对于其它人真正地想要或需要的东西知道更少，更少的关于他们的“真正”的利益的知识 and 更多的关于他们表达出来的兴趣的“真正”的知识。更一般地说，它包括一种理论和历史的谦逊的输入。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声称他们了解一切事物和能解释一切事物——一种对历史的密码获得了唯一的认识为基础的宣言——好像曾经是可行的。特别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惯常的宣言，而且它有助于解释在历史确定性理论缺乏时期自己理论所受到的关注。比如，在30年代，人们普遍地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奇怪的宣称，即使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假定），人们也普遍地认为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站在了历史和进步的一边。“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施蒂芬·斯班德宣称道，“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然，这个特别的上帝失败了，但是对一些社会主义者来说，它背后的思维习惯还是难以打破的。他们仍然表现出比其他人对于历史的进程知道（或者认为他们知道）更多的样子，而这使得他们可以准确地解释一些特定的现象（像撒切尔主义）真正地“意味”或者“代表”什么——即使从外表上意味着其它的东西。这也就经常使得他们得出一些令人安慰的结论（以他们预测遥远社会趋势的特殊能力为基础），虽然对于那些未经教化的眼光来说，他们所预测的趋势不会立即出现，但是历史仍然在进行。

在过去，对于这一超级知识的宣称似乎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来源。现在则不行了，不仅因为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一超级知

识，而且因为 20 世纪给那些以在对于特殊的理论和历史的知识的占有的宣告中，以政治权力作为他们宣称的基础的人以深刻的教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通过它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提高我们对于长期社会发展的理解，而是意味着它已经将关于此种知识的合法性宣称扩展到了对于其他各种各样的知识（关于如何在实际和行动中形成趋势）的非合法性的宣称。因此，有很好的分析的基础相信战后长期的经济的繁荣的倒塌和与此相联系的工人阶级预期的毁灭将给左派提供一个重要的开端。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幅资本主义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的图画。这一分析在预期中遇到的困难是新右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上的复兴和这样的事实：在不列颠，工党应该决定这就是尝试政治自杀的适当时间。因此，与他们过去的理解相比较，社会主义者需要增加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比如对于历史的偶然、运气、无目的结果和政治技巧的理解。这需要一种特别的谦逊；他们真的需要对于许多事情保持谦逊。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因此，在 20 世纪末，社会主义不被人们认为是必然到来的、全知的或统一的了；相反，人们会问社会主义是否死了？它更加属于昨天还是属于明天？属于即将过去的千禧年还是属于新的千禧年？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带有它的 19 世纪的起源社会主义的标记，就像它在它公认的历史解密工作一样，它的自信的进步主义与社会相关，它的虚假的科学主义，和它对于在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期形成的一个转换社会的阶级的确认。在 20 世纪的总结中带有 19 世纪的知识宝囊的内容是不足为奇的。从某种观点看，这一总结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设想产生了最致命的后果，它在最

近越来越弱的独裁计划主义——作为 20 世纪事实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以及一个消极的“劳工主义”所凸显的西方工人运动——它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中踢开了传统的阶级结构的支持，组织在地方利益的防守线周围——之间陷于困境。汤姆·博特蒙写道：

“社会主义”这一用词可能是因与独裁体制相联系，与中央计划相联系，与沉迷于对技术改革的经济增长相联系而被败坏，以至于社会主义不再适合去描述 20 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目标了。

然而，仍然有理由相信发布社会主义的讣闻在西方可能还未成熟。因为目前社会主义在其主要思想中，以一种对于无管理的和无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的批评而找到了活路，那么在社会主义的切入点上就确实有实际意义（除了那样的批评：这种资本主义现在与“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伴生的）。除非对于那些传统上与之相对应的辩论而言，人们相信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显得脆弱，那么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山穷水尽了。在 20 世纪末，一种拒绝接受更多的社会义务的经济生产和市场交换方式的私有产权的系统，仍旧缺少一种正义的道德原则的支持，并且它的运作仍旧继续产生破坏性的和不平等的经济条件和分配结果，而这种情况比 19 世纪初好不了多少。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者的分析来说，它将继续是脆弱的，而且社会主义将继续是一个中心，在它周围可以形成一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其它版本的系统。穷人仍旧贫穷而不平等仍旧不平等，因为富人采取行动来保持他们的位置。因为机会只是给少数人的，许多人的机会被限制了。经济上的失败和社会的错位产生了，因为社会正义和统一性被忽视了。从全球来看，因为北半球运用它的权力来保持富

有，所以南半球更加贫穷。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仍然是无政府的和没有计划的经济体制，通过对其他人强加它的“外部性”，资本主义继续解决它的问题。社会主义曾经代表了将经济生活纳入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性的轨道的历史性尝试，而看起来只要人们继续想让他们的社会在伦理上更加令人满意而形式上更加理性，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将继续扮演这一角色。

实际上，在 20 世纪末的世界上，说不需要社会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进步威胁着产生经济和社会的结果，在其中如果由私人来决定市场，看来要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几乎不可想象的偶然性。在这一层次上的管理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努力，包括对于工作和非工作的重新定义和对于他们分配的含意的再定义，不仅是让人畏缩的而且是紧急的。可以放心地“留给市场”的建议是完全让人害怕的。西方社会的瓦解和社会弊病已经足够去解释对于提供一些真正的人类群体和人类稳固的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除此以外，在市场资本主义的私人理性和一种普遍的人类理性之间的最清晰的和最有害的意图也许是在物理的环境自身的范围之内，而在这里，一个生态社会主义可能被认为有让人惊讶的必要性。

然而事实是，在社会主义的伦理辩论和经验主义的理论面前，资本主义仍然是脆弱的，事实上在市场资本主义之上强加一个“社会”秩序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两个事实自身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前途的乐观提供基础。当然，在过去，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相信它没有提供这样的基础曾经是一个错误的让人慰藉的来源。如果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将有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在那里将社会主义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那么看起来相信这将不仅依靠资本主义继续产生伦理和物质的不满意的能力，而且将更主要地依靠社会主义来提供一个使人信服的和可靠的其它选择的能力就是明智的了。重要的

是，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防守者来说，这是一个坚决的主题，用谚语来说，就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在一个设计好的其中一个不能与另一个分离的硬性撮合中，在资本主义民主的防守中，通常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被防守了。像 G.D. 科勒在 30 年代所评论的那样，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好的一张牌。虽然只要人们一想起大多数政治上的独裁存在于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社会以及有非常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就失去它大部分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仍旧保持着作为一个有力的意识形态的足够的力量。

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者的论证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可能的，而资本主义的民主不是一种论证而是一个事实（尽管有它明显的不完美性）。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一种体制，表明它们都有可能发生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时，只有资本主义自己表明可以与民主和政治自由共存。这一证据并没有被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居民所忽略，且这一证据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满足他们已经获得东西的动机，或者至少当他们得到社会民主时为它的社会民主的版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动机。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向全世界保证社会主义是人类自由的同义词，而反社会主义者警告人们社会主义将与高压和暴政相连。声称本世纪的其他时间增强了社会的论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在事实上被社会主义对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的否定的官方声音所取代。当然，这两种声音在坚持这一否定方面有同样的兴趣，而在担心对于它的实际驳斥方面也不相上下。

所有这些所意味的是责任都在社会主义身上。用他们的话来说，如果说曾经选择社会主义是合理的，现在则不是这样。许多他们的传统的用词可以被看作在现实中获得了一种完全不真诚的位置，而且人们现在要求看见他们的钱的颜色来保证他们不是在

经营一种低下的货币。在资本主义民主中提供的社会主义的其他选择的性质因此变得最重要，而社会主义面临着一个说服公众的繁重任务。如果他们不费一些力气来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他们将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将在凸显他们的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时候遇到更多的麻烦。很明显，在世界上有许多种社会主义，并且在一种可以产生不同数量善行和恶意的意识形态的混合中，有可能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像前面的陈述力图描绘的，一直是多种形式的而不是只有一种，一直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从屋顶上喊出而不是假装那里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存在而且已经存于反对所有实践中的被认为仅仅是由一系列无关的和历史的不幸所组成的各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不仅是更加诚实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更加聪明的。

第三条道路？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论证西方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是不足够的。他们还必须能够提供一种在这些社会的公民可以被民主地说服，从而想要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必须不仅在原则上是吸引人的，而且在实践中是可信的。而这将似乎暗示许多因素：首先是一种认识，即社会主义首先（即使不是仅仅）是一种道德的理论，能够产生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且以一种和谐的公共哲学的名义加以应用。尤其是，这将包括一个社会主义者关于平等的使人信服的陈述，而这种平等真正扩大自由和自治，也会促进团结和友爱。以此为基础的一种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将自己看作一个单一的阶级的运动，或把自己简单地以阶级利益的名义加以定义，或者仅仅以

阶级的范畴定义个体，因为这将与社会主义的普遍的人道主义相违背。目前社会主义渴望代表全球的人道主义，以这一星球的20世纪末期为背景，这种渴望既不荒唐也不是没有联系的，而在其中它的利益是每一个人的利益。这不仅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且反映在近期沿着激进左派的路子和背离传统的工人运动的路子的重要运动（例如，女权运动和绿色运动）中。如果一种社会主义对于这样的发展的回应是，在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因素内尽力解释和压缩他们，幸运的是另一种类社会主义则从中学到了：有必要在一个普遍的解放运动的方向上来扩大这一因素，就像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所说，“对于工人运动来说，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使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工人运动”。

然而，一个让人信任的和吸引人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些更多的因素。它必须证明它拥有一种关于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避免计划经济的理论。它必须表明它知道如何废止资本主义对于权力和财产的集中的方式而并不因此导致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集中方式。在经济方面，这将明显包括在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一种调适，在多种企业和多种社会所有权的环境中，按照效率和消费者选择的原则，凭着对小规模经济和自我管理的偏好行事。它需要把活跃的市场和有智识的政府相结合。在政治体系内，除了普遍和有效的保证政治上的可信性、代表性和公民自由的机制以外，它将包括在一个以地区和功能转移的形式为基础的明确的多元体制下对于权力的民主方式的分割。它将意味着某些类别的权力在民族国家之外发生作用，但是其它种类的权力则在民族国家之内行使。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与普遍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相一致，以一种设计好的增强和扩大个体及群体的自治的方式，再次分配权力和财产，它将成为一个“能干”的政府。实际上，看起来普遍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客观上要求这种政策（在安德烈·戈尔兹所谓的一个“双重”社会的方向上）对社会和技术的改变做出反映越

来越可行。乌托邦从寒冷中走来。

然而乌托邦也需要注重实际。在这里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从政治书架上选取的，而是通过政治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它是一种知道它想到哪里去的社会主义，它就没有对于达到那里的幻想。社会主义当然需要好的理论，但是它们对于成功的实践也有一个紧急的需要（并且宁可更少“实践”）。思想通过例证起作用，在本世纪社会主义提供的许多例证已经对于思想给予了相当的损害。如果社会主义在不列颠最好的辩解是国家健康服务计划，那么古拉格的阴影则像一块乌云一样笼罩整个社会主义之上。在政治领域内，如果人们需要被说服社会主义提供了这一时代问题的实际的答案，那么在发展新的所有权方式和企业方式以及集体个人主义的新方式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需要更多的成功。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他们内部的生活中预先形成那种他们想带给更加广阔的社会的关系和程序，允诺友爱但是实际上自相残杀的政党（如 80 年代英国的工党）需要有一个信任性的问题。

最后，在回顾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的时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中，我们发现了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的材料。在重要的方面，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是一种少数人的传统，它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挤压在一个独裁的共产主义和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劳工主义之间，而这也是一种少数的传统。作为一种传统，它带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的特点：在实践中已经将民主加在社会主义之上，而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主义中使得自己多样化。然而，当它通过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在与社会民主接近的过程中——而且当这变得重要的时候，它也使自己显现出来。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者是那些真正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那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也是真正信奉社会民主的人。这是一个曾经绝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并不一定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一用词的更深的

维度来自于这样的事实：这里是那些曾经不仅想防守而且想扩展民主——在一个新的方向上——的社会主义者发现了一个家的地方。

在许多方面，最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集团的松散和最后的消失，作为走向更加普遍的被忽略的和少数的传统的开始——尽管它发生在最近的新自由主义的必胜的背景之中，已经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虽然这需要举双手欢迎，但在某些方面，它使得建立一种可行的和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更加困难。尤其是在不列颠，一段时期内，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工党被一个庸俗的劳工主义和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效应所桎梏，在面对重新兴起的市场自由主义时，不能发展出一种不仅是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可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在国家社会主义和不负责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仅是它的领导者而且也包括它的支持者，都需要许多政治上的技巧和对于实践的想象力。它将开始一个长途跋涉，在道路上将有许多失败和错误，也没有最后的成功和永久的胜利的保证。它将不得不依靠它的资源，在这一意义上，像 A·比万所解释的，把它描述为一种政治上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极大的误导：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如果它仅仅是中间道路，那么它将命中注定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它不可能依靠借来的活力存活。它的驱动力必须来自于它自己的原则和由它们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它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如果有机会的话，自由的人将用自由的制度解决今天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第八章 新社会主义？

有一天社会主义能够被界定为社会的主义，
我们就能从我们的历史中得到解放，而不再受
到束缚。

——托尼·布莱尔

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存在于何处呢？从现有的各类社会主义之中能否组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传统来自于何方，但是能否发见它现在去向何方？在就这些广泛的大问题提供总结性的见解之前，更仔细地观察英国的形势，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只有英国，才能很清楚地表达这样的问题；也只有英国，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才具有非常普遍的重要性。

英国的形势

这里的焦点在于英国最近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潮。“最近”一词所指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延伸至工党下台的这一段时期。那时的形势迫使政党（通常是左派政党）关心其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其结果被描述为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在20世纪

90年代早期，在工党取得其政治成就方面，“新的修正主义”起到显著的作用，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产生了具有新的意识形态的新的工党），这就促使人们给予最近的英国形势（具体地说，是指社会民主党的总体的政治成就方面的形势）以特别的关注。而人们的讨论更多地对左翼思想的发展过程（而非工党的内部发展进程）方面感到兴趣。在这里概括出的左翼思想观念的进化过程的基础上，就左翼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更广阔的世界的相互关联性方面，人们作出了许多总结性的反映。

生活在历史的荣光里

工党在1979年的竞选中遭受失败，在英国政治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此之前，在连续的15年里，除了其中的4年，工党一直执掌着政权。而从这时候起，保守党开始质疑自己的政治前途，逐渐转向右翼，并选出了新的领袖。工党在1979年的失利，及其马上产生的经济困难和工业纠纷，使之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亦复如此。这不仅导致了撒切尔夫人掌权，还带来了“撒切尔主义”（用安德鲁·盖博的常用的措词来说，“撒切尔主义”是建立于“自由经济和强力政府”之上的新右派的自由主义）。这也对工党和左派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右派开始攻击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长期为工党开展工作提供服务）。看起来这种制度好像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即已被粉碎，并在1979年与工党一起沦落下去。这就为右派的强劲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摆脱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这样的发展情况，使左派陷于相当的混乱与迷惘之中。工党给人以一副在政治上和智力上完全精疲力尽的印象，甚至假如它

赢得了 1979 年的竞选，它也不一定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其胜利成果。战后平稳的局势及其支柱——凯恩斯的特殊的福利政府，看起来已被打破，但是只有撒切尔夫人的新右派，不仅欢迎现实变化，而且作为对现实变化的回归，还为此提出了一份纲要，而工党过久地依靠自己的基础性设想，以致于当其中的大多数的基础性设想受到同样的挑战时，工党难以对此作出反应。工党也可以提高“反撒切尔主义”的标准，但是它也知道，不管怎样，右派掌握了主动权。结果就是，英国左派急需制订其智力和政治复兴的计划，但是工党的本质，又使得它的这次工作更为困难和难以预测（否则，这应该是一件较为容易和较少或然性的事情）。其中有许多因素，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一二。在本世纪 80 年代的形势里，工党被要求表明其自身到底代表什么，但是它显然对这样的要求深感意外，因此不能作出任何反响。事实上，它是否就能对自身特定的组织和理论结构作出有效的反应呢？我们甚至可以对此深表疑虑。在组织上，它是一个根植于商业协会基础之上的联合的结构，这就总使其难以制定协同和一致的政策。而制定协同一致的政策，正是以前的工党领袖的值得纪念的显著的任务。历史上的工党领袖的风格，可以用一句话来反映，那就是：“不能立刻就骑上两匹烈马的领导，是无权在这个血淋淋的政治马戏场之中工作的”。而当政党的内部构造受到各个方向的推挤时（就像在本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前期所多次发生的一样），有效的领导和果断的决策就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了。

然而，政党的理论特色也是同样重要的。英国工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是混血儿，这也反映了它是建立在商会利益和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不稳定的混和物。英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乌托邦主义（也为其中的理智的费边主义所僵化），从而被第二国际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加以蔑视（尽管，如同我们先前见到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也与英国的费边主义

大有联系)。在 1918 年，尚处于幼年期的工党，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纲领：

在公共地占有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以及能达到的管理公众和控制每一工业和服务部门的最好系统的基础上，保证让工人阶级（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得到工业的全部成果，并在他们中间进行最公平合理的分配。

然而，这种设计出来的集体主义必须与作为工党基础的实际的劳工第一主义共存一处，结果就是“劳工的直接利益”。这是在本世纪的开端，由工党代表大会（即工党的前身）提出来的。这包括不成理论体系的改善主义，和在政党政治的更广泛的世界里运用工会主义的策略。然而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组成了一把适宜的易通融的意识形态的巨伞，在此之下，所有观念（从马克思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从工党主义到基督教的乌托邦）都能找到舒适的栖身之地。它还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意识形态的线索，以便把各类信仰的崇拜者聚集到通常所说的工党的“大教堂”里面去。

这个最后的阶段意义重大。放眼于更广阔的欧洲世界，英国工党的部分特点就是其对左派的有效独裁。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政治资产，但是代价不菲，代价之一就是人们不愿参与到可能危及工党的脆弱的内在联合的理论辩论之中。这样作为工党的基础的社会主义（就像珍藏于 1918 年宪法的著名的第六条款之中一样），就如同是受到尊崇、保卫和保护的祖传圣地，而不是进行持续的理论“旅行”途中的一个憩息之所。工党对全面进行经济集体化所承担的责任，更深入地从政党的政治实践中永远地被排除了出去。这个事实，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给予许多理论关注

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是支持绝对的政治冷漠的绝妙的理由）。

在本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工党内部一大群“修正主义者”确实致力于讨论这个主题，而安东尼·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发表于 1956 年）成为这一时期的这一方面的代表性的教材，克罗斯兰坚持“需要对教义进行阐述”，是基于对现代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变化着的环境的分析之上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推翻资本主义的迫切性紧密相关。但是今天，传统的资本主义得到改良和调整，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这个极为不同的社会形式里，社会主义者现在必须关心他们自己。

当前的任务并不是以公有制替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用新方法来提高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目标（即社会质量）。然而，当党的领袖盖茨克尔试图说服工党正式拥护这个指导性的思想观念时，他不仅没能把党引入到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且还激起一场警惕将来再发生类似的观念偏移的风暴。

这样，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分离，与此相随的，还有最好在理论方面不要招惹是非的信条，因此令克罗斯兰特、盖茨克尔等修正主义者大为遗憾的是，英国工党并没有自己的巴特戈德斯堡。依靠这种理论真空状态，它过去都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指出的是，它在 1945 年和战后都执掌了政府大权），并且能够满意地进行其实际政治实践（在本世纪 60 年代，它拥护把“现代化”作为其统一的主题）。这一点，可以由哈罗德·威尔逊及其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领导的政府得以体现。在 70 年代，当工党的政治实践在当时狂暴的经济浪潮中触礁时，由于它一贯地拒绝

界定自己到底是哪一类政党，使得它在超出社会连带主义的忠诚的范围之外，无从寻找帮助。而这种社会连带主义的忠诚，使得它更加不稳定，更加受制约。

作出响应

这些背景，虽然只是简略的、概述性的，却有助于我们理解80年代英国工党的困境。这个时期，工党在野，并且在竞选中遭到多次失利。对它而言，这些都是挑战。它要开始一个修正和复兴的过程。然而它现在苦苦求索之物正是它过去刻意回避的，它需要在组织和智力上作出响应。但是所有这些，正是其未曾准备过的。

因为这两者都在讨论之中， these 问题和情况都在部分地得到解决。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也是作为对工党历史上疏于定位的一个反应）：在80年代组织和思想问题都在党内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人们倾向于用解决组织问题的方法来处理思想问题（如同工党对托洛斯基派的米利班德倾向的“参与主义”所作的反应一样）。因为其理论上的含糊其辞，工党并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用以决定何种“社会主义者”是工党“大教堂”中的合法成员。80年代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工党的鸡雏们回家栖息，而把农家院子弄得混乱不堪。

工党是无舵之党，它既没有可靠的教义“锚地”，也没有一致的组织。其社会民主主义的派别在70年代的经济风暴和紧缩政策中退缩，并遭到失败。在早些20年里实行的满怀信心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持久的福利的凯恩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保证），已经彻底地被那些难以分析的事件的压力所摧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使得所剩余的工党的社会主义问题，是分散的、混乱的，从而导致了一种智力的丧失（因此工党不能理解整个形势）。这就是即使工党赢得了 1979 年大选的胜利，它也不会知道怎么来运用这种胜利的原因所在。

因此毫不为奇的是，工党内部积极主动的各阶层，决然地转向右倾；而与此相似的是，保守党人急速转向右倾。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同意这样的说法：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失败，目前的政治形势，急需一种更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左派的反应既是组织上的，也是观念上的。他们策划要对工党的章程进行系列改革，准备以不做议会领袖（议会领袖被认为要对工党的灾难负责），来激励其中的积极分子。而“另一类”的计划和保护性的经济纲领也已经获得通过，用来取代已经失败了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工党还表态要消除核威胁。这种新论点的理论上的根据（关键性的文章，是斯图亚特·赫兰在 1975 年所著的《社会主义者的挑战》）是在 70 年代期间的一种分析中提出来的，它认为在计划的框架内占有和控制事关全局的公司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道路。当执政的工党还在苦苦挣扎时，左派的分析则获得了胜利，并在 1979 年的失利以后，成为工党全党的政见。然而这是奇特的理论混和物，它严格地集中体现于其对计划经济和所有制重要性的信念之上，还要求工人控制和实行分享民主制。这个理论混和物的本质（其自身处于紧张状态，并带着初始性的矛盾），在托尼·本（也就是这种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的混杂思想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现。

这个时期，在工党内部充斥着剧烈的骚动和宗派主义、意识形态的动荡、个人的苦痛和组织的混乱。政党内部的真空已经并且必然被左倾的信念各异的积极分子和大批行会所填满，并且以托尼·本（他参入了一个派别，并根据 1987 年的新规则当选为副党魁）作为其先锋和代言人。这是一个“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

(有其自身特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工党看上去要自我分解，甚至要引发对其长期存在可能性的疑惑。对此的定论就是：由于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工党在政治上看上去或会自杀、或是死亡。

后果无疑是直接的、严重的。1987年，一群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物从工党中脱离出来，组成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联盟，在随后的两年中在竞选上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这就分散了对于保守党的反对力量，并使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易于保持政权。新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宣称，（至少一开始）它代表一种与工党的集体主义和有机体论相反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马上为其以“社会市场”为指导的主张而削弱。一时间，看上去好像英国的左派开始要再结盟了（人们已经多次规划要进行左派再结盟，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对工党来说，环境无疑是顺利的。工党在派别斗争中已经占据了对抗法国共产党的激进分子的坚强阵地，这也为其在政治上开辟了不少处女地。看上去工党对左派的独裁有可能要被打破，而英国政治在这方面的特色也将终结。工党的组织上和观念上的双层原因，看上去似乎要使工党最终走向分裂。

这样的结果差点成为现实。工党的混乱导致了它的竞选失利的灾难，在1983年的竞选中它再次蒙羞，其支持率降低到其现代史上的最低点，只稍微领先于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的联盟。离其最近一次掌权只有短短的4年，工党就沦为三流的政党。这是一个非常醒目的政治后果，尤其考虑到在这一期间撒切尔夫人的政府长期不受欢迎。尽管其工人阶级的基础不断萎缩，但是工党还是为其核心层的愚忠的支持所挽救。工党的政治表现及其命运，类似于欧洲的其他的共产主义政党，因此它急需向外发展。1983年，它已经退到了竞选的悬崖边，一眼就可以看见下面的深渊。

一个可能出现的糟糕的前景就在眼前。工党选择追求实现另一个前途，尽管实现这个前途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其中的不少原因已在上面讨论过）。其间还有一个痛苦的再发现和再定位的长期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见不到成功的希望。事实上，直到工党在 1987 年又一次遭受了竞选失败，它才重视一直在讨论的再建设的工作问题。直到那时候，也就是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工党还一直呆在其政治地狱里。随着尼尔·金诺克成为工党的新领袖，工党开始从其 80 年代早期的废墟中脱离出来，提高了其政治表现和组织水准，但是它仍旧受到当时的政治事件的支配。与其说它在进行政治选择，不如说是在进行政治妥协，工党仍然缺少明确的政治界定和政治方向。在 1987 年工党连续第三次遭受竞选的失利之后，其领袖开始就其基本的综合的政策，进行检讨。它的政策就是企图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两大主题联系在一起，并把对市场的中心作用的理论认识和“可行的”政府的活动结合起来。这次政策反省以工党发表名为《目标与价值》的声明而宣告完成（这个声明也被认作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总声明）。其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在 80 年代的英国政治生活中，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攻势来自于右派，而左派需要对此作出反应。然而，这种反应（可以充分地工党的副党魁罗伊·哈特斯利于 1987 年所著的《选择自由》一书中得到见证）是对旧思想的一次再利用（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提高而不是削减了真正的自由这一主题上，是和新右派的主张正好相反），而不是一次力图开辟新的理论空间的努力。它也没有打算说明党的基本意图，也并不用来取代其不可指责的 1918 年所制订的纲领。

然而这种持续的修整政策的系列事件，在工党的 1989 年的年会上（此会的文件通过了要进行政策检讨）达到高潮，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政治成就。如同有个报道所言，这是工党再建设的历程。这是对工党上述历史的一次革命，也许也是给工党带来完全

不同的组织结构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很大程度上这应归功于金诺克令人生畏的政治领导艺术和勇气）。甚至，只是因为这次任务的艰巨程度和工党本质上的离心特征，有不少人竟然怀疑这种再建设的可能性。这样看来，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工党需要对其竞选困境和内部分裂作出反应，而是这种有效的反应来得太迟了。当它真的到来的时候，它不断地对组织问题和教义问题（这些问题以前也曾引起大家的关注）作出反响，并以党内的积极分子为代价，把权力下放给各个成员，用以产生有效和具有代表性的组织结构。如同先前一样，组织的、学说的和政策的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简单明确地说，在政治方面，工党已经表明其从早期的 80 年代早期的左倾主义脱离出来，并转向追求革新的中间路线。就其重要性而言，工党的政策检讨，其中包含的内容并不比其所代表的意义更为重要。运气也帮了大忙：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党人的联盟解体了，这样就给了工党一个走向中间路线的新的有利时机；而戈尔巴乔夫帮助工党从其无核防御政策的黑洞中走了出来。抛去其中的象征意义不说，工党的政策转向还反映了左派方面关于在 80 年代的形势之下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及其可能性的更为广泛的辩论。这方面的辩论，也启迪了以前所提出的许多更为重大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种新修正主义

这次辩论的基调是消极的，尽管有时候显得更为悲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先前未曾料到的，是要实现右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复兴，同时还要拒斥左派，事实上在“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专题研讨会上不断提出的深层的问题，说

到底是左派有无更久远的政治前途的问题。80年代早期的反抗旧习俗的傲气，已经消散得模糊不定。早期对于用围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轻率拥护，在20世纪末期的经济全球化（以及法国密特朗实验的失败）的今天看来，显得荒谬。但是到底应该以什么来取代它呢，对此我们尚不清楚。不顾加速失业和加剧通货膨胀，而在70年代实行的失败的公司主义，似乎标志着不能再重新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作为解决英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方法。这个时期的倾向是减少政府干预（而非加强政府干预），同时公共支出的削减的需要和来自选民的对税收的阻力，也破坏了传统的左派福利方案。许多这样的问题反过来也影响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命运，但是在英国，一方面因为其经济问题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因为英国工党特别无能，因此这些问题显得尤为严重。

然而，人们有理由对左派感到更为不安和难以把握。总的来说，真正的问题和忧虑是左派（尤其是特定的工党），是否只是一场历史的倒退运动，是否只是昨天的产物，而对明天而言，却“无可奉告”。并且不只是无可奉告而已，其基础和拥护者也呈下降趋势。早在1978年，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就有过这样的疑问：鉴于劳资双方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会运动是否不再带来历史进步。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对于工会政治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和经验教训呢？这个问题在当时激起不少争议和辩论，结果被归结到政治支持、定位和战略的更大的问题里面。一些人想要为植根于行会的传统的阶级政治学的切实可行性作辩护；而另一些人则声称“新的社会运动”为被剥夺者的五花八门的联合提供了基础；还有另一些人，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本人（据说其观点影响了工党领袖金诺克），则主张目前在战略上急需建立反对撒切尔的进步的联合。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党必须变成人民的政党。

这种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辩论，在 80 年代的左派政治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是基于更大的关于“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特征的问题之上。这个范围更大的问题，最终由《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提出。而其答案，就与左派的前途相关的范围而言，最乐观地讲，也是不可知的；最悲观地来说，是完全暗淡的、令人沮丧的。对马克思作如下的意思倒转是再合适不过了：关键并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公认为是后福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而受传统支持，基于工党运动之上的左翼政治，正处于削弱和衰败之中。有组织的大生产已经创造了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它能被左翼政党和工会运动以国家为准加以组织）。但是现在，这种事态的所有要件都为新的分解和多样化的过程所破坏。这是否就意味着新时代属于新右派呢？现代的词汇学是否要加上“新社会主义者”这个词呢？或者左派能找到与时代相宜的新的特征、纲领和政治拥护吗？

最后一个问题，为人们所广泛谈论，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这正是这时期政策修正和观念调整的基础）。人们将它归之为“新修正主义”，表明其具有有机的连贯性。事实上，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据此来确定许多重要的研究主题（例如，有人力图把社会主义从其与国家及国家主义的同一中解脱出来）。新修正主义也表现在许多方面。从概念上来讲，它表现在“许可”的政府或“授权”的政府的观念里（这个观念广为流行）。这里所说的“授权”政府，与其说它仅仅只是让个人和集团依附于政府本身，不如说它为个人及集团追求自己的利益开辟了道路，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是把个人权利和政治授权作为其中心主题，并拥护扩展个人的权利，以此来战胜右派）。事实上，左派也出现了关于公民观念的复兴，并把公民观念作为能够重新开始就英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并进一步在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领域内进行讨论的有机的概念。同样地，人们也广泛地把市民社会公认为是新政治学的关键所在。

从原来的中间路线的国家主权主义，到现在转向新的方法，其间的重要之处，可以从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处理各类政策问题的手段中反映出来。举例来说，现在较少以传统的福利国家主义（传统的福利国家主义，因为其从头到脚的官僚主义，既为左派批评，同样也为右派所抨击）的思路来讨论福利问题，而较多地以找到一种服务传送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将注重待客友好和服务质量）的思路来开展讨论。作为对于英国政府的集权本质和许多英国传统公共管理的缺陷的一个回应，人们更为普遍地强调分权。更关键的是，在思考经济和工业政策中，也出现了远离统制主义，转向更注重市场导向的途径的改变。从理论层面上来说，这是左派重新又关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在政策层面而言，这是对国有化（即使是对大多数新兴的私有工业的国有化）的全盘拒绝，也是对为数量更多的股票拥有者而设计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案的赞同。计划，原是左派传统的经济诀窍，至少从宏观经济管理这方面说来，已不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对于“供应社会主义”的强调，它注意的是结构的改善和部门的改善。

在其他领域，左派显然也拥有了新想法和新主题，80年代晚期，一个显著的，可能也是最具有持久性的重要性的的重要进展就是，经过多年的孤立与疑虑之后，英国左派终于欣然接受了欧洲。政治成为全欧的，并且远超于此，成为全球性的事务。在思考经济或环境（这个时期对于左派而言，这方面的特点也明显地增加）问题的过程中，其背景和领域是国际性的。在80年代，也出现了其他问题，其中有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及。这个问题就是对英国的民主政治的质量和英国宪法的本质的不满，这种不满，

更为撒切尔夫人年代的权威主义所激发。总的说来，英国的左派本质上总是自满的、漠然的、保守的。但是现在，左派开始开展一场政治运动（即第八十八条特许状运动），以求对英国宪法进行广泛的重新修订（其中包括一项权利法案，一份宪法性文件和进行竞选改革）。更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这结果又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所有这些都是速记似的，与其说它评述了特定的政策观点，不如说它只评述了一般性的观念思潮。然而，这两者（一般性的观念思潮与特定的政策观点）是密切相联的，如同《迎接挑战，进行变革》（这是工党的关键性的政策回顾的文件，发表于 1989 年）所明确揭露的一样。工党不仅放弃了原先被视为是竞选义务的某些政策（例如单边核裁军），而且还进行调整以适应于新的政治气候。它明确宣布欢迎市场；它力图掩盖其根植于行会基础之上的生产主义者的形象，而转而重视消费者，信奉用户至上主义；它强调要加强生产（只是关心生产还是不够的，除非你能为此赔偿损失）和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它还为其系列的宪政改良（尽管这种宪政改良，几乎成为那些激进的改革运动所主张的宪政革命）寻求支持。

所有这些，工党都用来极力将撒切尔夫人的右派描述为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并认为其与时代潮流和欧洲的主流越来越不相符，还标榜自己是新的社会和工业伙伴关系的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然而这也仍旧还是对时代所作出的含糊的反响，是反动的和守势的，只是面对敌意的环境所作出的必要的调整，而不是一个积极的自信的理论和政治复新的过程。这就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旧的模式已经停止工作，但是新的已定型的模式并没有出现。工党的政策创造是离散的，也是丰富的，是为有效地对工党进行再定位而设计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进行学说重构的更大的和更为基本的胆识。这样的政策创造，可能也就是工党所能做到的，但是这也超出了许多人要求其所做到的，然而这

也仍然使之停留于两个世界之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并且其本质和信仰这两个基本争端还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虽然与本文的内容并不直接相联，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关于左派的一般的讨论和工党内部的政策检讨进程之间的关系。工党的政策检讨过程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际事件，它离不开更大规模的辩论，并反映辩论的情况，但两者并不啻合为一。尽管某些工党人物确实就新修正主义方面写了一些文章（例如布赖恩·古尔德在1989年写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一书），工党从没有发动过任何严肃的理论争论（这一点与这个时期的别处的左派政党极为不同）。真正的争论是在别处（例如，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和《新政治家》杂志上）发生的，其中不乏成群的学者的介入（例如在费边社会之内的社会主义哲学团体，在这里再次流行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观念），同时还有诸如赞同“流行的思想阵线”的中左倾向的新闻通讯和各类非法出版物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没有来自政党的创制作用（虽然在80年代末期以那些为10年前撒切尔主义的崛起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大量右翼思想库为榜样，工党也成立了一个新的半政党的思想库——公共政策研究协会。）也许所有这些都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先前归纳过的工党的特征，或者甚至还反映了范围更广的英国的政治传统。思想是危险的事物，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如有可能，最好避开这两者。

姑且不论其过程如何，它的政治结果是惊人的。工党的政治命运，戏剧性地从其80年代早期的最低点中得到复活，而与此同时，思想氛围也变得对左派更为有利。在80年代的许多年份里，尽管在政治上撒切尔主义占了优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调查研究始终显示出英国民众对集体主义价值的强烈的喜爱之情。当80年代走向90年代之际，这些集体主义的价值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也可能反映出人们不再迷信于纯粹的市场的解决办法，而更关心公共服务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建议要以“我

为大家”的年代来取代这个“人人为我”的年代。工党现在拥有了其新的政策和新的形象，它无疑是时代发展的十足的受益者。尽管要想获得政权的转移需要比 1945 年之后的任何时代更大的竞选胜利，但是当 1992 年竞选开始时，工党看上去有可能重新赢得胜利，组织政府。

然而，对于工党的复兴，人们还是深怀疑虑。一个被人连续提及的问题（第一次是由一位主要的政治评论家提出来的），就是工党是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它的注重实际的修正主义足够应付时局了吗？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但是对于左派来说，其中是否有一个能让其在创制混杂的政策中保持前后连贯性，并让其确定它的当代个性的新思想呢？工党是在忙于进行其基本意识形态的更新，还是只是对其战术上的政策进行调整呢？它是转向于激进，还是趋向于保守呢？当舆论的潮流看上去已经开始往公有社会的方向急速转进时，工党是否无论如何还是沿着个人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呢？在 90 年代初，这些都是摆在工党的案头上亟待回答的问题。然而，与几年前提出来的关于工党的自身生存与其思想的前途相关的那些问题相比，这些问题又是与之大相径庭的。

人们都一直相信工党能够成功，直到工党在 1992 年连续第 4 次遭受竞选的失利。这样它就被迫回到其政治图板进行重新设计。现在，在那些信奉对政策和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实用主义的调整就能最终恢复其竞选好运的人群，和那些信奉对其基本定位和信念进行调整已经刻不容缓的人群之间，引发了一场大论战。1994 年托尼·布莱尔当选为工党领袖，和随即而来的约翰·史密斯的突然逝去，确保了工党接受后一人群的路线方针。这个任务正堪与建立一个新政党相提并论，而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在 1995 年，工党用其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的新声明，取代了其陈旧的第四条款。这也意味着，工党终于拥有了自己的

巴特戈德斯堡了。并且，现在思想论战不但是重要的，而且它还
为工党上层所驱动。布莱尔式的革命，是将社会主义改造为“社
会的主义”，并且建构了一种自由的公有社会主义。这种公有社
会主义，基于左中路线的广泛的智力遗产之上，在早先一代的被
称为修正主义的滑铁卢的地方获得了成功。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
标，通过直接而又明确的理论重构的过程（而非通过逃避或糊弄
的方式），已经得到解决。无论怎么说，它对于英国左派而言，
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和意义明确的
时刻（当然，对于流传日广的社会主义而言，这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要对上述事情暂时下个结论的话，那就是英国工党最终
变成了一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在本世纪 80 年代之初，
看上去英国工党与其他的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没有两样，并且都
经受了同样的政治命运。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组织上，现在英
国工党都已经决定了其要成为何种政党，并且已经开始转变成为
这样的政党了。它再造自身的能力，将取决于它能否在其旧时的
战后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与其近来反对革命的新自由主义
的失败之间构筑新的政治空间。总体上来说，它的前途和命运，
就是欧洲的民主主义的左派的前途和命运。

通往新社会主义

但是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究竟是什么呢？当社会民主主义到处
处于危机、陷入混乱之时，英国的工党是否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
方向进行了更新？在这样不适宜的环境里，是否真的能从如此毫
无希望的题材之中，塑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对此简捷的回答
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冗长一点的回答就是：我们如果不去尝试

一下，那才是荒谬可笑的。随之而来的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要尝试简略地解释一下其中的理由而已。

我们现在何处

在为旧的理论包袱所提供的虚假的乐观主义之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益之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它认为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的市场更为有效的组织生产的一般方式），已经名存实亡了；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它们认为信仰不一的社会主义者们已经破解了历史发展的密码，并且发现了社会动力学的规律）也已经过时了。同样过时的还有社会主义与在其传统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媒介之间存在着假设性的联系的学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如此众多的理论观点都已过时，那么社会主义还真的遗留下一点实质性的内容吗？社会主义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内容，对社会主义而言，都是最本质的东西（即使许多社会主义者全神贯注于那些非本质之物，从而总是认识不到这一点）。至于它所遗留下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是有关社团和共同责任的道德伦理，是详尽地思考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当的方法。当然还有别的思考这些事物的方法，但是只有它才是社会主义者的方法。根据政治是道德抉择的场所的说法，社会主义者相信：来自于他们的抉择的社会结果肯定优于来自于其他的抉择的社会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轻易地依恋于一本政策手册，也并不就是说那些从属于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的价值全无效果，也并非认为社会主义与那些与它有着共同的承继关系的传统习俗可以完全分离。它所意味的是，一种对于这样的问题（社会是什么；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协作的意图，能够实现什么）的独特的看法。

所有这些，看上去都好像与现实环境（就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社会主义者现在找到了他们自己）毫不相关似的。如果说20世纪已经让我们见证了一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看上去社会主义已经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甚至对于那些希望见到相反结局的人，例如熊彼特和哈耶克来说，事实好像就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法国的社会主义领袖莱昂·布卢姆发表了一条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抵达其胜利的时刻。他是这么说的：

社会主义者的设想和公理，为那些已经进行了极为残暴的反对社会主义组织的战争的人们和政党（这时候不管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所普遍接受；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各类社会团体在各地都建立了起来。

然而现在我们正处于另一个世纪之末。显而易见，两者的必胜信念是迥然不同的。战斗看上去终于就要结束了，资本主义原则取得了胜利。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方案已经失灵，而自由市场主义再次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的唯一有效的替代物的统制经济，却分崩离析了。那种替代物（即管制经济）的本质，使那些从中得到解放的人们，都把“社会”这个词当作是一个值得深刻怀疑的术语。希拉里·温赖特曾经在“天鹅绒”革命之后遇到了一位年青的捷克活跃分子。当他们谈到社会主义这个话题时，她被如此告知说：社会主义的毒害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在我们的谈写之中，这个词语都起着一种障碍物的作用”；并且这种毒害已经影响到社会主义者的理解力，他们甚至不合情理地把工程设在远离资源之外。

这就是这场（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终结主义”发生时的背景。这场“终结主义”也刻划出在社会思想领域内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的特征。如果说这种分析是特别有道理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是明显地不充分的。部分是因为它落入了其所涉及的最古老的理论覆辙，就像欧文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它总是相信未来只是能在现时找到的趋势的扩展而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趋势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和非常有争议的，它们并非就是简单的胜利的保证。不管是那些被确认为胜利者，还是那些被确认为征服者，关于他们的本质是什么，都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那些提倡市场的右派的新自由主义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士，当然可以宣称这是他们的胜利。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坚持的那种资本主义并没有投入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去。大卫·马昆德就令人满意地阐明了这一点：

这是战后长期繁荣的资本主义，是倡导共同决定和计划总引导的资本主义，是倡导带薪假日，使劳务市场供不应求和提高福利开支来赢得生活在东欧体制之下的民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大萧条时期的那种资本主义。如果竞争是在赫伯特·胡佛和管制经济之间展开的话，那么管制经济可能就已经取得胜利了。

但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于那种改良了的资本主义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为自身提供了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进行历史和解的基础（这种和解是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愿意接受的）。事实上，早先宣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声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来的。如果说许多社会主义者竟然会愚蠢到不明白作出如此的和解是值得的，就如同说那些市场的必胜主义者竟然会

愚蠢到要终止他们自己的早已获得的各式各样的胜利一样。

至于后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要点需要提及。当共产主义遭到遗弃时，那些被信奉的，不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未得到重新建构的资本主义，而是可以分享其机会的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本世纪后半期的西方社会的标志）。正如 J.K. 加尔布雷思所说的：

那些花言巧语地谈论（即使是无意识地）要回归史密斯自由市场的人，非常错误地主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空白状态。但是这并非就是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们所拥有、愿容忍并能保存的事物。我们所拥有的是温馨的受政府保护的政府；对于东欧人和我们来说，纯粹的和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都是同样不受欢迎的。

这些国家的第一次自由竞选就是一次对于共产主义的全民投票。而接下来的竞选已经充分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他们的优先选择对象（即共产主义）进行盖棺论定为时尚早。

本书早已对现有的各类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过考察（当然资本主义也有不同种类）。与以前相比，现在更显而易见的是：选择并不是在系统性的比较方案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种类的调解方案之中进行取舍的。对于许多人而言，与社会主义的繁荣时期相比，这看上去显得更没有英雄气概，因此更不令人称道。在 50 年或 100 年之后，今天许多乌托邦的设想也许都变成可以得以具体实现的和亟待实现的主张，那时候甚至不会再出现选择本身到底代表着什么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就是我们的选择，而我们的选择是一个困难的选择，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们用其轻松的浮夸的救世主义进行自我安慰时更为困难，并且要求具备高度有序的原则和智力。这种原则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作一明确的界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变为工党的重要任务的缘由），而智力方面则要求把这些价值照现在的样子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者必须始终既是“原教旨主义者”，又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将不变的价值和怎样使这些价值在尘世中得到收益的常变的见识结合起来。用瑞典社会主义者的措词来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类似于一种‘有前提的乌托邦’”。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在争论中的调和方案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了公私企业领域内的有限的混合经济的范围（原先的问题就是在此范围内构建的）。这是在如下的一种背景之下被提出来的：市场要求得到更多，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传统支持却大大地受到了侵蚀。早先一代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争辩说：陈腐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应被倡导财政再分配和新的社会政策的社会主义所取代。但与此同时，更新的社会主义却意外地碰到了来自这个更加分化的社会的阻力，以致于甚至都不敢确信旧的修正主义的工具能否再起作用。很明显，我们需要一种新思想。但是到底是哪种新思想？是否存在着要进行新的政治调解的基础？只要稍微探讨一下少量登录在册的思想，我们就依然可以概括出总的前进的方向。

自由的社会主义

自由的社会主义也包括了对于政府和市场进行条理清楚的思考。如果社会主义者（及其关心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人士）要从20世纪的经历中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不论政府还是市场都有缺陷，因此也有必要对这两者都要加以注意。市场具有动力学的优点，这也使它成为最便利的组织经济生活的方法。市

场在有些地方是行不通的，但是有时候它却要到那里去起作用，而它对其运作的后果都有一种固有的和不负责的无能为力；并且它还经常不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政府正好代表了公共利益）。但是市场也能发展自身的私人利益（生产者俘虏并非只是右派所发明的一种说法而已，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从僵硬的官僚主义到粗俗的暴虐主义，在这些领域里都可以见到注重市场作用的倾向。市场同时需要一套装置使其始终照章行事，不出纰漏。左派对市场的批评是绝对必要的，而右派对政府的批评也是同样必要的。并且，如同迈克尔·沃尔泽所辩称的，当政府和市场侵人不属于它们自己的地域时，两者都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方式。这样在公共利益的领域内，政府与市场都需要加以管理。

这就要求在政府的效果和组织方面，社会主义者要投入比其以前所通常显示出来的更多的关注。举例来说，我们满可以期盼，那些最热心于公共服务供应的人们，也应该就是那些在确保这些供应能够产生有效的功绩和成果方面有着无穷的智慧的那些人。然而事实经常与此相反。不过如果选民都被说服认为公共供应是值得他们为之掏腰包的话，将来的情况肯定会变得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这样，我们也要为涉足于和受控于公共服务的用户提供一套新机制。此外，这些都有可能需要这样的一种环境：在这里政府与市场、公众和私人，都不是生活在其各自独立的范围内，而是承继了一套与混合经济的传统模式极为不同的混合和竞争的政策体系。这也就意含了明智的政府和理智的市场。市场机制在某些政府活动的领域内可能是有用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一想起市场只是一个有用的仆人，但是也是一个糟糕的主人就够了）；而政府在促使市场更有效地工作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东亚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里，有时候这类事情极富有戏剧性）。就英国而言，威尔·赫顿近来还不得不证明一个明智的政

府在医治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方面极有作用。在社会主义（注重政府的作用）与资本主义（注重市场的作用）的相互碰撞之处，我们现在可以开辟最有吸引力的政治领域。

这就是可以想象的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的基础所在。因为它力图把市场经济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所以也有人愿意将它评述为是一种“社会市场”的观点。然而这个术语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将定语和名词放在了错误的次序上。市场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只有那些拒绝或已经忘却公共目的的观念的人士，才会接受这样的倒置。这样的倒置，就如同以构筑大教堂的石头的数量来评述这座大教堂似的，显得非常的荒谬可笑。而“市场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公有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至少其语序是正确的。然而自由社会主义这个术语，虽然其词源更为古老，但是却最为得体地表达了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恰到好处地将规定和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先进的政治生活的传统结合起来，它也使社会主义能成为一种社团和责任的学说（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还得能够让人自由地联想到傲慢自负的政府的危险性和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个人的重要性），在其融合政府与市场、公众与私人、公共目的与个人目的的过程中，它开启了一个完整的政治议程。

自由社会主义为一种新型的集体主义（这种新型的集体主义，将为社会目的而进行的集体行为的观念从其原先等同的旧的国家主义之中拯救了出来）提供了基础。不管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都要被重新设计，以加强社会责任和发展积极的委托保管关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能够滋生出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如果旧的公用事业公司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设立的，那么它们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公共利益公司。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都需要与一种关注公正和社会整合、而又能容忍多样化和差异的统包的原则相结合。集体的个人主

义，是以能够想象的方式来运用公共政策，以使个人实现自己的目的。权利延展了，但是责任也同样扩大了。用户的民主精神滋生了，但是公民的民主精神也同样滋长了。由于采用了一种丰富的社交生活的多元论，政府与政府之间，互不相干的个人之间，都极大地被疏远了。民主精神向上发展，从而满足了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主义的需要；它同样也往下和向旁边发展，这样就又支持了一种新的地方主义和社交主义。旧的集体主义或许已经死去，但是新的集体主义尚未诞生。

这也并不意味着新的集体主义就会诞生。未来是尚未被认识的，也是不可认知的。它有可能比现在更美好，或者更糟糕，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政治能否提供一个渠道，以使迷茫的公民们能借此在公共目的方面作出集体选择，并找到能使他们在漫长岁月里渡过难关的活力。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集体的民主主义的选择自由的整个事业已经遭到新右派的权利论的蔑视。只有市场，才能够制订出选择方案（整整一代人都是被如此告知的）；而政府的地位则被降低到如此的地步：它只是保持一个使市场选择能够运作的外界环境而已（也许它还有一个勉强的额外的作用，即提供某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这种关于选择的观点，能够轻易地遮盖权力的真实本义。现在的问题就是，公民通过民主政治所作出的民主选择，是否是以市场的名义决定选择的权力的对手。伪装之下，市场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机制而已。但是揭去其可怕的伪装，它其实是权力和利益的载体。作为选择方式的民主理论经常为那些主张作为选择方式的市场理论的人士所贬低，这是毫不令人惊奇的：因为正是前者，才是后者的独一无二的挑战者。

超越市场的个人主义

如果自由的社会主义需要旧的集体主义转变成为新的集体主义（这个需要并未得到满足，这对于近来的社会民主政治所产生的问题而言，干系极大），其中一个非常紧要的前提就是：当代的市场个人主义的暴政应当终结。直到这个前提实现之前，我们是完全不能在学理上与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当然已经有证据显示，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即终结市场个人主义的暴政）。这个时代，新的社团理论比具有占有欲的令人生厌的正统的个人主义更具有说服力。而西方社会破败不堪的局势更需要一种安全和团结的新政治。层层断裂着的社会需要围绕公共目标而进行有原则的重建，而不是为在粗心大意的市场之下发生的分化而进行庆祝。

在知识界中发生的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告知我们相似的情况。公有社会主义，不论高级形态还是低级形态，基本上变成为只是一种理论。福山以其对社会信用的新基础的独特的研究，成功地发现了他的著名的历史目的。新保守主义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现在用一些记忆中的民主的外衣，不顾一切地来掩饰其外强中干。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甚至在其最近的后共产主义的市场声明中（在这里他号召锐减公共开支，以此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具体表达了一种对于政治健康的警告。这种警告就是“集体主义到处都遭到失败，这导致了一种错误的看法：政府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而市场却能做任何事情。”当这种错误的看法成为时代的传统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现在唯一所做的事情也许就是从这样的时代枷锁中解脱出来。重要的是，我们要完全理解其中的主要谬误。如果政府和市场要进行新的综合，其条件和基础都

是不容置疑的。

在早先讨论过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新的市场理论信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两者都必然地用不可抗拒的运动规律的词语来自负地描述其信念。这方面，关涉到社会主义的那部分，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所作的“科学的”镜像。它征用历史为其服务，并把市场全球化作为一种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是人类、政府和社会都无力抗拒的），这就使之成为测量有意识的公共活动被贬值的程度的工具（如果能以这个方式来进行思考的话）。在列宁主义的干部（他们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给那些不能独自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和资本主义的休克治疗学家（他们的任务就是用永远不变的市场法则来引导后马克思主义的中东欧社会）之间，可以发现更进一步的相似性。这本来就并不是什么咄咄怪事。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新右派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声称已经取得了理论上的胜利。事实上，包括政府少做些和市场多做些在内的理论方案，都是极为直截易懂的。在政治上这些方案也许是很难实现的（这可从1979年之后英国的经历中得到见证。那时候作为征税者和挥霍者的政府，将其活动扩张到那些按理来说应该紧缩其活动的领域）；但是在理论上，这并非难以理解。为了追求一个思想上的目标而出卖公共产业（尤其是当公有的垄断公司要简单地转变为私有公司时），削减税收、节省支出和减少服务，就都是一个充满政治阻碍和危险的规划；但是它不是大学者所作出来的规划。这样的规划，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和破坏性的。这是一个摧毁性的使命，而非建设性的方案，它需要的只是一种与过去的某类社会主义者相配的严格的教条主义的处置，而对其所要试图达成的后果却漠不关心。当出现未能实现原定计划的后果时，这又被解释为需要在同样的方向上投入更艰辛的努力，而并

非是应该对计划本身的“资格凭证”进行审核。

这种计划本身的“资格凭证”，其实是伪造的。这也就是在新政治学创立之前，我们必须中止对市场个人主义的盲从的坚持。就像甚至连明智的保守主义者都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只是空泛的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的笼统的说明；事实上，借助市场扩张主义的毫无约束的力量，它颠覆了成功的市场社会所赖以安身立命的社区和法理基础。借用约翰·格雷的话来说，“传统生活形式的不受限制的市场制度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它能使得主张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处于经常性的动荡状态之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使之成为自行破坏的政治方案。”因此，毫不令人惊奇的是，随着这种新的自由的保守主义在传统和保守领域的撤离，那些重视公共生活的状态的社会主义者便会乘虚而入。他们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并且具有各自的关于公共生活状态到底是什么的观点。但是他们与保守主义者一样懂得：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不能建立在主张不受管制的市场的教条主义的政治学所纵容的不安全和混乱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自由社会主义的政治学既不是一种旧的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新的市场主义。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它都将是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和生动活泼的。它还将是极力主张平等主义的，是要求能够包容整个社会的，因此每个公民都能进行相互接触。但是它不能被混淆为是预先规定的处理方式或预先的规定本身。它把对有活力的经济的信念和高雅的社会信念结合起来（我们满可以相信，甚至可以在口头上断言，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前提；但是论其真实本义，它还是应该包括这两者）。我们知道，自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就是使得资本主义工作得更有成效；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资本主义本身就有不同的种类。我们会明白市场的优点，但是我们会明白市场的罪恶；我们会认识到政府能做太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识到政府能做的事情实在太

少；我们承认高雅的社会缴纳适当的税款，但是也同样承认在某件事物上花费得多也就同时意味着在另外的事物上花费得少了。我们欢迎多样性，但是也要努力培养社会的统一性。在拒绝一系列的虚假的对手的同时，也要为自由社会主义的新政治学在探索明智的政府能够如何运作这方面发挥无穷的创造力开辟了空间。旧的集体主义者和新的市场主义者都不是这样的，但是这又要另当别论了。如果它进而为流行的新全球主义者（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所反对，认为单一国家的观念现在是不重要的，那么对此所作的部分答复至少是：这里所描述的一切都植根于最好的欧洲传统（社会民主的传统，也是基督教民主的传统）之中。而这对于更宽泛的方案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至于这个答复的另外部分，我们将在别处谈论。

社会主义的关联

到此为止，关于修正主义者，我们就谈这么多。但是其中还需要一种充实的社会主义的基要主义。如果自由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一种为不同的传统所丰富的新的综合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对自由社会主义所起到的醒目的促成作用，是不应当被略而不论的。这就又要回到对于社会主义的作为社会伦理和公共责任的本质的讨论，和现在对此道德规范的社会实用性的讨论。这就意味着（最简单地说），我们都共同生活于同一社会里；而社会是不应被认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践上）只是简单地由互不相干的个人组成的大漩涡而已，而应把它视为嵌入浓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之网，从而能够表达公共意志的社会。这里并没有铁板一块的、压抑忧郁的和令人怀旧的事物，意图、道德和社会都是非常多元的。这只是一个人们能够进行自由协商并将共识自由地转化

为公共政策的环境而已（而当我们在个人目标与更广泛的公共目标之间找到一致之处时，这样的政策总会最有效用）。与那种总是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他者之上的旧的集体主义（当然共产主义尤为如此）和将个人从他们的社会环境中抽取出来，并否认除了个人目标之外还有其他目标的存在市场哲学相比，这种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每一次当甚至连公共目标的观念和有目的的公共行为的观念，都遭到如此的贬低和诋毁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因而将之收回和重新起用。公民能够运用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政治的资源（这种资源能够和应当进一步的得到发展），来确定他们的公共目标。许多人（不论贤愚）都建议说：公共利益能够和应当通过民主政治的活动，从来自于各个方面涉及各个问题具体的和冲突性的利益中建构出来。而这个任务，应当被视为是政治职责的核心工作。如果那些古老的和显见的真理被市场个人主义的失控的机车推移到政治的岔道上去了，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它们。通过大量的先前评述过的方法，我们就能够恰到好处地实现我们的公共目标。但是不应把在这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公有和私有之间）所进行的改革，混淆成是对公共目标自身观念的不正当的驳斥。

还有另外一些旧的集中于社会主义伦理的真理，迫切需要得到恢复和重新阐述。相信政府干预必定会增进自由，与相信政府干预必定会降低自由，两者同样都是荒唐可笑的。如果说许多社会主义者必须抛弃第一个信条的话，那么市场自由的倡导者现在必须去除第二个错误的信条。为 20 世纪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所广泛摧毁的旧的自由信条，而在这个世纪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的后半叶却重新获得了生命，这是令人惊奇的。一种荒谬的观念就是：大多数人更自由了，以致于政府从他们的生活领域中撤退出来。而这个观念却被那些应当知道得更好的人士庄严地提了出来。如果取代政府的社会能够阻止环境污染，或保证病人得到护

理，那么上述这些真理就是对于自由的可以论证的收益，而非损失。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政府扩展其职能就必然是自由的收益。否定与之相反的观点，也是荒谬可笑的，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这种相反的观点，已经代表了眼前的危险。

这里还应谈论另一个古老的社会主义的真理。它认为对于其中之一社会信条来说，就是要理解：我们的个人目标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得到实现。只要剥去集体主义的陈腐的政府主义伴随物，这就应该成为集体主义的核心。我们最紧迫的许多个人利益（诸如街区安全、空气清洁、工作培训、子女教育、父母保健和其余大量的事情），只能够通过和他人的集体供应才能实现，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独立提供的。这并不是说政府必须成为独一无二的供给者，也不是说混合的供给经济是不适宜的，也不是说政府不应以新的方法进行运转；它所意指的是，政府是这些服务的必不可少的（经常也是最有效率的）供给者。这样的集体供给，对个人而言，是很有意义的。社会主义能使我们取得个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因此集体个人主义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习语，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对立，被证明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幻想而已。这部分是因为它省略了所有政府和个人之间的一切，而正是这些，才使得世界能够平安运转，并构成了权力和利益、集团和社团的整个重量。而这些对于政府和个人而言，都是同样重要的；而市场正是这样的权力和利益的承载者。如果说需要对作为社会的官方独裁的合法的力量政府的公共权力，进行非常警惕的监视的话，那么对非官方领域的私人权力来说，也要如此。有时候这必须从其本身来进行监控，而有时候则需要从我们自身这方面来进行监控。具有个人理智（诸如用污染河流、在培训中搭便车或优行考虑短期回报而忽视长期投资等方式，来将其外在不经济性倾注于他者之上）的市场行为者，可能在公共

(经常也在私人) 方面是非常不理智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个人，当其从政府的公共权力之中解放出来时，并不随之就习惯于纯粹自我管理的王国，而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各类私人权力都起支配作用的世界里。事实上，从其整个范围来说，私人权力排除公共权力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连其提出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意图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了。这种从集体行动中的退却，反过来驱使许多人士（不是通过自主选择的作用，而是通过需求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力图找到对于公共问题的私人解决方法。布赖恩·巴里就令人满意地描述了那个非选择的过程：

公共健康服务不是候诊者排起长龙，医疗器械严重不足吗？去买个人医疗保险。公共交通不是拥挤不堪吗？那就为每个超过驾驶年龄的家庭成员买一辆汽车。公寓不是建在乡下，没有可以用来跑步的人行道吗？那么就去买些精心设计的运动器材，就在家里进行锻炼吧。空气不是无法令人忍受吗？赶紧买台空气过滤器，并且呆在户内。自来水闻起来有点发臭，是不是充满了致癌物质？买瓶装的饮用水吧。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知道，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早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而我这里所做的，只是评述了一些南加州的情况，简单地进行了一下评述而已。

个人自由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当人们认为这与集体行为和公共目标并不矛盾时，他们就误解中间的关系了。而自由社会主义者就知道，后者经常是前者的一个条件。

但是社团和共同责任（也即是自由社会主义）也包含了道德

选择在内。它不只是确认了社团这个事实而已，还确认了其道德责任。对此有人可能并不敢相信。占有的个人主义也是一种道德选择；它也不乏其现代实践者。我们也许会认为社会只是一个虚构：我们并不一起生活于其中，我们也并非是我们兄弟们的监护人，我们并不被植入于共同责任的社会之网中，我们也没有超出与直接与私人相关的和即时选择的责任，如此等等。从最拙劣庸俗的到最精巧复杂的，找到大量的学说来帮助支持这样的否定性的提议，这并不困难。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选择，而社会主义已经提供了一类选择方案，就此而言，它代表的是有体系的关于责任的选择方案。

如果说社会主义传统上正确无误地伴随着服务于穷人和弱者的社会责任感的话，这就是其原因之所在。对社会包容物所承担的义务在共同责任的政治学中居有持久的中心地位，然而这还只能被正当地视为对一个负责的社会是什么的一个表述而已；它还与更广泛的私人责任与组织责任社会化的事业相联系。从工作到福利、从地位到财富、从养育到生产，这些责任与自由一样重要。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关于权利的学说，那么自由社会主义就是将权利与责任等同视之的学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混乱不安的时代的陈腐过时的老生之谈而已，它还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视角。它与政府责任相联系，并竭尽全力为所有公民提供机会，和对这些机会作出反响的个人责任、集团责任和组织责任。这是在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一种共同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它并不是如新右派所认为的，政府仅仅在公众责任方面训诫公众；也不是像旧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人民只是向政府要求他们的权利。它还要求我们在对穷人和无权阶层的道德职责作自由的解说的同时，更多地要对富人和权势阶层的社会义务进行艰苦的阐述。这两者应该更好地统一起来。这些就是它所意指的所有内容。

负责任的社会

同样清晰明了的是，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作为社会责任和共同责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轻松的选择方案，在其之上并没有什么舒适的支撑物（而过去的社会主义，经常依赖于这种支撑物之上）。虽然它必须依赖于纯属于自己的道德、智力和政治资源，但是它毕竟说出了它不得不讲述的最重要的事情。负责的社会确立了生活于同一社会之中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也确定了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它给予了权利，但是也要求义务；它还提供股权，但是坚持股权持有者要具备责任感；它也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新的占有机制和控制机制，力图扩展能够积极履行责任的方法。它至少提供了基础，以使我们能履行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挑战性的责任（即关心和维护自然环境）。这个方案的形状（如果说其细节还难以确定的话），开始从其哲学根基中成长了起来。

但是要想实现负责的社会并没有任何成功保证，环境看起来也并不顺利。对此 R.H. 托尼坚持认为：当人民和社会能够自由地在他们想要怎样生活方面作出选择的话（至于是否真的会进行这样的选择，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他们唯一不能自由去做的事情就是去逃避这样选择的后果。一个否定社团和责任的社会，将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后果。只要市场个人主义这样行事（即否定了社团和责任），只要这种否定变成了公共政策，那么随之而来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了。如果把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社会内含的和社会安全的契约被随意打破了，那么社会不公就会加剧，分歧就会扩大，我们也就应对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破碎，更加分裂而感到惊奇不已。对于

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吊桥社会，在这里人们随意采用私人保护措施以防止公共领域的危险和恶化，就像可以随时拉上吊桥来制止外来侵害一样。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本身表现的是在商业区内的娱乐愉悦和商业区外的强烈的不安全感之间的剧烈对比。新自由的承诺开始显得像是一种新的服务态度的承诺；而一种关于满意的精神文明却令人非同寻常地感到不满。

问题在于：我们（无论是个人的、集体的、当地的、全国的还是国际的）有无愿望、方法和资源来进行一次公民复兴的规划。只有傻子才会感到乐观得用巧言令色来进行掩饰，或悲观得听天由命。这里面有许多为我们所不知道或不理解的地方。在一个极其变化无常的世界里，一个具有钢铁般的确定性的旧政治学是明显地过时了。新政治学是开放的和多元化的，并注重政治学习。它认为政治学习不只是新政治学本身的要求，而且还是这个时代的政治学的需求。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可预见的未来，急需发展一种非常新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已经很紧迫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它还需要非常新的社会报导形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组织经济生活的最见效的方式，然而也是最需要精心设计的方式。而我们的前途则依赖于强劲运作的经济，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通向地狱之路。我们以为我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思考的方式，甚至我们所使用过的类目，在其历史变得过于古老之前，还需要进行彻底的修正。

这样，这种社会主义现在最终要被置于何处呢？一方面，它需要所有的现代化推力，用以能够学到其过去的经验教训，并全面发展其技能，这样它就能够现在所处的环境里将经济活力与社会礼仪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修正主义的需要使得搞清楚社团责任和共同责任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变得更加迫切。在接下来的动荡的岁月里，如果社会主义想要成为受人激赏的现象的话，上述两者都是其所必需的。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显然是崭新的，但

是同时它又明显是旧式的。当一个世纪之前人民努力为找到一个他们能在其中感受到他们自己的环境时，作为对此的一种反应，旧的集体主义就产生了。而为自由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所描述的新集体主义，至少有能力使一个负责的社会能够应付其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许多先前所讨论过的另外的社会主义。它的特征是：它将其命运放在自由公民的主动选择之上，而非阶级与需求规律的命运之上。在威廉·莫里斯辞世一个世纪之后，重温他对此所作的相关描述是非常有益的。他说：

人们进行战斗，人们又输掉战斗；他们尽管失利了，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却会继续进行下去。当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时，人们最终发现这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要的；而别人则又要在另外的名义之下为他们所意欲的事业而奋斗。

参 考 文 献

社会主义的和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献浩如烟海。因此，我选出下列文献，有两个目的：首先，使读者能够了解在此只是简单一瞥所涉及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其次，列出最近关于社会主义及其 20 世纪末期情况文献中需要精读的书目。

Anderson, P., 《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Anderson, P., 《在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上》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Avineri, S.,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Avineri, S. (ed.), 《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 *Varieties of Marxis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

Bahro, R., 《东欧的可取之道》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

Bahro, R., 《社会主义与幸存者》 *Socialism and Survival* (London: Heretic, 1982) .

Barry, B., “社会主义的持续关联性”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socialism*, in R. Skidelsky (ed.), 《撒切尔主义》 *Thatcher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8) .

Bauman , Z., 《社会主义：活跃的乌托邦》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Allen & Unwin, 1976) .

Beilharz , P., 《工党的乌托邦：布尔什维主义、费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Labour's Utopias: Bolshevism, Fabia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1) .

Berki, R. N., 《社会主义》 *Socialism* (London: Dent, 1975) .

Bernstein, E., 《社会主义进化论》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Schocken, 1961) .

Bevan, A., 《恐惧代替》 *In Place of Fear* (London: Quartet, 1978) .

Blackburn, R. (ed.), 《革命与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读本》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 (London: Fontana, 1977) .

Bobbio, N. 《何种社会主义?》 *Which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1988) .

Boswell, J., 《社区与经济》 *Community and the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0) .

Bottomore, T.,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Brighton: Wheatsheaf, 1984) .

Brown, B. E. (ed.), 《欧洲共产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 *Eurocommunism and Eurosocialism* (New York: Cyrco, 1979) .

Brown, G. and Wright, T. (eds) 《价值、幻想与呼声：社会主义名言选》 *Values, Visions and Voices: An Anthology of Socialism* (Edinburgh: Mainstream, 1995) .

Carrillo , S.,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

Carver, T.,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Marx's Social Theory* (Ox-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Caute, D., 《1789 年以来的欧洲左翼》 *The Left in Europe Since 1789*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

Cohen, S. F., 《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Cole, G. D. H., 《工业中的自治》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London: Bell, 1917) .

Cole, G. D. H., 《社会主义思想史》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5 vols, 1953 - 60) .

Crick, B., 《为政治辩护》 *In Defence of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2nd edn, 1982) .

Crosland, C. A. R., 《社会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Cape, 1956) .

Crouch, C. and Marquand, D. (eds) 《重造集体行为》 *Reinventing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5) .

Denis, N. and Halsey, A. H., 《英国伦理社会主义》 *English Ethical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

Donnison, D., 《基本日程》 *A Radical Agenda* (London: Rivers Oram, 1991) .

Dunn, J., 《社会主义政治》 *The Politics of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urbin, E., 《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40) .

Elster, J., 《弄懂马克思》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sping-Anderson, G., 《政治依靠市场：社会民主党人通向权力之路》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Evans, M.,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London: Allen & Unwin, 1975) .

Femia, J., 《葛兰西的政治思想》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Fried, A. and Sanders, R. (eds), 《社会主义思想：历史记录》 Socialist Thought: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4) .

Fukuyama, F.,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

Galbraith, J. K., 《知足文化》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London: Sinclair - Stevenson, 1992) .

Gamble, A., 《自由经济与强大国家》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88) .

Gay, P., 《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挑战》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w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New York: Columbia, 1952) .

Geras, N., 《罗莎·卢森堡的遗产》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Giddens, A., 《超越左和右》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1994) .

Goetz, A., 《永别了，工人阶级》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1982) .

Gould, B., 《社会主义与自由》 Socialism and Freedom (London: Macmillan, 1985) .

Gould, B., 《为社会主义设计未来》 A Future for Socialism (London: Cape, 1989) .

Gramsci, A., 《狱中札记》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

Gray, A., 《社会主义传统》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London: Longman, 1946) .

Gray, J., 《超越新右翼》 *Beyond the New Right* (London: Routledge, 1993) .

Gray, J., 《保守主义的毁灭》 *The Undoing of Conservatism* (London: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1994) .

Gray, J., 《社会民主主义之后》 *After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Demos, 1996) .

Hall, S. and Jacques, M. (eds), 《新时代》 *New Tim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9) .

Harding, N., 《列宁的政治思想》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83) .

Harrington, M., 《社会主义的过去与现在》 *Socialism: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Arcade, 1989) .

Hattersley, R., 《选择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设计》 *Choose Freedom : The Future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7) .

Held, D., 《民主的模式》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87) .

Hindess, B., 《议会民主与社会主义政治》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Socialist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3) .

Hindess, B. (ed.), 《对右翼的反动》 *Reactions to the Right* (London: Routledge, 1990) .

Hirst, P. O., 《法律、社会主义与民主》 *Law,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

Hobsbawm, E. J., 《向前进的工党驻足不前?》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eds M. Jacques and F. Mulhern (London: Verso, 1981) .

Hobsbawm, E. J. (ed.),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 1, Marxism in Marx's Day* (Brighton: Harvester, 1982) .

Hodgson, G., 《民主经济：计划、市场与权力关系的新看法》 *The Democratic Economy: A New Look at Planning, Markets and Pow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

Howe, I. (ed.), 《社会主义思想手册》 *A Handbook of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Gollancz, 1972) .

Hutton, W., 《我们所在的国家》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Vintage, 2nd edn, 1996) .

Joll, J., 《第二国际 1889—1914》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 - 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5) .

Keane, J., 《民主与公民社会》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88) .

Kitching, G., 《社会主义再思考》 *Rethinking Socialism* (London: Methuen, 1983) .

Knei - Paz, B., 《列奥·托洛茨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Kolakowski, L.,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UP, 3 vols., 1978) .

Kolakowski, L., and Hampshire, S. (eds), 《社会主义理念：再评价》 *The Socialist Idea: A Reappraisal* (London: Quartet, 1977) .

Le Grand, J. and Estrin, S. (eds), 《市场社会主义》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Lichtheim, G.,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

Lichtheim, G., 《社会主义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 (London: Fontana, 1975) .

Lindemann, A. S., 《欧洲社会主义史》 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New Haven, CT: Yale, 1983) .

Looker, R. (ed.), 《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 Rosa Luxemburg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Cape, 1972) .

Luard, E., 《无国家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Without th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79) .

Lukes, S.,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achin, H. (ed.), 《西欧的国家共产主义》 National Commun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Methuen, 1983) .

McLellan, D. (ed.), 《卡尔·马克思著作选读》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cLellan, D.,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Marxism after Marx (London: Macmillan, 1979) .

McLellan, D. (ed.), 《马克思：第一个百年》 Marx: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London: Fontana, 1983) .

Mandel, E.,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

Marquand, D., 《无道德的社会》 The Unprincipled Society (London: Cape, 1988) .

Marquand, D., 《社会主义之后》 "After Socialism", in Political Studies 载于《政治研究》 xli (1993) .

Miliband, D. (ed.), 《重造左翼》 Reinventing the Left (Cambridge: Polity, 1994) .

Miliband, R.,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 Marxism and Politics (Ox-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iller, D., 《市场、国家与社区》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Mills, C. W., 《马克思主义者》 *The Marxis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

Nettl, J. P.,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Nove, A., 《可行社会主义的经济》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

Offe, C., 《福利国家的矛盾》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ed. J. Kean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

Orwell, G., 《论文、新闻报导与书信集》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4 vols, 1968) .

Padgett, S. and Paterson, W. E., 《战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史》 *A History of Social Democracy in Postwar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91) .

Parekh, B. (ed.), 《社会主义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London: Croom Helm, 1975) .

Parkin, F., 《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资产阶级批判》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1979) .

Paterson, W. E., and Thomas, A. H. (eds.), 《社会民主主义的
未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与前景》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West-
er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

Phillips, A., 《酝酿民主》 *Engendering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91) .

Pierson, C., 《共产主义后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after Commu-*

nism (Cambridge: Polity, 1995) .

Pimlott, B. (ed.),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论文集》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Heinemann, 1984) .

Polan, A. J., 《列宁与政治的终结》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4) .

Russell, B., 《自由之路》 *Roads to Freedom* (London: Allen & Unwin, 1918) .

Rustin, M., 《为了多元的社会主义》 *For a Pluralist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

Salvadori, M. (ed.), 《现代社会主义》 *Modern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68) .

Sassoon, D., 《社会主义一百年》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Tauris, 1996) .

Scharpf, F.,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与抉择》 *Crisis and Choice in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chorske, C. E.,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 - 1917* (Cambridge, MA: Harvard, 1955) .

Schumpeter, J.,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3) .

Selbourne, D., 《揭开社会主义幻象》 *Against Socialist Illusion* (London: Macmillan, 1984) .

Shaw, G. B. (ed.), 《费边社会主义文丛》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6th edn, 1962) .

Skidelsky, R., 《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 *The World After Communism* (London: Macmillan, 1995) .

Tawney, R. H., 《平等》 *Equalit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4) .

Taylor, K.,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理念》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Utopian Socialists* (London: Cass, 1982) .

Thompson, E. P., 《理论的贫乏及其它文集》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1978) .

Tilton, T.,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Tudor, H. and Tudor, J. M. (eds),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大辩论 1896—1898》 *Marx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Revisionist Debate 1896—18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Wainwright, H., 《为新左翼而辩》 *Arguments for a New Left* (Oxford: Blackwell, 1994) .

Waller, M., Coppieters, B. and Deschouwer, K. (eds),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 Democracy in a Post - Communist Europe* (London: Cass, 1994) .

Walzer, M., 《正义之域》 *Spheres of Jus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Williams, R., 《关键字》 *Keywords* (London: Croom Helm, 1976) .

Williams, R., 《走向 2000 年》 *Towards 200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

Williams, R., 《希望之源》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Verso, 1989) .

Wilson, E., 《开往芬兰站》 *To the Finland Station* (London: Fontana, 1960) .

Woodcock, G.,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

Worsley, P.,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Marx and Marxism* (Lon-

don: Tavistock, 1982) .

Wright, A. W., 《G. D. H. 科尔与社会主义民主》 G. D. H. Cole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

Wright, A. W. (ed.), 《英国社会主义：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 British Socialism: Socialist Thought from the 1880's to the 1960 's (London: Longman, 1983) .

Wright, A. W., 《R. H. 唐尼》 R. H. Tawne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

译 后 记

《新旧社会主义》一书是英国工党议员托尼·赖特为英国工党政府的政策提供理论解说和源泉的宣传著作，呼应了目前流行于英美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政策。今年8月份，新华出版社让我翻译此书，匆匆翻阅之后，我认为将本书呈现在我国读者面前是有益的，它将引发深刻的思考。这本书虽然是为英国工党政府做宣传，但在20世纪末，该书对社会主义在西方的渊藪、分支及其发展走向和生命力的分析与评判为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的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有助于我们在跨入新世纪的门槛时，对当世流光溢彩的诸多“社会主义”细细分辨，去伪存真，坚持社会主义并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本书的翻译从今年9月份开始，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鏖战，终于定稿，实属不易。全书分工如下：褚松燕译序、前言、第一章、参考文献及索引，林震译第二、三章，毛骛译第五、七章，颜君烈译第四、六、八章。林震校阅部分章节，全书最后由褚松燕校对完成。译文尊重原作者托尼·赖特的风格，一律不带脚注和尾注，但文中所引用的其他作者的文章，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文章，我们都尽力在国内已出版的相应译文中找到出处（在此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界前辈致意并表示感谢）。没有相应中文版译文

我们依据原意译出，使读者们在熟悉的氛围中细细品位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卜志勇等人对我们的书稿提出了若干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译文中仍存在的错误与欠妥之处，由4位译者负责，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褚松燕

1999年11月15日，北大燕园

责任编辑：王国英
封面设计：伍民力

ISBN 7-5011-4888-0



9 787501 148882 >

(内部发行)

ISBN 7-5011-4888-0/D·779

定价：15.00元